

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ISSN 1001-5973

# 山东师范大学

## 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〇二〇年第三期  
(总第二九〇期)



2020 **3**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 (双月刊)

2020年第3期 (总第290期)

## 编辑委员会

主任：商志晓

副主任：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 (常务)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宏 王玮 王卓

王志民 毛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建

主编：李宗刚

副主编：时晓红

□ 党内政治文化专题研究

学术主持人 商志晓

党内政治文化的具象化与建设逻辑…………… 刘红凇(1)

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增强党的先进性…………… 高继文(11)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专题

学术主持人 吕周聚

周作人模仿鲁迅创作小说的失败

——从《狂人日记》到《真的疯人日记》…………… 张铁荣(20)

“反抗绝望”中的“正能量”

——鲁迅“出山”与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契合再探…………… 张钊贻(30)

地母、故乡和生态忧思

——鲁迅的大地诗学论…………… 王家平(37)

论鲁迅的现代国民性建构…………… 吕周聚(46)

□ 历史学研究

论艾德礼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初步形成(1945—1951)…………… 毛 锐(55)

---

教育学心理学研究

- 实践教学的理性 ..... 徐继存( 64 )
- 开放性、尽责性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 张景焕( 72 )
- 

政治学研究

- 论习近平的新时代人才观 ..... 韩 萌( 82 )
-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实质与应对..... 布成良( 90 )
- 

经济学研究

- 城乡协调发展视域下的资源要素流动问题研究:从微观机理到宏观效应  
..... 乔翠霞( 99 )
- 

新闻编辑学研究

- 媒介品牌视野下近代新闻纸发展探索 ..... 王天根( 108 )
-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概念、功能及其改进策略..... 马合成( 118 )
- 

美学研究

- 当前高校美育工作的瓶颈及其问题辨析 ..... 杨 杰( 127 )
- 

学术争鸣

- 诗史与命名:刘克庄“诗祖”论及其他 ..... 陈元锋( 141 )
-

#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

2020 Vol.65 No.3( Serial No.290)

## MAIN CONTENTS

- Vis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CPC'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 Liu Honglin( 1 )
- Enhancing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 Gao Jiwen( 11 )
- Zhou Zuoren's Failure of Imitating Lu Xun's Novel  
——From *The Diary of a Madman* to *The Diary of a Real Madman* ..... Zhang Tierong( 20 )
- “Positive Energy” in “Resisting Despair”  
——Re-examining the Affinities of Lu Xun's “Coming Out” and Zarathustra's “Going Down”  
..... Zhang Zhaoyi( 30 )
- Mother Earth, Homeland and Ecologic Worries  
——Study on Lu Xun's Earth Poetics ..... Wang Jiaping( 37 )
- On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 Lyu Zhouju( 46 )
- Formation of the 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under Attlee's Ministry(1945—1951)  
..... Mao Rui( 55 )
- Ration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 Xu Jicun( 64 )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onscientiousnes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 Zhang Jinghuan( 72 )
- On Xi Jinping's Talent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 Han Meng( 82 )
- Expression, Essence and Response of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 Bu Chengliang( 90 )
- Research on Urban-Rural Resource Factor Flow: From Micro-Mechanism to Macro-Effect  
..... Qiao Cuixia( 99 )
- Media Brand and the Way of Modern Newsprint Exploration ..... Wang Tiangen( 108 )
- Study on the Concept, Func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the Impact Factor of Academic Journals  
..... Ma Hecheng( 118 )
-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 Yang Jie( 127 )
- Poetry History and Naming: Liu Kezhuang's “Poetry Ancestry” Theory and Others  
..... Chen Yuanfeng( 141 )

英文校译:李玉麟

###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 党内政治文化的具象化与建设逻辑<sup>\*①</sup>

刘红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复合概念,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化,也不同于他国的政党政治文化,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当代自我革命精神等的叠加体、复合体。从根本上看,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组织体系等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发展方向,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非党思想”影响,滋生出一些消极政治文化现象。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应该以“弘扬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纠正与克服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现象”为主题,正视受各种不良思想侵蚀而滋生的十种消极政治现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以“是否有效地抵制与解决了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检验标准,走良性循环、增量式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复合性特征;建设逻辑;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0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语境语义是准确理解问题的关键。从“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情况看,在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次使用这一概念,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sup>②</sup>,要求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正向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这一基本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重申、载入党章,并在2019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得到比较详细的阐述。从“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至今,习近平同志与中央的相关要求,都是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角度去立论部署的。然而,无论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整体性概念,非抽象建设所能成;要加强相关建设,必须具象化到现实党内组织体系、组织运作与政治行为上。聚焦到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则不仅需要明确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与构成要素,更需要增强问题意识与实践操作性,厘清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机制、建设逻辑与实践进路。

##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复合性特征

就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至今,仍是一

\* 收稿日期:2020-03-09

作者简介:刘红凇(1969—),男,山东泰安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020MYB049)和2019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8)的阶段性成果。

②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个颇具争议的复杂概念,有的将其界定在思想观念层面,有的界定在政治心理层面,有的兼而有之。具体到党内政治文化,作为由“党内+政治文化”构成的复合词与复合政治现象,则更加复杂、更容易产生认识分歧,内观与外观、远观与近观等得到的认识明显有所不同。这种认识差异,并非仅仅由于观察者的立场不同所致,也有视角与“视距”因素。因此,要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分清对象、对准焦距,正确认识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异同,克服与避免“大而化之”等模糊认识。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但也不能简单将政治文化之意套用到政党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上来,必须结合政党本质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特性等进行具体分析。

那么,作为一种客观政治现象,何谓政治文化?至今为止,阿尔蒙德和维巴1962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的定义与基本判断仍具代表性。阿尔蒙德等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即对政治系统作出自我认知的、情感和评价的种种取向时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的频率。在民族或国家政治文化层面,二人结合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五国公民的政治态度的经验性研究,给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一是聚焦“政治系统”来谈政治文化,而非仅仅就文化而谈文化。阿尔蒙德等认为,当说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时,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这一政治系统包括政党、法院、宪法、国家历史等。二是在区分政治态度与非政治态度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人们对政治客体的一种“特殊政治取向”,这种“特殊政治取向”主要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三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看政治文化,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文化”<sup>①</sup>。尽管阿尔蒙德等在相关研究中潜在地存在“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但其关于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定义与分析范式仍具可取之处。其中最大的可取之处,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而非从模糊的“印象主义”出发来研究政治文化,将人们的政治态度与非政治态度区分开来,立足于政治系统、政治取向来研究政治文化,强调政治角色、政治系统结构在分析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尽管“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已过半个世纪,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并提出了一些新定义,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阿尔蒙德相关定义影响;尤其是阿尔蒙德等关于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仍具借鉴意义。

聚焦到政党政治文化,无论是阿尔蒙德还是其他学者关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定义,都不能简单套用到政党政治文化上来,也不宜把政党政治文化简单归结为政治意识或政治观念。因为政党与国家的性质特点有所不同,相关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也必然有所差异;不同政党的性质特点不同,其党内政治文化的特点也必然有所不同。概括说来,国家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文化之差异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就权利与义务关系而言,公民与党员有所不同。一国公民身份往往“生而定之”、个人难以自主选择,公民权利往往生而有之、具有“权利优先”之特点;成年公民入不入党、是加入“甲党”还是“乙党”,个人具有自主选择权。但政党成员有所不同,各国政党对注册会员一般有一定年龄限制与政治义务的要求,如要求党员不能把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价交换原则等机械地搬到党内来,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政党文化是一种义务优先、纪律优先型的政治精英文化。<sup>②</sup>另一方面,就政治取向而言,阿尔蒙德等所言的公民文化之“政治取向”

<sup>①</sup>[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0、16、17、6页。

<sup>②</sup>郝铁川:《两种文化辨》,《检察日报》1999年4月7日。

是单向度的,即公民对政治系统的政治取向,但政党政治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取向是多向度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都是按照一定组织原则组织起来、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而且,只有赢得广大民众支持才能赢得政权。故政党及其成员所面临的政治关系,不仅包括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包括党员与党组织、党员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故政党政治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取向至少有四个向度,即党员对政党组织(包括组织原则与党内规章制度)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对政治权力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政治要求、政治态度与行为规范。再一方面,就政治取向或政治认同而言,公民的政治取向、入党意愿等具有多样性;但政党成员的政治取向具有根本一致性,所有入党成员都要承认党的纲领和主张、遵从党的纪律、支持党的工作。总之,政党的组织性、政治性、纪律性等组织特点决定了,相较国家公民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具有义务优先、政治取向多维、全党具有根本一致性等显著特点;而且,政党政治文化不仅包括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政治取向”,也包括实践形态的政治行为取向。对一个政党而言,政党政治文化是一种集体现象、集体文化,而非个体现象与个体文化;这种集体文化对全党成员的政治取向与行为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化,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文化;既不同于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印象”与“政治取向”,也不完全等同于党内的自我政治认知与自我评价。从历史生成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组织体系、政治地位等内在规定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精气神”的历史叠加与凝聚,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乃至当代自我革命文化的复合体。从现实角度看,党内政治文化是内化于全党成员之中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综合反映。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sup>①</sup>要认识与理解上述判断与概括,需要深化三个方面认识:(1)中国共产党党内主流政治文化是由党性决定的,党性的相关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sup>②</sup>,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所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等等。从根本上看,中外政党性质不同,党内政治文化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2)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执政地位所决定,执政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了“权力秉性”。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唯一领导党,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③</sup>,同时也是唯一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已经成为党的基本政治理念。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内外影响力,不仅包括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也包括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公共权力、广大民众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取向。(3)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标准与价值标准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自我评价取向与人民评价取向的统一体。尽管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都具

①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1页。

②《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有一定岗位职责,也都具有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但是,党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sup>①</sup>。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不仅要用岗位工作标准来审视自己、评价自己,而且必须以人民标准来审视与评价自己的政治行为。

## 二、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基本类型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的组成要素,从应然看,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先进政治文化。但从实然看,党内政治文化犹如大树的年轮,承载着整个党的历史发展印记,并非由单一文化或某个时期的文化独立组成,而是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革命文化与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等组成的混合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植根于中华大地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百年大党。这决定了,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历史地形成了党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这已经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部分;而植根于中华大地发展,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也会侵蚀党员干部的思想,滋生形形色色的消极政治现象乃至消极政治文化。因此,从现实或实然看,党内政治文化不仅包括由党性所决定的主流政治文化,也包括一些非主流政治文化,甚至客观上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非党文化”与消极文化。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言,就是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sup>②</sup>。

聚焦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即通过弘扬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消解与克服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滋养与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干事创业、清廉有为。简单说,就是要通过“正文化、正观念、正人心”来“正行为、正生态、正风气”。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仅要正视党内潜在的各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更要正视由这种消极政治文化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现象,明确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聚焦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并非是指所有党建问题,而是特指那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及其滋生的消极政治现象。对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均有过相关论述。如在革命时期,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列举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主观主义、机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其现象<sup>③</sup>,以及经常批判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党内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都属于那个阶段的党内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sup>④</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严厉整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习近平同志狠批的“七个有之”现象、在十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强调的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sup>①</sup>,以及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列出的要坚决防止和反对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都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另外,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列举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绝大多数都属于党内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对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抵制和反对的各种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不难发现,毛泽东、邓小平所批判的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在当代并未“销声匿迹”,有的依然“阴魂未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概括说,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破除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十种类型:

一是受封建主义残余侵蚀而滋生的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批判的“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现象,以及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等。<sup>②</sup>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将“公权”异化为“封权”“私权”、将“为人民服务”异化成为个人和家族服务。对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sup>③</sup>

二是受封建专制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批判的“有的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sup>④</sup>以及由此滋生的封建官场术、“厚黑学”“潜规则”现象。这一现象既与封建主义有关,也与国际共运史上、计划经济年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机制有关,其实质在于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人民民主”异化为“家长制”、把“人民公仆”异化为“替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受官僚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现象<sup>⑤</sup>,以及新滋生的“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为官不为”“技术官僚主义”等现象。官僚主义既与封建“官本位”意识有关,也与科层制、行政化有关,更与“权力异化”密切相关,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其实质在于以官为本、以民为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sup>⑥</sup>。

四是受形式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规则落实制度现象,热衷于造声势、吹喇叭、喊口号、出风头、讲排场、搞仪式现象,调查研究热衷于摆姿态、出镜头、露露脸现象,热衷于搞数字造假、“数字报表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新的“党八股”现象,等等。从根本上看,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伴生物”“衍生物”,没有官僚主义,所谓的形式主义必然会失去市场;其实质在于“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

①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③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④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1-31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弄虚作假”<sup>①</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形式主义要“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sup>②</sup>。

五是受宗派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所批判的“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这三个“有之”现象<sup>③</sup>,以及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警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sup>④</sup>

六是受个人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习近平同志所批判的“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两个“有之”现象<sup>⑤</sup>,以及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现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象,纪律松弛、不思进取、不敢担当、庸懒无为等现象。

七是受教条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现象,轻视调查研究、忽视民意、闭着眼睛决策与瞎指挥现象等。对于这些现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sup>⑥</sup>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八是受本位主义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只顾本位与小团体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等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sup>⑦</sup>

九是受拜金主义腐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如搞权钱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商勾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贪污受贿等现象。这种现象既与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密切相关,也与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有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sup>⑧</sup>

十是受享乐主义侵蚀所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上,二者相辅相成、交相呼应。其中,享乐主义现象主要表现在信念动摇、意志消沉、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奢靡之风主要表现在“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sup>⑨</sup>。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0-31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⑤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⑥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2页。

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sup>①</sup>。

上述十种消极思想、消极政治文化及其消极现象,在党内虽然不是主流,有些问题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已经得到有效解决;但有些问题却比较严重,有些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sup>②</sup>,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系统解决。

###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进路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命题。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角度,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先进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那么,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如何才能将“倡导和弘扬先进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这才是党内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停留在党内政治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上,也不能简单地就“政治文化”本身而谈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反观”,深刻认识其形成机制与发展逻辑,结合现实组织体系与组织运作等,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行系统思考。

前文已言,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且都是比较抽象的整体性概念,难以抽象地去建设与发展。对于如何才能严肃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同志相关讲话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建设思路,突出强调“准则管不管用,关键看能不能执行到位”,明确指出检验准则是否执行到位的判断标准与检验标准即“关键看是否有效解决了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围绕怎样将准则执行到位,给出了“五管齐下”的系统性建设方案,即一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二要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三要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四要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五要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sup>③</sup>这一系统性建设方案,不仅涉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做的五个方面的工作,而且明确指出了建设的关键问题与检验准则,值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借鉴运用。

结合党内政治文化的复合性特点与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借鉴习近平同志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性建设方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深层次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增强问题意识与操作性、具象化到党内组织系统与政治行为,需要“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sup>④</sup>。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进路,应该以“弘扬、培育、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纠正与克服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现象,消解各种消极政治文化的滋生蔓延”为主题,以把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贯彻落实到党员干部思想与行为之中作为建设关键,坚持“观念-制度-行为”相辅相成,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思想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为先导,以严整各种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现象为切入点,以建立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体制、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为重中之重,以健全、完善、严明党内法规制度为根本保障,坚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形成时代先进政治文化相结合,以“是否有效地抵制与解决了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及其现象、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判断标准或检验标准,走良性循环、增量式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具体说来,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先导,其关键在于:深刻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各组成部分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坚持以新思想、新观念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有效实现党内政治观念的时代更新与政治取向的“时代前移”。因为,从根本上看,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看,尽管其成因很复杂,但任何一项党内消极政治文化现象背后都有迂腐思想观念与权力异化的影子。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sup>①</sup>概括说来,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其着力点主要有二:一要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科学分析。从构成看,党内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革命文化与建设文化、改革与创新文化等的混合体,其中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时代性,都是特定时代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精神升华”与“情感凝聚”。从当代反观之,过去形成、过去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并不一定适应当代发展要求,必须加以“过滤”与“扬弃”,取其精华、剔除不合时宜之处。比如,我们党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再革命”,而是为了和平建设、人民生活更美好,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履行党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今天看来,革命精神、革命文化永存,但绝不能将革命思维、运动模式等简单套用到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二是要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用新的政治思想观念来覆盖过时的旧观念、引导新的政治取向。概括说,坚持法纪分明、公私分明、纪在法前、从严治党、权责统一、依法治权、全面监督、有效问责等,乃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理应成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观念新取向。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sup>②</sup>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其关键在于:要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找准切入点与突破口,有效解决好“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切实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克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抽象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看,以“八项规定”为起点、以严整“四风”为切入点,从严从细从实狠抓作风建设,由表及里、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可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成功之道,值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借鉴与弘扬。因为从根本上看,党内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政治情操、政治风尚、政治风气。前文所言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十种突出问题,有的属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问题,有的属于学风、文风、会风问题,有的属于政治品德、生活作风、家风问题。因此,继续以严整“四风”为切入点,从严整“四风”延展到严惩“七个有之”,再到全面整治由封建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侵蚀而滋生的各种消极政治现象,不失为新时代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切入点与实践进路。

聚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与关键制度,其关键在于:坚持用科学理念指导、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制与机制,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②习近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风优良、奋发有为、为民务实清廉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关键是坚持好干部标准,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sup>①</sup>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而言,亦是如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性制度是选人用人制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选贤任能问题始终是治党理政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常言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则蔚然成风。无论在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新时代,“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sup>②</sup>。另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严整“四风”、要求“三严三实”、狠刹“七个有之”现象,所针对的重点对象,都是各级领导干部,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而搞“七个有之”。<sup>③</sup>那么,如何才能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其关键就是坚持科学理念与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眼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充分做到“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敢于坚持原则,让好干部真正受尊重、受重用,让那些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真正没市场、受惩戒”<sup>④</sup>。只有建立起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与言行;只有通过“正言行”来“正人心、正文化”,久久为功,养成习惯,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蔚然成风。

## 结语

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角度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要举措,三者相辅相成,又都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聚焦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本身,则需要根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题、关键问题与检验标准,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整各种庸俗腐朽的消极政治文化现象、建立科学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健全并严明党内法规制度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第一项对应着党的思想建设,第二项对应着党的作风建设,第三项对应着党的组织建设,第四项对应着党的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故放眼整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无论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还是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乃至反腐败斗争,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整体中的一部分。无论研究其中的哪一方面内容,从根本上看,都是研究党的建设的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只是不同研究视角的聚焦点、侧重点、着力点有所不同。因此,无论党的建设哪一部分内容、哪一项具体措施,都难以孤立地来做;其科学有效的建设思路,归根到底,都必然要归结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与战略布局上来,都要遵循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都需要注意党的建设整体性、系统性与逻辑性。

①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②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④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 Visu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CPC'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Liu Honglin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relatively abstract compound concept, either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political culture or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Rather, it is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mpound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construction culture, reform culture, contemporary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others. Fundamentally, the Party's natur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determine the mainstream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however, it is also inevitably affected by various "non-party ideas". In the new era, the them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be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a positive and healthy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and correcting and overcoming various negative political cultural phenomena". We should face squarely the ten negative political phenomena, adhere to seeking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solutions and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take as the inspection standard "whether or not to effectively resist and resolve various vulgar and decadent negative political cultures and the phenomena and form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and take the road of a virtuously circling and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PC; compound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logic; practice approach

责任编辑:王盛辉

# 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增强党的先进性<sup>\*①</sup>

高继文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治本之道,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固本培元、强基铸魂作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建设和思想武装,以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筑牢党的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要大力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坚持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消除党内不良政治文化倾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同向发力,严明党规党纪,使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制度化,以制度规范党员和干部言行。

**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价值观;党规党纪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11-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2

政治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发展进程中最能动、最深沉、最持久的影响因素。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党性的集中体现,是政党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铸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鲜明体现共产党先进性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渗透到党的建设各领域,具体表现为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层面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原则立场和行为准则等。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彰显了党的独特政治品质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政治建设,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更加凸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急迫。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并采取重要举措,取得显著成效。这是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新经验,也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必须着力抓好的长远工作。鉴于国内学者已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价值意义、主要内容、建设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本文结合习近平同志有关重要论述,着重就当前我们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谈一些认识。

## 一、筑牢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

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最根本的党性表现,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内容。这就是要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执着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忠诚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全心

\* 收稿日期:2020-03-26

作者简介:高继文(1964—),男,山东莘县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020MYB049)、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18BXSXJ09)的阶段性成果。

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和历史使命,是党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笃信,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也来自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重视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依靠这种理想信念,党带领人民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克服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奉献精神,以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沉着应对国内外重重危险和挑战,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初步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说明,心中有信仰,事业就有方向、有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党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又一次次奋起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支点。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sup>①</sup>没有坚定理想信念,就没有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党和人民事业就成了无本之木,党就会失去本色和人民拥护。所以,我们党历来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并通过日常党内教育、集中整党整风等形式,保持全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奋斗精神和先锋品质。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聚焦点。其目的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理想信念淡薄、意志衰退、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等党性不强和作风不纯问题,使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的事业发展凝聚强大动力。面对党内存在的严峻风险考验,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sup>②</sup>“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sup>③</sup>。一个政党衰落、一个人堕落,往往从理想信念丧失或缺失开始;党员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丧失先进性。他还说:“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sup>④</sup>我们从实际上看,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上摇摆、经济上贪婪、组织上涣散、作风上腐化、工作上无为,根子就在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动摇了理想信念,就没有立党为公的胸怀,不再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再把使命、担当、事业、责任、人民放在心上,而是个人为上、私欲膨胀、追逐名利、贪图享乐、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甚至蒙骗组织、违法乱纪。这势必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乃至会使党变质。因此,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严在思想作风上,严在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sup>⑤</sup>。近些年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活动,都将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位,着力端正党的思想和作风。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sup>⑥</sup>。

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严峻的挑战,新时代党的理想信念建设迫切需要以党内政治文化筑牢思想根基。

第一,加强理论建设和思想武装,铸魂固本。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理想信念的理论源头,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或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会动摇党的理想信念和团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81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20页。

⑥本书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51页。

结统一的根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思想武装,夯实党的理想信念的立论基础,是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紧要任务。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面对社会思潮多元、思想多样、意识形态斗争的强烈冲击,共产党员必须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旗帜鲜明讲政治,捍卫党和人民利益,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干扰,抵制各种以思想多元化诱引政治多元化、多党化的图谋。其次,加快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政党建设,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全党同志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增强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工作的能力,自觉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当今世界和中国变化,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政治观、政党观、人民观、事业观和政绩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不断提升理论修养和思想情操,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再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统一思想、推进工作。全党同志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和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认清风险挑战,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提高政治站位,紧扣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贯彻落实党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以实际行动奋发作为、展现党性。

第二,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培根固基。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①</sup>他进而指出:“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sup>②</sup>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根脉、文化自信和理想信念坚定的内在逻辑,为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建设指明了方向。首先,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稳固精神力量,是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旗帜。党的理想信念既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也源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涵养,是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结着党和人民对独立、解放和富强的美好追求,熔铸了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团结统一、无私无畏、精忠报国、胸怀天下等高尚品质。党的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这种独特文化的精华和升华。所以,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其他自信的精神支柱。其次,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根脉。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优秀文化充满自豪感和认同感,并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予以弘扬和运用。其实质是铭记党、人民和民族的奋斗历史,倍加珍惜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所选择的主义、道路和制度,对现在和未来充满希望,在前进中志不改、道不移。没有文化自信就会对祖国、党和人民的历史与精神采取悲观、怀疑乃至虚无态度,这势必会动摇理想信念。再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坚定理想信念、继往开来的智慧和不懈力量。比如深入挖掘和吸取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思想精华及其时代价值;善于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中爱党爱民、坚定信仰、必胜信念、严守纪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等精神命脉;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观。

第三,把坚定远大理想与完成各阶段现实任务相结合,使长远目标落实落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需要漫长奋斗过程,即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辩证统一的过程。共产党员只有坚定理想,才能有正确前进航向和必胜信心;从实际出发、不懈奋斗,一步步完成阶段性任务,才能逐步接近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离开远大理想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求实奋斗精神将一事无成。无论何时我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7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18页。

们都要立足现实,坚定理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黑暗没落的旧中国,带领人民先后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勃勃生机。这就是在中国实践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都是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信念,没有几代共产党人接续艰辛探索和奋斗,就没有今天富强的中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今天为新民主主义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现在,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初心,坚定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新时代的使命,不断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共产主义渺茫,就会放弃信仰信念,那就解除了精神武装、抛弃了党的旗帜,自然就没有搞好事业的开阔眼界和坚韧毅力。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共产主义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目标,就没有理想信念,就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做一个忠诚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人。<sup>①</sup>

## 二、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集中表现在确立和践行先进价值观上。价值观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方法论影响下形成的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它往往体现在人们对待公与私、利与害、权利与义务、贡献与索取、个人与他人及组织之间关系的态度上,表现在事业、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价值观决定人生观和事业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得失成败、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党的性质、目标和宗旨为准绳,其实质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生,其外在表现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忘我工作、无私奉献、清正廉洁等。有的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有相当多的价值理念为广大党员干部所尊信,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先导。诸如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清正廉洁、居安思危、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光明磊落等等,都深刻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我们提炼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源泉。”<sup>②</sup>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崇高精神追求,是我们党世代相传的独特优势和拒腐防变的利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市场经济冲击、外来文化干扰和落后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发生错位、扭曲甚至颠倒。这表现在思想、作风和行为等各方面,体现在工作关系、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等各种关系中,总的来说就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党和人民不忠诚,错误认识权力、地位、名利;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党的领导、与工作、与他人的关系,言行背离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本质。比如,有的人政治立场不坚定,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为党尽责,不信马列信鬼神,缺乏党性原则和政治定力,经不起风浪的考验;有的人追求官本位的价值观,热衷于当官抓权,以当官为目的,以权谋私,使权力个人化、市场化、利益化,而不是把职位、权力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有的人追求家长制领导方式和作风,独断专行,独揽大权、一人说了算,不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内民主生活,甚至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的人特权思想严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②洪向华主编:《党内政治文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基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重,在正常的权力和待遇之外,追求特殊权力和利益,滥用权力、获取好处,无视法律和制度约束,藐视组织监督;有的人思想作风不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没有责任和担当精神,工作搞形式、走过场,捞政绩、祸国殃民;有的人私心过重,不把事业和工作放在心上,遇事先考虑自己利害得失,追逐名利,拉关系、搞潜规则,甚至生活腐化堕落。所有这些表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具体形式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点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严重,破坏党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性要求背道而驰。这是产生权力腐败、脱离群众等各种不正之风的主要根源,污染党内政治生活,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会招致党失掉民心 and 执政地位。习近平同志尖锐指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sup>①</sup>

因此,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首先要价值观坚定,明白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当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党的使命宗旨,关键是要始终恪守并自觉践行党的价值观。同时,共产党人自觉践行党的价值观,对于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示范和推动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sup>②</sup>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员的修身立德、为政之基。后来,他又强调:“要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定和提高政治觉悟。”<sup>③</sup>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sup>④</sup>,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他的重要讲话,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和大力弘扬我们党的正确价值观,在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本色不变、崇高精神追求不减;另一方面强调坚决防止和反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价值观和低级文化倾向,净化党内政治生活。这是总结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针对党内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发生的价值观错误所提出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指导意义。

第一,端正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需要从思想上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引导,严把思想道德关。习近平同志指出: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sup>⑤</sup>。这段话既指出了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重点环节,也指明了新时代对党员干部正确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和教育的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并在灵魂深处筑起防腐拒变的坚实防线。首先,坚定党性,对党忠诚老实。在党就要信党爱党忧党为党,对党忠诚、向党看齐、听党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时刻维护党的利益,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对党的事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其次,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为人民服务,切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③《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月8日。

④本书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实为人民用权谋利做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再次,增强使命担当意识,扎实干事、开拓创新。要永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把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坚定体现在求实创新、勇担重任上,认真发扬党的“三严三实”作风,为攻克改革、发展难关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一流业绩展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信赖和支持。最后,在纯洁思想作风上狠下工夫,持续提高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名利观和政绩观,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公道正派为官、干净清廉做人做事,防腐拒变,经受住各种诱惑、风险和挑战的考验,永不改变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第二,端正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要激清又要扬浊,坚决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作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活。当前要坚决抵制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不良文化。这是最典型、难以克服、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的消极腐败政治文化,是寄生在党的肌体的毒瘤,污染党的先进性。这虽然发生在少数党员和干部身上,但如果任其滋生、发展,将会导致严重危害。因此,对这些现象,我们要增强战略定力和政治意识,站在党的生死存亡高度认识它的隐蔽性、长期性和危害性,以多种手段进行坚决斗争,消除它在党内的影响。首先,要坚定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以自我革命精神,以刮骨疗伤、猛药去疴的勇气,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对于严重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纪律的思想行动,要立场坚定,敢于坚持原则、不姑息、不让步、不放松警惕,更不能讲情面、讲和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坚持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多措并举,提高同消极腐败政治文化斗争的实效性。要将思想作风、政治文化领域的斗争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加大反腐力度,在党内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围,以反腐斗争成果净化党内政治文化。坚决杜绝把市场交易原则引入党内生活的现象,党员和干部要认真恪守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准则,在党内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清清爽爽的工作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

### 三、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教育引导和制度约束两手抓,依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sup>①</sup>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障。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宗旨、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等,需要靠宣传教育和党员个人加强修养,更需要上升为制度和规矩,成为全党同志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发挥规范和惩戒作用。而党内各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又需要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来支撑,要体现鲜明的党性要求,还需要党员和干部模范遵守。党员和干部的党性坚定,就能自觉信任制度、敬畏制度、遵从制度;党员和干部缺乏党性、理想信念淡漠或价值观不坚定,就会蔑视制度、钻制度空子甚至违纪违法,最后受到制度制裁。可以说,党内制度是存在于党章党规党纪等规范性文件中的党内政治文化形态,更具有原则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也即刚性。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②</sup>。

用制度治党,就是用党章党规党纪治党。把党的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格落实党章、法规、准则、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是加强制度治党的关键。因为法规制度颁布以后,只有得到不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从原则性要求变为党员和干部的行动,才能起到规范约束作用、发挥实际效力。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它明确了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违反了要承担什么后果等,是党员和干部行动的标尺。党的纪律和规矩主要体现在党章、党规党纪、国家法律和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上。以严明的纪律和规矩保证党的政治坚定、作风过硬和组织坚强,是共产党先进性的突出表现,是党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武器。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没有严明纪律,党就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就干不成事业。所以,加强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列宁曾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铁一般的纪律。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指出,我们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取得胜利,靠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组织起来、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sup>①</sup>党的十九大适应从严治党新要求,将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的创新。事实也证明,纪律严明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全党团结有力的重要保障,必须常抓不懈。

根据我们党纪律建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需要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加强。

第一,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理直气壮讲政治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就决定了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纪律,统领其他各项纪律,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之点。党员坚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主要依据,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恪守政治原则、明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政治纪律,把“五个必须”作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必须管好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sup>②</sup>全党同志要增强“四个看齐”,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严明党内纪律与发扬党内民主相得益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自觉接受党内外纪律监督,靠纪律消除腐败隐患。只有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党的政治本领,带动党的政治建设质量全面提高。

第二,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特点,是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转向严强硬的新起点。首先,依规治党的基础是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使它贯穿在党的建设各方面,成为维护党的理想信念、加强党的团结、纯洁党的作风、纠正党内错误和反对腐败的锐利武器。严明的纪律和规矩覆盖党的建设各领域,约束全党同志,是人人不能逾越的底线,从而使管党治党有法可依。这就能够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制度意识,人人养成执行纪律、守住规矩、按制度办事的习惯,树立纪律在管党治党中的权威。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修订了190多部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其次,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表明党的法

<sup>①</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04页。

规和纪律严于国家法律,是在国家法律之前设置的更严的防线。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性质、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使所有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sup>①</sup>这是说,共产党员不能将党的纪律混淆为国家法律,也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法律是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最低行为准则,适用于所有人。党纪党规是比国家法律要求更高更严的行为规范,是衡量共产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是否先进的准则。因此,党员不能满足于遵守国家法律,而必须向党规党纪看齐,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严格遵守党规党纪。这样管党治党,既有利于从正面严格要求全体党员,也有利于预防少数党员从违规违纪发展到违法犯罪;既有利于严肃查处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又有利于约束和管住大多数党员干部,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再次,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要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实现党纪和国法的衔接和协调。这就要根据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做好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制度体系,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据统计,继2012—2014年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之后,2019年上半年顺利完成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对纳入清理范围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废止54件、宣布失效56件、修改8件,对14件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中央党内法规作出一揽子修改,有力维护了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sup>②</sup>

第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使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律和规矩立起来后,关键是严格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就没有威严。严格执行既能对自觉遵守纪律的党员产生激励和引导作用,也能通过制裁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在党内产生震慑和警醒作用,使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习近平同志指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sup>③</sup>他还说:“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sup>④</sup>首先,要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在执行纪律中的带头作用。领导干部掌握大小不同的权力,具有支配人、财、物的机会,违法违纪的机会多、风险大、后果严重。因此,他们是严肃执行纪律的重点,要严格要求。所有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贡献大小,都要心存对法纪的敬畏,手握对法纪的戒尺,把党规党纪刻在心上,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和特权。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善于依照法规制度用权、谋事和管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带动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党规,维护制度权威。其次,党的各级组织必须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担负起执行和维护纪律的主体责任,聚精会神抓党的纪律建设。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强化党组织在选人用人上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程序、方法选人用人,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铲除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要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宣传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懂纪律、守法纪,明底线、存戒惧,模范遵守纪律和规矩。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加强纪律监督检查,对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坚决批评制止,重者依规依纪处理,不能听之任之、姑息迁就。再次,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执纪问责

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②姜洁、江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二〇一九年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综述》,《人民日报》2020年3月18日。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6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70页。

作用。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主要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首要任务是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相关决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职责履行、权力行使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监督,做细做实日常监督,用好问责利器,督促责任担当;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也要严肃查处和追究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的纪律责任,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以严明纪律涵养和纯洁党内政治文化,使党永葆先进性。

## Enhancing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Gao Jiwe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The active and healthy intra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ife and also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permanent way to maintaining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playing the role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soul in ensur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to be exercised fully and strictly.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Party, we should be firm 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rengthe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preparedness, and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ideals and beliefs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sts, uphold the political integrity of being loyal and honest, fair and decen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being upright and pure, eliminate the unhealth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endency within the Party and purify the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ith its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make efforts in the same direction, strictly enforce the Party's rules and disciplines, institutionalize the Party's ideals, beliefs and values, and regulate the words and acts of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hrough the system.

**Key words:** intra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ideals and beliefs; Communist views of values; the Party's rules and disciplines

责任编辑:王盛辉

# 周作人模仿鲁迅创作小说的失败

——从《狂人日记》到《真的疯人日记》\*

张铁荣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狂人日记》是鲁迅的成名之作,发表以后震动五四文坛,影响非常深远。《真的疯人日记》是周作人模仿鲁迅创作的一篇小说,发表后几乎毫无反响。将这两篇小说进行比较,对于我们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风格,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充分说明经典的不可复制性。《真的疯人日记》是周作人小说创作的一次失败,从此,他全方位地转向了散文创作。

**关键词:** 周作人;鲁迅;《狂人日记》;《真的疯人日记》;《新青年》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3-0020-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3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它——横空出世震动了五四文坛,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这部小说,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在文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史诗般的引领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当时就对《狂人日记》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他不仅用实际行动在理论上进行解读、呼应,而且还多次在文章中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甚至身体力行创作同样题材、书名相似的小说,这就是《真的疯人日记》。只不过他从壮志满怀到身心憔悴,结局则是完全不能企及,此后虽全力补救,但终难望其项背。可见,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将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创作脉络的梳理,并进行互文研究,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一、周作人对《狂人日记》在理论上的呼应

鲁迅写《狂人日记》是1918年4月,小说发表在同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有趣的是半年多以后,周作人在1918年12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理论文章《人的文学》。此时的周作人在思想上与鲁迅基本相同,这个时期周氏兄弟的文章,都非常注意书写妇女儿童问题。因此,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文章都是可以对照互文来读的。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的现代理想范本,应该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只是周氏兄弟当时相互配合,且十分注意相互文字的尺度,文章和思想的表述非常一致,既相互配合又没有任何互相吹捧的痕迹,所以不容易引起读者向这方面去联想。

在鲁迅振聋发聩的小说里,“救救孩子”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狂人日记》里面的中国,“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表面仁义道德的历史,实际上“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因为只有在中国才有“易子而食”的食人文化、有“食肉寝皮”的食人语言,我们是“从易牙的儿子,一直

\* 收稿日期:2019-11-19

作者简介:张铁荣(1951—),男,天津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吃到徐锡麟；从徐锡麟，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sup>①</sup>，进而有孝亲中的“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sup>②</sup>的教育；我们就是生活在“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sup>③</sup>；知识分子中稍有思想便被打压成为受迫害妄想症患者；威权无处不在，“赵贵翁的眼色”甚至“赵家的狗”都令人忐忑不安；狂人大声疾呼：“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sup>④</sup>狂人的规劝当然也是鲁迅的规劝，“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sup>⑤</sup>。这就是鲁迅在小说中的描写，由于一些细节很重要也很容易被忽略掉，为了下面的分析方便，我们不妨引用得稍详细一些。

周作人对《狂人日记》是相当重视的，他并没有忽略这些细节。他在《人的文学》里对《狂人日记》进行着认真的文学理论解读。周作人首先这样说：“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sup>⑥</sup>

关于“吃人”，周作人在此文中也提到了“割股”和“食人风俗”，他认为：“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sup>⑦</sup>他还批判了中国的“殉节”等吃人恶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要“救救孩子”，周作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命题，因为中国连人是什么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他详细介绍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sup>⑧</sup>他指出，我们的文化里有表彰节妇“殉节”的杀戮，还有推崇郭巨埋儿残杀儿童的所谓孝道。所以，针对中国的现状，还谈不到妇女儿童的问题，因为我们连这第一步——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都应该是人的发现的子命题，而人的发现才是真正的母题。当西方谈论妇女儿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解决人的发现这个问题；当然，这三个发现在中国有时是相互交叉进行的。所以，中国要补这门课。

周作人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发现。他写道：“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

①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2页。

②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③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④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3页。

⑤《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2页。

⑥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⑦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⑧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这里写的中国人“生了四千余年”不知道“人”为何物,实在是“可笑的事”;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是“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周作人在此解释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对于人的不重视,其目的不言自明,他们关注的焦点此时非常集中:“四千年”的中国历史。

周作人在文中还启发读者,他解释说“人”也有动物的一面,但人终究是高级动物。他这样写道:“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顾‘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sup>②</sup>所谓从动物进化到人,即指灵与肉一致的现代人。《狂人日记》中“狂人”质问“大哥”的话,也谈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成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成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为了对此进行普及,《人的文学》这样说:“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sup>③</sup>周作人的这些话,应该是对于鲁迅小说此处的解读,同时也是普及人类学常识的一种思想延伸。

论及人的理想的生活时,周作人认为第一是物质的生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是要温饱”,周作人将此总结为“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sup>④</sup>;第二是道德的生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二是要发展”,周作人将此总结为“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这里显示出思想惊人的一致性。周作人特别强调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把这个道理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新福音”<sup>⑤</sup>。

对于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批判的孝亲中那种“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了请他吃,才算好人”的所谓爱和孝道,周作人说“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他还补充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

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②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sup>①</sup>周作人还以文学作品为例,强调指出:“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sup>②</sup>

继续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命题,周作人还谈及孩子的来历。他从科学的角度指出:“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教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

在谈到人的文学的时候,鲁迅也是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也就是先把外国的“拿来”。鲁迅说在他的《狂人日记》之前,就已经有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了,但他又说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周作人则说:“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首次全面对鲁迅的《狂人日记》进行理论阐释;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又是周作人理想的“人的文学”的小说范本。因为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狂人日记》正是这一记录的杰出小说,是真正的人的文学,是一个觉醒者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是来自铁屋子中的“呐喊”。

## 二、《真的疯人日记》在形式上对鲁迅的模仿

周作人对于《狂人日记》的内容非常熟悉,多次写文章进行解读。除了内容以外,在形式上周作人对日记体的小说也极为推崇,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种日记体的创作方式。在《抱犊谷通信》一文的开头,他就说:“我常羡慕小说家,他们能够捡到一本日记,在旧书摊上买到残抄本,或是从包花生米的纸上录出一篇东西来,变成自己的绝好的小说。我向来没有这种好运,直到近来才拾得一卷字纸,——其实是一个朋友前年在临城附近捡来的,日前来京才送给我。这是些另另碎碎的纸张,只有写在一幅如意笺上的是连贯的文章,经我点窜了几处,发表出来,并替他加上了一个题目。”<sup>③</sup>

周作人早年曾有过对外国小说翻译加改写的实践。在后来的写作中,他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试做小说,这就是《真的疯人日记》和前后的几篇小说。

《真的疯人日记》首发在1922年5月17日的《晨报副刊》上,至5月23日分4次连载完。这篇小说共分为六个部分:编者小序;一、最古而最好的国;二、准仙人的教员;三、种种的集会;四、文学界;编者跋。

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②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6号。

③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在《编者小序》中,周作人首先交代自己拾得七八本的“疯人日记”,从普通寻常之中检出一本真的疯人日记向大家介绍。他说:“其中只有一本,或者可以算是真正疯人所记的,真是一卷小方纸的手抄本,全篇用‘铁线篆’所写,一眼望去,花绿绿的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幸而我也对于‘小学’用过功的,懂得一点篆法,而且他又恰好都照着正楷篆法去的,所以我费了两天功夫,居然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了。这篇里所记的,是著者(不知其姓名,只考证出他就是写那铁线篆的人而已)的民君之邦——德漠德斯坡谛恩——游记的一部分,虽然说得似乎有点支离暧昧,但这支离暧昧又正是他的唯一的好处,倘若有人肯去细心的研究,我相信必然可以寻出些深奥的大道理来,所以我就拿来发表了。”<sup>①</sup>这个开头很有意思,亦真亦假,真假难辨。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有一个小序,用文言交代自己得到的“日记二册”的经纬,文字简洁而内容丰富。周作人的这篇小说开头也算老练,但所涵盖的内容远没有鲁迅那样丰富。

小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最古而最好的国》,周作人说这个国是“‘民君之邦’——德漠德斯坡谛恩”,即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雅典民主制度的国,也是最臻于完美的范例,被称为德摩斯提时期,在这里显然是一个讽刺。小说写道:“在这西海(原文为“西海”——引者注)中,是世界上最古、而且是,最好的国;这末一节,就是我们游历的人也不好否认,不但是本国的人觉得如此。在那里各人都有极大的自由,这自由便以自己的自由为界,所以你如没有被人家打倒,尽可以随意的打人,至于谩骂自然更是随意了,因为有‘学者’以为这是一种习惯,算不得什么。大家因为都尊重自由,所以没有三个人聚在一处不是立刻争论以至殴打的;他们的意见能够一致的只有一件事,便是以为我自己是决不会错的。他们有两句口号,常常带在嘴里的,是‘平民’与‘国家’,虽然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是平民,却都是便衣的皇帝。因为他们的国太古了,皇帝也太多了,所以各人的祖先差不多都曾经做过一任皇帝,——至少是各人的家谱上都这样说;据说那极大的自由便是根据这件事而发生的。至于爱国一层却是事实,因为世界上像他们那样憎恶外国的人再也没有了,这实在是爱国的证据。”然后描写无端的打架,“有一个‘唯一爱国会’会长背了一捆旧账簿到我这里来寄存,也是一例。这些旧账簿本来是五百年前的出入总登,在此刻是收不起账来的了,他们却很是看重”,紧接着写的就是为了“平民”与“国家”两个口号的论辩与厮打。<sup>②</sup>

这一部分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一些词语的互证和精神上的联系。首先是历史之长久。在鲁迅那里,“这历史没有年代”,周作人这里成了“世界上最古,而且是,最好的国”。其次是有有关账本。《狂人日记》中有一本“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周作人这里的“爱国会会长背了一捆旧账簿”;可惜周作人并没有展开,他只是说这些人对于这五百年前的“旧账簿”很是看重,比其他国的人将装着钞票契据的红漆皮箱还觉得“高尚”,至于这一捆旧账簿的内容并没有交代。鲁迅和周作人虽然都是在批评中国的陈旧历史,但是鲁迅的小说是为了铺垫情节而前后照应,在书写上文气与逻辑是连贯的,比如狂人“踹了一脚”陈年流水簿子,自己认为“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其他人听到风声即“同我作冤对”,小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这就有了一种被迫受害的心理,于是乎得出结论:“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紧接着,“晚上总是睡不着”,于是便“思考”,甚至查历史,终于得出了“吃人”的结论,这是从史书中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来的,而且是歪歪斜斜的,非常符合一个狂人的心理活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踹了那本“陈年流水簿子”衍生出来的。顺理成章犹如行云流水,这才是小说。应该说,周作人并没有把这个“一捆旧账簿”的小说材

①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17日。

②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17日。

料用好,他基本没有展开,只是以此来说明中国历史的陈旧而已。鲁迅那里是“一本”,而周作人小说里交代的却是“一捆”。这“一捆”里记载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却都没有任何展开与说明。这在小说写作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可惜的资源浪费,或者说是一个败笔。

小说第二部分的题目是《准仙人的教员》,这一节写的是“民君之邦里最可佩服的是他们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教员录用制度,因为教育是“清高的事业”,所以“不是要吃饭撒矢,活不到一百岁的俗人所配干的,在理论上说来应该是仙人才可以担任,但是不幸自从葛仙翁的《列仙传》出版以后,神仙界中也似乎今不如古,白日飞升的人渐渐少见,不免有点落寞之感了”。下面用了夸张式写法交代教育当局密议了11个月议决采用“准仙人来充当职教员”,其标准是:“一种非仙非人,介在仙与人之间的清高人物;其养成之法在拔去人气而加入仙气,以禁止吃饭撒矢为修炼的初步,学校任用的规则,系以辟谷者为正教授,餐风饮露者为教授,日食一麻一麦者为讲师,这一类自然以婆罗门为多。学校对于准仙人的教员,极为优待:凡教授都规定住在学校的东南对角的一带,以便他们上校时喝西北风借以维系生命;辟谷的正教授则准其住在校里,因为他们不复需要滋补的风露,而且他们的状态也的确不很适宜于搬动了。至于讲师就不大尊重,因为还要吃一麻一麦,未免有点儿凡俗而且卑鄙:倘若从事于清高的教育事业而还要吃饭,那岂不同苦力车夫一样了么?这在民君之邦的教育原理上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是一段非常夸张的描写,辛辣地讥讽了当时政府教育当局的欠薪恶习。为此,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文章,最有名的是《碰伤》。这一部分以小说形式写出政府教育当局的无耻,可谓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形象的小说语言对于这种耍赖行为的政府进行批判。为了增强现实感,他还加了一段这样的描写:“有一回,一个名叫果非道人的和尚到那里提倡静卧,说可以却病长生,因为倘若不赞成就不免有苏派的嫌疑,所以一时闻风响应,教室里满眼都是禅床,我们性急的旁观者已经预备着看那第一批的静卧者到期连着禅床冉冉的飞上天去了。但是过了一个半月之后,却见果非道人又在别处讲演星云说,禅床上的诸君也已不见了。”<sup>①</sup>可惜的是,这部分小说中只有描写和叙述,没有人物活动,好不容易出现的“果非道人”也一闪即逝,白走了一个过场。因此缺乏了作为小说的生动性,一些很好的材料在此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过分地迁就现实,特别是对于北洋政府欠薪行为的愤怒,使得艺术上的细节显得粗糙,而且在内容上似乎也忘记了这是疯人的日记。当然,这是他的独特创作,完全没有顾及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因而也就没有了可比性。

小说的第三部分是《种种的集会》,这一部分同样是对于现实的嘲讽。小说在列举了许多的所谓研究机构和学会,比如“统一学术研究所”“理性发达所”“主义礼拜会”“清净境公共礼堂”及“儿童讲演会”;等等。这些机构都是研究什么的呢?介绍统一学术研究所时,小说写道:“我在那里看见一个学者用了四万八千倍的显微镜考察人生的真意,别一个学者闭目冥想,要想出化学原子到底有七十七种。又有一个囚形垢面的人,听说是他们国里唯一的支那学者,知道我是中国人,特别过来招呼;他说废寝忘食的——这个有他的容貌可以作证——研究中国文字,前后四十年,近来才发见俗称一撇一捺的人字实在是一捺上加上一撇,他已经做了一篇三百页的论文发表出去,不久就可望升为太博士了,——因为他本来是个名誉博士。”在“理性发达所”创立试验场,用禅宗念佛凡法子叫学生整天背诵“二四得……”这一句话。“初级的人都高声的念‘二四得甲’或是‘二四二千七’等等,——因为这些本来是狂议论,最高级的只有一个人,在一间教室独自念道‘二四得六!’引导的人说他毕业的期已近了,只要他一说出‘二四得七’,那便是火候已

<sup>①</sup>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19日。

到,理性充分的发达,于是领凭出所,称为理性得业士了。至于‘二四得八’这一句话,在那里是不通行的,因为那建设理性发达所的学者自己也是说‘二四得七’的。”此外,还有一个“儿童讲演会,会员都是十岁以下的小学生,当时的演题一个是‘生育制裁的实际’,一个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一个是‘汉高祖斩丁公论’,余兴是国粹艺术‘摔壳子’”<sup>①</sup>。这两个段落绝对是小说家言,只是读者不知是叙述者是疯人,还是被叙述的对象是疯人?讽刺的语言层层深入,妙笔生花;可惜缺少人物本身的语言,当然也没有对话及场景的细节描写。与《狂人日记》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题为《文学界》,这部分依旧是充满了讽刺。作品交代在民君之邦里的文学用植物学家的林那法分类,最高等的是“雅音科”,即假古典派;最下等的是“堕落科”,无韵诗属于这一科。“他们的主张是,‘雅是一切’,而天下又只有古是雅,一切的今都是俗不可耐了。他们是祖先崇拜的教徒,其理想在于消灭一己的个性,使其原始的魂魄去与始祖的精灵合体,实在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厌世的教义。他们实现这个理想的唯一手段,便是大家大作其雅文,以第一部古书的第一篇的第一句为程式,所以他们一派的文章起头必有诘屈聱牙的四个字为记,据说其义等于中国话的‘呃,查考古时候……’云云。”当然,这些人也还是要吃饭,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要说现代人的俗恶的话。作品介绍这一派的文学“为平民和国家所协力拥护,所以势力最大”,他们反对一切旁门歪道,除了“雅音派”以外,凡是志愿为文人者,都要接受一种考试。“第一场试文字,以能作西洋五古一首为合格,第二场试学术,问盲肠炎是本国的什么病等医学上的专门知识。”<sup>②</sup>这一节直接是对于复古派杂志《甲寅》的讽刺,因为在当时只有《甲寅》才是有那么大的政府背景资源,它的主编章士钊官至高位,具有“平民和国家所协力拥护”,特别是要求别人参加考试这件事,只有教育部才有可能做得到,而章士钊当时便担任着教育总长。我们读小说时,感觉到这个疯人很清醒,反而是那些被他批判的人个个是疯子。周作人在小说中太偏重于场面的分析和陈述,很像是杂文式的评论文章,而小说似乎不应该这么写。如果从现代小说的元素来看,周作人的小说缺少了很多东西,与《狂人日记》比较自然相差甚远。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编者跋》,说刚刚把稿子抄完,就来了一位“我的朋友”,这位朋友说这不是真的疯人日记,“因为他没有医生的证明书”,于是乎作者即作罢。但是话锋一转,作者又写道:“有人说,这本来是一篇游戏的讽刺,这话固然未必的确,而且即使有几分可靠,也非用别的篇名发表不可,不能称为真的疯人日记了。”<sup>③</sup>看了这个后记,我想周作人自己也觉得这篇小說有点儿乏味。他转换思路,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这个结尾,即各位姑妄读之,我姑妄言之吧。

### 三、《真的疯人日记》为何比不上《狂人日记》

如果从两个作家本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来看,人生经历比较应该是最为普通的切入点;如果从两篇作品本身的表现方式来看,文本比较应该是最接地气的基础研究方法。如果将这两者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可能会从中看出一些很有个性的东西。

首先,周氏兄弟的生活经历及性格分析。

鲁迅与周作人都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鲁迅在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受过现代医学的正规教育,生理、病理和精神科都是他的学习范围,当然有着比较扎实的功底;周作人看过很多日文英文版

①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21日。

②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23日。

③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晨报副刊》1922年5月23日。

的医学书籍，特别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世界著名学者的代表性作品，比如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等。这是他们共同的知识底蕴和人生经历积累。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家中有病人的精神折磨，“父亲的病”在他们兄弟的童年记忆里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写精神病人，作家自己完全没有必要神经错乱，对此他们都懂得。

再就是社会见闻，据周作人回忆这“狂人”，“却也实有其人”。他说：“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囊囊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喃喃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从周作人对于这件事知道得如此详细，可见他对此关注的兴趣之大和记忆之深。再有关于礼教吃人的问题，周作人解读《狂人日记》的时候说：“章太炎在东京时，时表彰过戴东原，说他不服宋儒，批评理学杀人之可怕，但那还是理论，鲁迅是直截的从书上和社会上看了来的，野史正史里食人的记载，食肉寝皮的卫道论，近时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实，证据更是确实了。”<sup>①</sup>在东京时，他们共同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兄弟有着相似的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和生活见闻，前面说过的“鲁迅的表兄”以及徐锡麟事件，特别是后者，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过。

说起与小说的缘分，周氏兄弟接触小说都很早，古今中外看了不少，在日本时又同时翻译过外国小说，出版过《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青年时代还有边翻译边试作小说的经历，他1905年曾写过《好花枝》和《女猎人》，第二年还创作了小说《孤儿记》，发表在1914年7月的《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7期上。后来又发表了标明“社会小说”的《江村夜话》。前三篇都是用文言写的，后一篇则是半文半白。说起对于小说的兴趣，周作人曾回忆说“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虽林琴南的礼教气与反动的态度终是很可嫌恶，他的拟古的文章也时时成为恶札，容易教坏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sup>②</sup>当然，周作人那时看的小说全都是林琴南译成的古文，这些鲁迅也都读过，而且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用文言写的《怀旧》，再有鲁迅与时在北京大学还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事实上，林琴南的古文并没有“教坏”青年时代的周氏兄弟。如果说文言限制思想的自由发挥，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读书生活，林琴南的小说限制了周作人，而没有限制鲁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周作人的小说和鲁迅比起来，竟然会显得如此之差。鲁迅是怎样实现的创作的成功转型呢？周作人能无视这个问题吗？

我们只能从性格方面找原因，鲁迅热情，周作人冷静。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是需要热情的。而教书生活和散文写作需要冷静，思路清晰，层层深入，直刺论敌要害。同为五四作家，我以为写小说和写散文，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小说更适合于鲁迅，而周作人则更为适合写作散文。也许有

①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16、17页。

②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谈虎集》，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人会问,难道说鲁迅就不适合写散文了吗?要知道写小说的人基本是可以作散文的,而专门写散文的人却不一定写得了小说。说得通俗一点,大凡学者型的人是不适合写小说的,没有办法,这是工作性质和性格使然。鲁迅曾经说过:“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sup>①</sup>他还说:“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近来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sup>②</sup>看来,鲁迅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而周作人却没有。这不是因为水准不够,而是长期教书使其热情不足,因而他在小说创作上失败了。

其次,两篇小说的结构及其描写分析。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写作上是一气呵成的。小说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层层深入,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有心理描写,特别是“狂人”的心理活动,显得既自然又合理。全篇故事一个前言交代来龙去脉,十三节正文,环环相扣,警句迭出,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催人猛醒,振聋发聩,同时又戛然而止,引人深思。

周作人的《真的疯人日记》在写作上是跳跃性的,全篇六节,重点在中间的四个大的部分。前后的《编者小序》和《编者跋》首尾呼应,虽有精神上的联系,但并不是那么紧密。中心的四大部分即《最古而且最好的国》《准仙人的教员》《种种的集会》《文学界》,彼此之间各自独立,虽然写的都是教育、文学界的事,但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是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看一个国,一个制度、一个组织,一批教员,气势非常宏大。但小说是需要细节描写的,而这篇小说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比如写的这个“真的疯人”,他是怎么“疯的”,他的“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等等,恰似空中飞人、空穴来风,书中对这些没有任何交代;再就是这篇日记在写法上,基本都是大段的陈述,借着“疯人”之口说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现实进行讽刺挖苦,虽然小说应该表现作者的观点,如果在表现方式上没有任何艺术的掩饰与遮盖,就显得笨拙了。于是,再深入交代故事情节,就不大像“疯人”的日记了。他没有塑造出一个站得住的鲜活的人物,没有任何的对话,心理活动也非常之少,讽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是大段冗长的说理叙述,使人越看越像是在写讽刺文章,而不是在看小说。因此就失去了可读性。难怪《真的疯人日记》发表后,没有激起任何的涟漪与反响,甚至连一篇评论文章都没有。在《晨报副刊》上它只是一篇文章而已,或者说是一篇疑似小说题目的普通平淡文章。

大概周作人自己当时也感觉到了,他也认为这篇小说没有写好。因为时间仅隔了一个月,他又创作了一篇小说《星里来的人》,还是写疯子的。如果不是他的疯人、狂人情结没有消退,就是他还想在小说创作这方面作最后的努力。开篇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就写道:“他是个疯子。”这个人“他本名叫什么贵”,跟着父亲在海甸做泥水匠,后来游览天坛有了做皇帝的想法,但那时他还没有疯,以后又从北京到塘沽,上了一只大船当水手,杳无音信20年以后,归来跑回故乡去“却是完全一个疯子了”。阿贵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必定站在门外阴阳怪气的吆喝一回,然后就是和村民们的对话,谈的都是星里的事情,比如星里的茶壶和贤人变猪的故事。特别是他每天早晨的吆喝与不厌其烦地讲述星里的事情,听众的人数也从“总有十个八个”到后来的不知多少。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的《祝福》里关于祥林嫂陈述孩子被吃的描写,那种祥林嫂式的唠唠叨叨,在这里被刻意模仿。阿贵在茶社里喝茶时,讲述现实中的茶壶和星里的茶壶之不同,又使我们想

①鲁迅:《厦门通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王世家、止庵校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②鲁迅:《致许广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王世家、止庵校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到鲁迅的《阿 Q 正传》中阿 Q 从城里回来时的那种优越感,讲述城里和未庄对条凳的称谓和葱的切法的区别情景,这也应该是一种在鲁迅小说框架内的简单复制和模仿。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加进来不少鲁迅作品中的常用词语,比如正是交着什么“华盖运”、疯人的名字“叫什么贵”、海甸人绝不这样称呼的“老板”一词、“老拱说,去你的吧”等等。如此之多的鲁迅小说元素,如果不是作者署名为“槐寿”的话,我们一定以为这是鲁迅创作的又一篇小说。可惜它的篇幅实在是太短了,刚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却难以满足人们的阅读心理,因为它没有完整的故事,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可以想见,正是因为周作人自己也觉得《真的疯人日记》不理想,他才有意识地创作更新的小说,用这篇充满鲁迅小说元素的作品,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无论何时疯子和狂人的题材,必定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当然,他也许有借这篇完全是鲁迅式的小说,来掩饰自己此前小说创作的不足之处。但是,他这一次的尝试同样前功尽弃。因为任何的模仿绝不是创作,即使对于像周作人这样的作家来说也不例外。

周作人《真的疯人日记》小说在创作上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惜他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也没有在后来任何的文章中提及。紧接着写的《星里来的人》,可以看作是最后的补充,可惜由于篇幅太短,有些事情还是没有交代清楚,成为最终的遗憾。这个经历使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小说创作。终其缘由,我们只能说是他的头脑过于冷静,像他这样的人不大适合写小说,因为小说创作需要热情。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周作人的《真的疯人日记》,考察周氏兄弟关于疯子、狂人的小说文本书写,可以使我们追寻当时周氏兄弟的思想立场和对社会人生的共同看法;从作品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发展脉络,知道作为鲁迅弟弟的周作人对于《狂人日记》有着怎样的推崇与痴迷,进而可以探究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更可以找寻他们“兄弟恰恰”时期,思想交流与文学互动的轨迹。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成功了,而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再到周作人的《真的疯人日记》却失败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深长思之的研究课题。事实证明,经典有的时候是不可重复的。

## Zhou Zuoren's Failure of Imitating Lu Xun's Novel —From *The Diary of a Madman* to *The Diary of a Real Madman*

Zhang Tierong

(College of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Diary of a Madman*, Lu Xun's debut novel that made him famous, shook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world after its publication and still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day. *The Diary of a Real Madman* is a novel by Zhou Zuoren in which he imitated Lu Xun's writing style. However, this novel caused almost no repercussions after coming out. Comparing the two novels is a significant thing for us to study the varying styles of the Zhou brothers. It fully shows that classics could never be reproduced. *The Diary of a Real Madman* is a failure of Zhou Zuoren's attempt at novel writing. From then on, he completely shifted his focus on essay writing.

**Key words:** Zhou Zuoren; Lu Xun; *The Diary of a Madman*; *The Diary of a Real Madman*; *New Youth*

责任编辑:李宗刚

# “反抗绝望”中的“正能量”

## ——鲁迅“出山”与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契合再探\*

张钊贻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历史与哲学探索学院,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市,407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 鲁迅“出山”参与五四运动,与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宣讲“超人”颇多相似之处。其中“反抗绝望”一点,之前已有很多论述。虽然“反抗绝望”因有“反抗”而非彻底消极,仍然未能说明尼采何以自称为盈溢的太阳。其实,鲁迅恐怕并非是消极被动地让人请出来的。尼采与鲁迅“隐居”十年,实际上都在积聚传统精神文化的“正能量”。鲁迅当初主张“复古”,后来发觉大家对“古”其实都不甚了解,于是设法通过实物去了解过去。所谓“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其实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的积极的“蜂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鲁迅对复兴传统文化的想法并未被人理解和重视,与尼采一样,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孩子”或“新人”。

**关键词:** 鲁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复兴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30-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4

### 虚无的反抗并不虚无

鲁迅“出山”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查拉图斯特拉(一般认为寄托着尼采自己,或等同于尼采)“下山”宣讲“超人”,其心态与经历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此,笔者在其他论文比较鲁迅与尼采的过程中略有提及<sup>①</sup>,但仍觉得意犹未尽,需要补充。其主要原因是对他们“反抗绝望”或“反抗虚无”的契合,讨论得并不全面。

对所谓前期的鲁迅或“五四”前后的鲁迅,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常常强调他的“反抗绝望”,这种概括自然有一定的根据。就以《呐喊·自序》为例,从学医救国想法的破灭到文艺运动没人响应,落得无聊、悲哀和寂寞,鲁迅只有设法“麻醉”自己的“痛苦”。在钱玄同积极劝说下,他勉强参与新文化运动,因为: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sup>②</sup>

理由其实很单薄。后来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

\* 收稿日期:2020-03-05

作者简介:张钊贻(1954—),男,澳籍华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探索学院客座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博士。

①[澳大利亚]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368-377页。

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442页。

③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是自欺……”<sup>③</sup>可见,鲁迅当时的精神状态颇为消极。

精神状态消极却积极投身改革,表面上看当然是矛盾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鲁迅特有的矛盾。笔者曾力图说明这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也不矛盾,理由是:消极、“绝望”并不等同于完全的“负面”与彻底的“否定”。即使我们认为鲁迅在“反抗绝望”,这“反抗绝望”中的“反抗”本身就说明鲁迅并非完全“绝望”;即使鲁迅一度接近“虚无”的反抗(或反抗“虚无”)的极端状态(这里指《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向社会报复、带点恐怖主义意味的“无治的个人主义者”)<sup>①</sup>,其“反抗”显然仍有积极意义<sup>②</sup>。然而,说明“虚无”即“绝望”有其对立面,仍然没有说明和展示“绝望”对立面即正面的鲁迅思想态度的存在,这是需要补充的。

笔者当初比较鲁迅“下山”与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之时,因强调了鲁迅的“反抗绝望”,所以对查拉图斯特拉也侧重了他的孤独、碰壁、被误解和被嘲笑的遭遇。这一侧重,也就忽略了他“下山”正面的东西。同样,鲁迅在发起文艺运动失败后设法“麻醉”自己的差不多十年期间,其实也在积累“正能量”。所谓“正能量”,是指其积极的思想,尤其是来自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但鲁迅自己谈论得不多,因此,也被研究者忽略了。补充鲁迅“反抗绝望”的正面意义,展示其中的“正能量”,同时也就是补正鲁迅与查拉图斯特拉即尼采的契合,这是本文的目的。

### 盈溢而孤独的太阳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本孤独之书,一般都认为是尼采自况,寄托着尼采的思想。但孤独并不意味悲观绝望。在尼采笔下,查拉图斯特拉30岁“上山”。独处10年后,心境改变,醒悟到万物如果没有太阳照耀,何来幸福?一天,他步出山洞,面对朝日,像宣言般感慨道:

每天早上我们都在等你,撷取你所盈溢的,为此祝福你。

看哪!我的智慧已超出负荷,像蜜蜂采了过多的蜂蜜,需要有人伸出手来接受。

我该要赠与,分发,直至人类中的智者,再次为他们的愚蠢而高兴,贫困者,再次为他们的富有而高兴。

为此,我必须下到深处,一如你晚上那样,在落到海后,依然给地下世界带来光明。你这也太富有的星辰啊!<sup>③</sup>

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决定“下山”,回到人间,要向人们“馈赠”他超负荷的智慧。

首先,查拉图斯特拉“下山”遇到的是在树林的神圣小屋出来到处寻根的老人。所谓“神圣小屋”,大概是教堂或修道院的象征,而老人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一个圣者。老人见到查拉图斯特拉,反对他“下山”回到人间,但查拉图斯特拉回答说,他“爱人”,他要赠与,所以没有接受圣者的忠告,毅然继续走下去。当查拉图斯特拉走出了树林,到了最近的一个城镇的市集广场,那

①[澳大利亚]张钊贻:《“折射”成黑色的“超人”》,《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7-223页。

②[澳大利亚]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7-288页。

③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rster Theil, “Zarathustras Vorrede”, 1; Giorgio Colli/ Mazzino Montinari (hrsg.),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erlin: dtv/ de Gruyter, 1980, Vol.4, p.11. 按:此即意大利尼采专家科利和蒙坦拿利合编的15卷本审订学习本《尼采文集》,是目前学界最普及并可靠的版本,由柏林德格律特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KSA。此版德文拼写没有按现代标准处理。本文中译均为笔者所译。参考了Walter Kaufmann的英译(*The Portable Nietzsch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也参考了Graham Parkes的英译(*Thus Spoke Zarathust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Graham Parkes的英译附有很多注释,对了解文本的出处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诠释,亦参考了Douglas Burnham and Martin Jesinghausen, *Nietzsche's Thus Spoke Zarathustr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里正好聚集着等候观看走绳索的表演的人群。于是,他向观看表演的人群宣讲他超负荷的智慧:“超人”(Übermensch)的道理。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后来甚至还遭到小丑和掘墓工嘲笑。因此,查拉图斯特拉醒悟到,他不应该面向群众,而应该找破坏者即创造者、收获者和庆贺(收获)者做同伴。<sup>①</sup>

然而,接下去查拉图斯特拉遇到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学者、诗人、虔诚的信徒、他的信徒、有道德的人、有声誉的智者、“高人”(höheren Mensch)、年老年轻的女人、最丑的人、巫师、教宗、漫游者,等等。他们或憎恶他,或反对他,或不懂他。他想要馈赠的智慧,基本上没有人领情,也没有人懂得领受。查拉图斯特拉仍是个孤独者。最后,查拉图斯特拉回到原来的山洞,虽然身边多了一帮“高人”即创造者<sup>②</sup>,但是,他并未满意。一日早晨,他走出山洞,又向太阳发了一顿牢骚:“我已经醒来了,而那些高人,仍然在睡觉。他们不是我要的同伴……我还缺乏合适我的人类!”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寄望于他“即将到来的小孩”<sup>③</sup>。查拉图斯特拉离开山洞,走出黑暗的山峦,回到了本书开头的场景,全书随即结束。

鲁迅跟查拉图斯特拉这些思想与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前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在森林与老人圣者的对话。老人对查拉图斯特拉说:

那时你携灰“上山”:现在你要带火入谷么?你不怕纵火的惩罚么?……查拉图斯特拉是个醒过来的人;你到睡着的人们那里去要什么?

查拉图斯特拉的回答则是,他“爱人”,他要赠与<sup>④</sup>。查拉图斯特拉的“爱人”是什么意思?他“爱人”是因为人能“走过去”(Übergang,也可理解为“超克”)也能“走下去”(Untergang,也可理解为“没落”),这带给他爱和希望。<sup>⑤</sup>后来他发现,他“爱人”其实也是出于“同情”(Mitleiden)。<sup>⑥</sup>这种“同情”并非怜悯<sup>⑦</sup>,虽不至于“哀其不幸”,但跟“怒其不争”相去不远<sup>⑧</sup>。

老人所谓“到睡着的人们那里去”,自然令人想起《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对话。<sup>⑨</sup>老人圣者跟查拉图斯特拉的对话,是劝积极的查拉图斯特拉不要“下山”,而钱玄同则是劝消极的鲁迅入世“出山”,目的与角色虽然颠倒,内容却颇相似。自从鲁迅在日本发起文艺运动失败之后,鲁迅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也无法说服别人,于是跟查拉图斯特拉相仿,“隐居”起来,也是差不多10年。钱玄同努力劝说悲观犹豫的鲁迅写文章,投身文化革命的战斗,以可能的希望说服了鲁迅不再“隐居”,起来唤醒“熟睡的人们”,打破“铁屋子”。

鲁迅的“出山”和查拉图斯特拉的“下山”,都像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一样,是传播启蒙的思想,而且都是以孤独的觉醒者的姿态,走进熟睡的人群。由于中国的处境更加紧迫,鲁迅在熟睡的人们之上,又加上令人窒息的“铁屋子”。但不管情况如何,查拉图斯特拉跟鲁迅一样,都得

①以上均见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rster Theil, “Zarathustras Vorrede”, KSA, Vol.4, pp.11-28.

②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Vierter und letzter Theil, “Vom höheren Mensch”, 11. KSA, Vol.4, pp.362.

③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Vierter und letzter Theil, “Das Zeichen”, KSA, Vol.4, pp.406-408.

④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rster Theil, “Zarathustras Vorrede”, 2. KSA, Vol.4, pp.12-14.

⑤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rster Theil, “Zarathustras Vorrede”, 4; Vierter und letzter Theil, “Vom höheren Mensch”, 3. KSA, Vol.4, pp.16-18, 357-358.

⑥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Vierter und letzter Theil, “Das Zeichen”. KSA, Vol.4, pp.408.

⑦[澳大利亚]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200页。

⑧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⑨《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441页。关于这次对话的时间和“微观语境”,张丽华有详细的考证,见其《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181页。

不到人们的响应，迎来的只是不解或者嘲笑。有趣的是，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第一次宣讲“超人”，而“超人”就包含着“疯狂”(Wahnsinn)；<sup>①</sup>无独有偶，鲁迅“出山”后的第一部作品便是《狂人日记》，也是疯狂，而且以“救救孩子”为结尾，也跟查拉图斯特拉最后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小孩”一样。他们都用孤独的“狂人”去启蒙“熟睡的人们”，其“疯狂”其实有一定的必然性。<sup>②</sup>

尽管鲁迅与查拉图斯特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即鲁迅表面上没有表现为太阳，或采了过多蜂蜜的蜜蜂。实际上，鲁迅在“隐居”期间，采了很多传统文化的蜂蜜，只是不欲明言罢了。

### “不后于世界”的“复古”

鲁迅很可能参加了光复会，至少跟光复会的一些主要人物如章太炎(1869—1936)、陶成章(1878—1912)和龚宝铨(1886—1922)，在辛亥革命前后有过颇为密切的接触<sup>③</sup>，也跟南社有点关系。<sup>④</sup>光复会和南社都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传统文化更是尊崇备至。这一特点，在鲁迅早期的文章里面有所反映。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一开始就批评那些“稍稍耳新学之语”的“近世人士”，“掊击旧物，惟恐不力”，“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虽然他也知道中国因长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讎”，“益自尊大”，“宴安日久”，“上征亦辍”<sup>⑤</sup>，但鲁迅的潜台词明显认为传统文化是很有价值而值得珍视的，所以他在讨论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sup>⑥</sup>。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中国，或者说是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鲁迅还说，“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sup>⑦</sup>。然而，鲁迅虽然“怀古”，但却又“今且置古事不道”，什么原因？没有解释，我们只能推测。

“今且置古事不道”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估计，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跟光复会和南社那些复古的主张有所不同。以南社为例，鲁迅批评他们：

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sup>⑧</sup>

鲁迅的概括是否符合南社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暂且不论。鲁迅的意思是，南社的人们只尊崇传统文化，没有“外”和“今”的世界视野，使他们的革命只是为了复古，缺乏面对外来现代挑战所需要的吸收别人长处进行的改革和“上征”。其中一些主张复古的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爱亡国

①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rster Theil, "Zarathustras Vorrede", 3. KSA, Vol.4, p.16.

②[澳大利亚]张钊贻：《〈狂人日记〉的历史寓意及其超越历史的启示》，《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③项义华：《鲁迅与光复会关系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顾农：《鲁迅与光复会关系通考》，《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④张能耿：《鲁迅与越社》，《鲁迅亲友寻访录》，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第382—388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7页。

⑥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对照《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1页。

⑦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⑧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者”<sup>①</sup>。鲁迅“五四”时期批评主张复古的人,同样也适用于光复会和南社一些人身上。鲁迅认为:

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sup>②</sup>

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们”虽然主张复古,但对“古”实际是怎么样,其实一点都不知道。而鲁迅本人其实也未能幸免。在现代考古学还没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是鲁迅“今且置古事不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但无可奈何的“不道”,并没有阻止鲁迅去探求,这又是他跟大多数主张“复古”的人,包括光复会和南社的一些人的差异所在。

在钱玄同劝说鲁迅“出山”的对话中,鲁迅说自己当时只是“钞古碑”,好像对世事全都不关心了,事实并非如此。<sup>③</sup>1913年,鲁迅的同乡兼同事胡孟乐赠送鲁迅10枚山东武梁祠画像石拓本,这是《鲁迅日记》最早有关汉画像的记载,自此之后,鲁迅开始搜集汉画像。<sup>④</sup>鲁迅搜集汉画像并非仅仅是收藏“古董”“雅玩”,其中自然有艺术史的意义,姜异新称之为“鲁迅式文艺复兴”<sup>⑤</sup>。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欧洲文艺复兴其实不限于“文艺”<sup>⑥</sup>,鲁迅搜集汉画像也不仅仅是想促成中国传统艺术的“复兴”。

1934年,鲁迅致台静农信谈及自己刊印画册的目的,包括“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sup>⑦</sup>,目的性很鲜明,就是要知道“古”的情形怎样。正因如此,鲁迅对汉画像中表现日常生活或风俗,诸如嘉祥关庙、肥城孝堂山和嘉祥郗家庄的画像,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解读。<sup>⑧</sup>鲁迅收藏古物,如明器、兵器、玩具和镜子等<sup>⑨</sup>,也显然有同样的目的。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早认为国民有“内曜”与“心声”的自觉与个性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内曜”与“心声”的表现和培育,与神话、宗教迷信、民间赛会、诗歌、舞蹈有密切的关系。<sup>⑩</sup>当他看到汉画像中的神话、舞蹈、斗兽、杂技等等,是否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确证而感动?而兴奋?后来鲁迅欲选汉石画像“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结集出版,也就很自然。<sup>⑪</sup>

从汉武梁祠画像、北魏至唐佛教的信士像,鲁迅就知道古人的胡子是向上翘的,元朝以后才拖下来,而当时社会把“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或把原来的样式看成是外国式。<sup>⑫</sup>鲁迅逐渐发

①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对照《论睁了眼》,《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②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③张丽华就指出鲁迅关心当时文坛,当然也有工作的原因,见其《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④关于鲁迅与汉画像,参考叶淑穗:《鲁迅〈汉画像考〉初探》,姜异新:《今人如何遥想古人,西方如何观看东方?》,上海鲁迅纪念馆等编:《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36-67页。

⑤姜异新:《今人如何遥想古人,西方如何观看东方?》,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60-64页。

⑥[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⑦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⑧叶淑穗:《鲁迅〈汉画像考〉初探》,上海鲁迅纪念馆等编:《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43-47页。

⑨王锡荣:《从日记看鲁迅怎样收藏》,《日记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92-100页。

⑩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36页。

⑪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2页。

⑫鲁迅:《坟·说胡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184页。

现,很多人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却是中国本来就有或本来就是那样的。<sup>①</sup>事实上,鲁迅同时代人鼓吹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被歪曲破坏了的传统文化。<sup>②</sup>1924年,鲁迅去西安,除了可能与写作《杨贵妃》有关,估计也有趁此机会了解“古”的情形的用意,尽管写作的念头打消了<sup>③</sup>,鲁迅并非完全没有所得。他看到了昭陵上“带箭的骏马”和鸵鸟,看到了唐朝人跟汉朝人一样的“囚放”。<sup>④</sup>从汉画像和古器物中,鲁迅采了很多“蜂蜜”,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隐居”期间,鲁迅还大量阅读了佛教典籍。鲁迅对佛教有毁有誉。他在许寿裳面前大赞过佛学<sup>⑤</sup>,不过也认为印度的书令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sup>⑥</sup>。这“实人生”很值得注意。鲁迅表达过他对佛教这样的看法:

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食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sup>⑦</sup>

看来,他主要不是看重作为宗教的佛教,而是钻进作为历史的佛教。那么,他手抄《法显传》的动因也就很明了。<sup>⑧</sup>鲁迅也从佛教的历史中,看到值得继承发扬的“舍身求法”的传统精神<sup>⑨</sup>,他从中采了很多古人的“蜂蜜”。

由此说来,当鲁迅诉说他在日本发动文艺运动失败之后,“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其实不完全是消极和“绝望”,而是积极“回到古代”去采蜜,积蓄“正能量”。当钱玄同劝他“出山”时,鲁迅恐怕已经采了“过多的蜂蜜”,已无须太多的说服,便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投身于他的“文艺复兴”,一场双重否定的“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he)实现“不后于世界”的“复古”<sup>⑩</sup>。

### 结束语:回到“拿来主义”

查拉图斯特拉离开山洞“下山”去人间,云游四海之后,又回到山洞,即使他仍然觉得自己盈溢如太阳,到头来并未被人完全理解,只能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孩子。爱人而充盈的太阳,几经努力,仍摆脱不了寂寞的结局。这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矛盾。看来并非他独有的矛盾。恐怕也算不上是矛盾,更多的是必然的命运。

姜异新注意到鲁迅搜集汉画像有两个“峰值”,分别是1915—1916年在北京期间和1935—1936年在上海期间。<sup>⑪</sup>一是他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但影响只能体现在“五四”时期),一是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2—84页。

②[澳大利亚]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98页。

③陈平原:《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

④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⑤黄继持:《鲁迅与佛教》,《鲁迅·陈映真·朱光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78页;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89—401页。

⑥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⑦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⑧鲁迅:《鲁迅日记1916年3月》,《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⑨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⑩[澳大利亚]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248页。

⑪姜异新:《今人如何遥想古人,西方如何观看东方?》,上海鲁迅纪念馆等编:《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51页。

他去世前的一年多。这两个“峰值”,似乎也伴随着鲁迅对复兴传统文化特殊关怀的两个高潮。《坟》跟《且介亭杂文》及《且介亭杂文二集》其实有不少文章是相通的,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问题上。这两个“峰值”其实颇有点回归的意味。<sup>①</sup>在《看镜有感》中,鲁迅就呼吁学汉、唐的古人,“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sup>②</sup>。后来在《拿来主义》中,鲁迅又大声疾呼:“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sup>③</sup>,这“拿来”包括对传统的批判继承。鲁迅是否认为他的“重估一切价值”并未为人们所理解?就像查拉图斯特拉的遭遇一样,需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再次发出号召?或寄希望于未来的“新人”?如果笔者推测没错,则鲁迅仍有不少寂寞,还有很多“未完成”之事。<sup>④</sup>尽管如此,鲁迅之所以能够反抗这现实的寂寞,其实正是因为他内心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正能量”。

## “Positive Energy” in “Resisting Despair”

—Re-examining the Affinities of Lu Xun’s “Coming Out” and Zarathustra’s “Going Down”

Zhang Zhaoyi

(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quir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ueensland, 4070;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Lu Xun’s “coming out” of his seclus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Zarathustra’s (i.e. Nietzsche’s) “coming down” from the mountain to preach “the Overman.” “Resisting despair” is one of them and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Although “resisting despair” is not fully pessimistic because of its “resistance”, it still can not explain Nietzsche’s positive attitude in his claim that he was like an effusive sun. In fact, Lu Xun was not persuaded to get out and break away from his pessimism. During the ten years of Nietzsche’s and Lu Xun’s “seclusion”, they both were accumulating the “positive energy” of inheriting cultural tradition. Lu Xun used to advocat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st”, but later he realized that his contemporaries knew very little of the “past”. So h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past” through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such as mirrors, sculptures, engravings and others. When Lu Xun said he “went deep down to the people and went back to the past”, he was in fact collecting the “honey” of Chinese tradition. Howev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time, Lu Xun’s contemporaries did not share nor pay attention to his ideas of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ike Nietzsche, Lu Xun could only rest his hope on the “children” and “new people” of the future.

**Key words:** Lu Xun; Nietzsche; Zarathustra;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孙秋英

<sup>①</sup>例如《且介亭杂文》的《拿来主义》和《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与《坟》的《说胡须》和《看镜有感》就可以对照读。此外,《且介亭杂文》的《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也可以跟《坟》的《灯下漫笔》和《论睁了眼看》对照读。这些主要是批判性的,但批判是为了继承和复兴。

<sup>②</sup>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sup>③</sup>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sup>④</sup>[澳大利亚]张钊贻:《“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从〈非攻〉到〈墨攻〉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89页。

# 地母、故乡和生态忧思

## ——鲁迅的大地诗学论\*<sup>①</sup>

王家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 鲁迅的作品为读者描绘了山川、原野、花草、动物的样貌和状态,他通过地母情怀的抒写和诗意返乡的观照,与大地建立了亲密的精神关系,他的创作是对大地野性之美的一种诗意呈现。鲁迅拥有丰盈而深刻的生态书写,这体现在他的维护林野的思想、对土地沙漠化的关切、对水资源匮乏的忧思、对生态平衡自然伦理的探讨等方面。鲁迅的自然审美观也显示了其独特性。任何与大地建立亲情的作家都是大地的赤子,鲁迅对大地及大地上的人和事的诗意呈现正是一种大地诗学的敞开。

**关键词:** 鲁迅;生态观;大地诗学;自然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37-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5

鲁迅拥有丰盈而深刻的生态书写。迄今为止,有学者撰文论述了鲁迅与植物(花、草)、动物、大地(山、水)的关系,也有学者从生态角度探讨鲁迅小说所具有的生态意识。论述鲁迅与植物的关系主要有孔昭琪、孔见的《鲁迅与花卉》<sup>②</sup>、姜斌的《鲁迅与花卉》<sup>③</sup>、陈根生的《“只有梅花是知己”——鲁迅与花卉》<sup>④</sup>。这几篇文章主要论述鲁迅对种植花卉的兴趣,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对花卉的喜爱及其写作之间的关系。

论及鲁迅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论著相对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sup>⑤</sup>,该书第十四章《人与兽》专门探讨了鲁迅与动物的关系。钱理群认为,鲁迅作品中有三组“兽”的系列形象:第一组,猛兽恶鸟,如怪象、猫头鹰、狼等;第二组,幼小柔弱的动物,例如小兔、小鸭、小老鼠等;第三组,“中间型”的动物,如猫、狗、蚊子、苍蝇等。这一成果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此外,靳新来的《“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sup>⑥</sup>从鲁迅作品中择取十几个有代表性的动物意象进行分析,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对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系统进行了梳理,在该领域有所创新。

关于鲁迅生态思想的论述,主要有汪双英的《论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意识》<sup>⑦</sup>及王

\* 收稿日期:2020-03-20

作者简介:王家平(1965—),男,浙江庆元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翻译与创作的对话关系——从鲁迅译作探索近代中外文学交流的轨迹”(17AZD032)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作品注释历史及其理论问题研究”(16WXB010)的阶段性成果。

② 孔昭琪、孔见:《鲁迅与花卉》,《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③ 姜斌:《鲁迅与花卉》,《中国花卉盆景》1988年第6期。

④ 陈根生:《“只有梅花是知己”——鲁迅与花卉》,《森林与人类》1994年第6期。

⑤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⑥ 靳新来:《“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⑦ 汪双英:《论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意识》,《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9期。

建荣的《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情结》<sup>①</sup>,二者以《故事新编》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理水》《奔月》《补天》所反映的古代生态问题,论述较为概略。

鲁迅与大地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他对动植物的书写,而且体现在他对古代生态的关注上,因此需要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拓展鲁迅的生态书写和自然审美探索。鲁迅与乡土、故园及其生长于此间的生命建立了深度的“交往”关系,并对荒野、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富于前瞻性的生态学思考。因着人文主义的观照,鲁迅的生态学思想具备了大地诗学的旨趣和风味。

## 一、鲁迅与故乡大地的精神交往

世界主要文明体系的神话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类的起源——人来自于泥土,天神以土造人,大地为人类的祖母、母亲。在鲁迅笔下,乡土、故园具备了精神母亲的品性。

### (一)地母情怀的抒写

鲁迅不亲自从事稼穡活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但是他对乡村、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鲁迅的母亲是绍兴乡下安桥头村人,他常跟随母亲去乡下探亲,获得了体察乡土和乡土上的生命的机会。鲁迅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人,他看到了中国妇女,包括自己的母亲所具有的忍耐、勤劳、宽厚、慈爱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就像土地一样,默默地奉献——繁殖和养育着人们。鲁迅是有着深刻历史感受力和地母情怀的作家,这样的感受和情怀来自远古的女媧及其后世儿女们的母性召唤。

女媧在中国神话中被视作人类的始祖。关于女媧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有许多个版本,但旨归是一致的:女媧是造人者,并且炼五色石以补天缺,造福人类。《太平御览》第78卷引汉代应劭的《风俗通》这样描述女媧造人的过程:“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媧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埴泥中,举以为人。”<sup>②</sup>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小说《补天》原题《不周山》,是在女媧神话的基础上写就的。在鲁迅心目中,女媧就是地母的原型,女媧具有地母的品质——不辞辛苦抟黄土造人,是人类的母亲,她炼石补天,任劳任怨而养育人类。鲁迅的《补天》书写了女媧造人的辛苦和疲倦:

伊近于失神了,更其抡,但是不独腰腿痛,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力,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喘息一回之后,叹了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下来,也困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sup>③</sup>

除了女媧,鲁迅还塑造了一批来自大地、程度不同地具有地母品质的女性人物,长妈妈、祥林嫂、单四嫂子等都是这个系列中的女性生命。鲁迅对自己幼时的保姆长妈妈的书写尤为感人。长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保姆,但正是从这位保姆身上,鲁迅看到了如地母一样沉默地爱着、付出着的劳动妇女的美好人格。在45岁的中年时光里,鲁迅饱含深情地歌咏自己儿时的保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sup>④</sup>

祥林嫂、单四嫂子等都是中国千百万母亲的缩影——爱自己的孩子胜于一切,具有与土地一

①王建荣:《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情结》,《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②李昉等:《太平御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65页。

③《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④《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样沉默的、纯厚的品质。

## (二) 诗意返乡的观照

故乡在诗学意义上也是人的母亲,怀恋乡土之情是一种特殊的亲子之情的表达。侨寓他乡的人往往更加思恋乡土。去乡多年的鲁迅,深情款款地表达着对故乡的眷念: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sup>①</sup>

鲁迅这篇温暖人心的《朝花夕拾·小引》,揭示了人们通常借由回忆故乡和儿时生活进行着返回精神故乡的心路历程,以及人们与故乡大地的深厚感情。

儿时故乡的风景和风景里的伙伴就更加美好了。鲁迅在小说《故乡》里书写道:“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sup>②</sup>在描绘故乡景色的时候,鲁迅像一个画家一样,将深蓝、金黄、沙色、碧绿……各种颜色泼洒在读者面前,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水墨画,而手举钢叉的少年和逃走的獾又是那样富有动感,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动静皆宜的艺术境界,作家对童年时代以及故乡的眷恋之情也呼之欲出。

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更是调用声音、色彩、气味诸种意象,描绘了一片童年的乐土: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sup>③</sup>

还有那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这些都是孩提时代最理想的玩物,鲁迅自然对这些能带给人们无限乐趣的草木虫鸟念念不忘。能将儿童乐园如此活灵活现地复原出来,恐怕也唯有怀着故乡之情、赤子之情的人才能做到。

鲁迅素有热爱自然、大地的温情脉脉的一面。遗憾的是,他在很多读物中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尤其是当鲁迅写作疲倦时,他以进入梦境、精神返乡、回忆童年生活等方式使自己身心获得休憩。他的作品为我们呈现的便是一幅幅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故乡生活画卷。

在梦中展开的散文诗《好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优美和谐的生态图景:美丽、优雅、有趣,充满动感。因此,当这梦中的“好的故事”破碎的时候,会引起人们的怅惘和惋惜。鲁迅故乡的山阴道就是美的所在,它很早就已进入文人的视野。“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状写东晋山阴的灵性美景:“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sup>④</sup>《世说新语》记录了王献之对山阴自然生态的诗意描写:“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sup>⑤</sup>因着这对并世无双的书法大师父子的生花妙笔,绍兴山阴道景观成了中古时代山水的典范和中国自然审美的象征。

鲁迅对山阴道的关注,既与前人的影响有关,更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独特感受基础上。鲁迅将故

①《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③《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

④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⑤刘义庆:《世说新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乡的风景、人物、风俗融为一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在散文诗《好的故事》中娓娓道来: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sup>①</sup>

这是一幅充满情趣的田园牧歌图,但它不像多数中国山水画卷那样一味地静谧。它是动态的、展开的,各种人物、事物都交响融合在一起,顺着船行的路线,树木、野花、新禾、家畜、茅屋、村女、和尚、天、云……由近及远地一一映入眼底,各种颜色杂糅其间,是一幅色彩明丽的卷轴山水画。也可以说,这是鲁迅心目中的大地美学的样本。

作家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中的抗日故事正是在激荡的大地、动态的自然中展开的,因而深得鲁迅的好评。鲁迅颇为欣赏地指出,在《八月的乡村》里面,“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蝻蝻,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sup>②</sup>。对动态之美的推崇,使得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朱光潜等学者所倡导的“静穆之美”多有批评。

## 二、鲁迅丰盈而深刻的生态观念

### (一)维护林野的思想

鲁迅对大地的热爱也体现在他对自然的敬畏上。他主张保护自然,包括保护自然中的文物、古迹以及林野。1913年,作为教育部主管文物和博物馆官员的鲁迅撰写了政府文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关于林野保护的看法更能凸显他超前的生态意识:“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sup>③</sup>从某种程度上看,鲁迅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建立动物和植物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的构想。他主张大自然中的植物和动物自由生长,让林野保持荒芜状态,这种观念与后世的让荒野保持自我休养生息的生态思想非常契合。

近世以降,自居宇宙中心、万物灵长的人类对自然过度索取,人们“涸泽而渔”“杀鸡取卵”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正使自身深陷生态危机之中: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20世纪后期,人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产生了诸多关于保护森林、野地、动植物的生态学思想体系。众多的哲学家和作家都看到了荒野的价值。“荒野的美能给生活增加一种精神性的东西。”<sup>④</sup>“即使只是为了自私的缘故吧,我们也必须保持自然的多样性与和谐……荒野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保护人化自然和维持精神健康的必需品。”<sup>⑤</sup>早在100多年前,鲁迅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保护林野及生活在其中的动物的重要意义,显示了他在生态思想领域卓尔不凡的前瞻性。

因为痛心于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鲁迅把目光投向充满原始气息的林野和小岛,并且对19世纪末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离开欧洲前往太平洋海岛塔希提(又译作大溪地,鲁迅译为泰息帝)的生活道路满怀兴趣。他着手准备翻译高更记录自己在塔希提岛上生活的散文集《诺阿,诺阿》,并为这部计划翻译出版的文集写出了序言,显示了鲁迅对太平洋小岛蛮荒生活的向往:

①《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③《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④[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⑤Rene Dubos, *A God With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pp.166-167.

《Noa Noa》法国戈庚作,罗忱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sup>①</sup>

## (二)对土地沙漠化的关切

鲁迅的生态忧患意识体现在他对中国土地沙漠化的关注上,他的《〈进化和退化〉小引》集中体现了其卓绝的生态思想。这篇文章是鲁迅为其三弟周建人的译著所作的序言。《进化和退化》系周建人“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目的在于“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和“中国人将来的命运”。该书共8章,分别是“生物的进化”“进化的生理学上的证据”“人的进化”“一生的经过”“生育节制”“结群性与奴隶性”“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及“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从这些译作篇目可以看出,周建人非常关注生态问题和土地沙漠化问题。他的这些译作应该促进了鲁迅对中国生态的关注和思考。

相对来讲,鲁迅更看重周建人这部译著最后两章内容,即《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作者是匈牙利的英吉兰兑尔)和《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作者是美国的亚道尔夫)。关于华北的沙漠化问题,《进化和退化》一书指出:“中央亚细亚今日是大块的干燥沙漠,只有极小范围的地方尚能生活极少数的人民”,“森林的毁坏无他,慢慢的把人类自杀而已”。<sup>②</sup>“中国人从北侵蚀过来,中国史上及传说上的圣地山东,是这民族及国家最早驻足的地方之一。那地方的接近沙漠状况是很自然的;但中国全境,下到香港广东,都要表示将要成沙漠的记号。观看围绕香港及九龙的山坡。看看北方的诸省。这等地方都逐渐的变到沙漠去。”<sup>③</sup>

周建人编译的这篇英吉兰兑尔的文章研究了森林毁坏、沙漠南移给华北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这给了鲁迅极大的启发。鲁迅联系中国的实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在读到美国记者史沫得列(史沫特莱)在《萌芽月刊》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之后,认识到保护树木和人民生存之间的深刻关系。在鲁迅看来,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还要把人的生存摆到重要位置。而当时的地方政府置百姓生存不顾而保护林木,其结果只能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sup>④</sup>。保护环境与维持人的生存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取得平衡。因此,鲁迅意识到仅仅靠自然科学并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他把生态改善的希望寄予了社会科学,主张将自然生态治理与社会生态治理联系起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土地沙化、农业衰败相关的是中国人的营养状况的令人堪忧。鲁迅充满忧患地写道:“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sup>⑤</sup>鲁迅把生态问题提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显示了他的忧患和洞见。

## (三)对水资源匮乏的忧思

关于中国水资源的匮乏,鲁迅其实不止一次谈论过。“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sup>⑥</sup>这其中“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的论断在今天更是振聋发聩,它警醒人

①鲁迅:《〈文艺连从〉》,《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4页。

②周建人辑译:《进化和退化》,上海:光华书局印行,1930年,第188页。

③周建人辑译:《进化和退化》,上海:光华书局印行,1930年,第180页。

④《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们应该正视水短缺、水污染等问题,深思如何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除了《〈进化和退化〉小引》体现的超前的生态意识外,鲁迅还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靠天吃饭”》中谈到水的珍贵。水是地球上的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一旦面临缺水的困境,人类的生存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中,鲁迅阐述了水的珍贵。尽管他主要是想抨击官民阶级的不平等:“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sup>①</sup>但浙江余姚朗霞镇的村民将乡邻殴打致死,起因正是水的短缺。“靠天吃饭”的农民更知道水的重要。如果水极度短缺,那就会像鲁迅在《〈进化和退化〉小引》中所说的那样,“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在阿拉伯半岛,事情果真是这样的。鲁迅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中指出:“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sup>②</sup>可见,鲁迅的忧思范围已经扩展到全球生态危机,他对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有着深切的关注。

在《“靠天吃饭”》一文中,鲁迅还提到:“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洋大人斯坦因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sup>③</sup>这正说明水对于人,尤其是对于处于沙漠之中的人们的重要。关于如何解决水短缺的问题,鲁迅也有所论及。他反对“靠天吃饭说”,认为决不能坐等上天给饭。环境被破坏、生态被毁灭,绝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天时不正”造成的,其实是人祸大于天祸。他的言下之意是,自然生态治理与社会生态治理应该联系在一起展开。

#### (四)对生态平衡自然伦理的探讨

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由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光、水、土壤、空气等组成。自然界中的每一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统一整体,通过相互作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一状态被称为生态平衡。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在他著名的生态学著作《沙乡的沉思》中提出了自然共同体中的土地伦理概念:“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sup>④</sup>《吕氏春秋·情欲》也指出:“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sup>⑤</sup>如果人为破坏这种关系,就会打破生态平衡,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然而,当现代性的进程不断加快的时候,“在强大的技术力量统治下,社会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被大大简化了,日渐富裕的时代却又成了一个日趋贫乏的时代”<sup>⑥</sup>。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刚刚开启现代性的征程的时候,鲁迅就已经注意到生态平衡问题,并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维护生态平衡的可贵思想。

在《“蜜蜂”与“蜜”》一文中,鲁迅探讨了生态失衡的问题。鲁迅以一个生态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蜂多花少这一问题: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

①《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③《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

④[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侯文惠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⑤高诱注:《吕氏春秋》,毕沅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⑥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sup>①</sup>

一般人可能更多地关注蜜蜂对传播花粉的作用,很少留意蜂多花少的可怕后果,鲁迅针对期刊《涛声》所提出的问题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真是蜜蜂多而花少的话,那么将导致生态灾害。鲁迅指出:“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他在文章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道:“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sup>②</sup>也就是说,保持生态平衡是很重要的,否则将酿成生态灾害。

鲁迅的小说《奔月》写作的初衷并不在于探讨生态平衡的问题,但它暗含了鲁迅的生态平衡思想,小说通过羿和妻子嫦娥的平凡生活的书写,折射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态问题。羿与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其原因在于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单一,“乌鸦肉的炸酱面”成了他们餐桌上的常食。羿每天早出晚归去打猎,但常常一无所获,他因此对嫦娥很愧疚,造成这种局面并不是因为羿不努力,也不是因为羿的箭法不好,而是因为大地上的动物早已被羿射杀得差不多了,他实在是“无的放矢了”。

与当时的原始居民一样,羿不懂狩猎和驯养的关系,只是一味地射杀地上的封豕长蛇,而没有给动物留下再生繁衍的余地,致使生物链被完全破坏,结果就只有乌鸦和少得可怜的麻雀可以入食了。孟子曾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sup>③</sup>。今人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平衡思想,与孟子上述观点形成了呼应。

事实上,人一旦违背了生态平衡思想,就只能像羿那样坐在屋中回忆“当年的封豕是多么大,远远望去就像一坐小土岗,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sup>④</sup>。表面上看,这是羿的反思和悔恨,其实是鲁迅对生态平衡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保护动物和狩猎有时是矛盾的,二者必须有机统一,才能维持生态平衡。动物都有一定生长周期,动物的繁衍生息也有一定的规律。在食物链上,人类处于最顶端,动物是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人类不应该没有节制地滥捕滥杀动物,滥捕滥杀的结果,不但会像《奔月》中的羿一样面临单一的食物来源,更严重的是自然的生态系统将遭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将受到巨大威胁。《奔月》虽是书写上古神话时代生活的历史小说,但鲁迅在其中融入了他对生态平衡的思考和与自然母亲的挚爱之情。

### 三、鲁迅独特卓绝的自然审美观

鲁迅对自然的爱,建基于他的地母情怀和他与故乡的精神“交往”,充分地展开在他的维护林野、忧思沙漠化和水的匮乏等生态平衡思想中。对自然的爱,也令鲁迅具备了别具一格的自然审美观念。

鲁迅虽然曾自嘲说“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sup>⑤</sup>,但实际上,他是非常富于自然感受力的,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审美观。在小说《补天》中,他对天地初开的自然进行了热情的礼赞,动

①《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2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2-553页。

③《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等:《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页。

④《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1页。

⑤《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

用了丰富的想象力来构筑这个原初的诗意美好世界: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眯”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

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sup>①</sup>

这个色彩斑斓又宁静祥和的世界,正是女娲初醒、人类未诞生之前的原生态世界。这是混沌初开时代的自然美:花自开、树自绿、云悠悠,一切都那样浑然天成而和谐统一。

但是进入人类社会之后,自然不再是完美、和谐的代名词,与文明病态联袂出现的是自然审美的病态。鲁迅关于国人“十景病”审美病态的批评,构成他独特自然审美观的重要方面。在常人都为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倒掉表示惋惜和遗憾的时候,鲁迅却为此心情畅快,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这是因为鲁迅看到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sup>②</sup>的国人之喜好的可悲和病态之处。“十景病”的审美癖好体现了国人不敢正视现实中的缺陷和苦难,病态地追求完美的心理意态。鲁迅认为倘“十”字型病菌不去掉,那中国就产生不了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鲁迅从雷峰塔的倒塌、“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引申开来,给国人的“十全十美”审美观予以当头棒喝,也显示了他对残缺之美的接纳和欣赏立场。

鲁迅的自然审美不仅背离中国传统的“大团圆”完美倾向,而且与中国传统宁静肃穆的静态审美告别,他喜欢和习惯于在变化和流动中进行审美观照。鲁迅的《厦门通信(二)》体现了他的这种审美意态。厦门四季气候变化不大,很多花的花期很长,常人会觉得这是值得欣喜的事情,因为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看。但鲁迅却不以为然,他说:“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sup>③</sup>鲁迅一面借此批评文人的无病呻吟,一面表达了对春夏秋冬四时皆有不同景观的喜爱之情,以及他的尊重四季演变规律的自然思想,这倒是暗合了“生生之谓易”<sup>④</sup>的中国上古美学传统。于此可以窥见,鲁迅对先秦审美资源的承续以及对后世审美病变的批判的审美取向。

鲁迅虽然不赞成传统的隐逸思想,但他的少数作品偶尔也会流露出“荒村一钓徒”般的田园审美趣味。他在作于1901年的旧体诗《和仲弟送别元韵》中写道: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sup>⑤</sup>

这首诗表达了鲁迅怀念兄弟、渴望相见的情感,也隐含着鲁迅田园思想的小小根苗,体现了鲁迅对棘篱绕屋、树木环抱农家生活的向往之情。1929年,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sup>⑥</sup>这些文字流露了鲁迅对闲适恬淡的传统型自然审美倾向的某种趋近。

但是,鲁迅不是隐士,他只在紧张的写作之余偶窥山水之美,偶起田园之思。在鲁迅的自然美学体系中,肃穆宁静的田园审美趣味只是犹如夜空偶尔一闪的流星;鲁迅长久凝视着的是动感

①《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页。

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③《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2页。

④《周易·系辞上》,孟子等:《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9页。

⑤《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6页。

⑥《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页。

的、力量的自然美。《看司徒乔君的画》最能显示鲁迅的这种自然审美品味。鲁迅说自己喜欢画家司徒乔那些“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表现黄埃漫漫的北方自然和社会的画作。他对司徒乔画作的自然意象和社会内涵进行了这样的审美辨析:

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

后来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风景相对照,可以知道他挥写之际,盖谗熟而高兴,如逢久别的故人。但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sup>①</sup>

司徒乔绘画最能打动鲁迅的是它们所表现的人和天然的苦斗,以及“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魂灵”<sup>②</sup>。作为具有强悍精神气质的人,鲁迅喜爱司徒乔画作所显示的强者“苦斗”精神、“黄埃”粗粝的自然美,是十分正常的审美选择,也表明了他对柔弱细腻的自然美学风格的疏远和告别。

鲁迅借助他的作品,描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呈现了独特的自然审美观念,表达了对生态问题的深度关切,提出了可贵的生态平衡思想。鲁迅的大地诗学,是有待学界深入开掘的学术新领地。

## Mother Earth, Homeland and Ecologic Worries

—Study on Lu Xun's Earth Poetics

Wang Jia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Lu Xun's works depict for readers the appearance and stat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wide fields, flowers and plants and animals. He establishes a close spiritual relationship with Earth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his feelings for the motherland and the view of his poetic home returning, and his creation is a poetic presentation of the beauty of the wild nature of Earth. Lu Xun has a rich and profound ecological concept, which is reflected in his idea of maintaining the forests, his concern for the desertification of the land, his worries about the lack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is discussion on the natural ethics of ecological balance. Lu Xun's natural aesthetics also shows its unique features. Any writer who establishes kinship with Earth is the real child of the earth. Lu Xun's poetic 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ings on the earth is just an opening of earth poetics.

**Key words:** Lu Xun; ecological view; earth poetics; natural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 论鲁迅的现代国民性建构<sup>\*①</sup>

吕周聚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与建构是同步进行的。相对于《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更具有建设意义。鲁迅对现代国民性的建构,无疑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论,而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运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来解决中国存在已久的国民性问题。他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意识结合起来,力图建构“尊个性”“张精神”的现代国民精神,达到张扬民族精神、拯救国家民族的最终目的。鲁迅的这种现代国民性建构虽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却是中国建构现代国民性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鲁迅的“立人”思想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鲁迅;国民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46-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6

国民性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多年来,围绕这一课题所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为可观。<sup>②</sup>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由此得出鲁迅是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者与解构者的结论,是不无道理的。鲁迅在1921—1922年创作的《阿Q正传》中成功塑造了一个阿Q的形象,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中国国民性的集中体现。在鲁迅看来,所谓的中国国民性便是“国民劣根性”,对之进行批判便成了鲁迅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许多人看来,鲁迅只是一个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者与解构者,而不是现代国民性的建构者。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鲁迅除了批判与解构中国国民性之外,在现代国民性的建构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

从逻辑角度来看,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解构与建构是同步进行的。解构与建构是互为前提的:有了解构,才会有建构;有了建构,解构才会有意义。从时间角度来看,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时,日本国内正在讨论国民性问题,加之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他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在弘文书院读书时,他与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sup>③</sup>而“理想的人性”即“理想的国民性”,这说明鲁迅在这一时期就开始思考中国现代国民性的建构问题。他在仙台医专遭遇“幻灯片事

\* 收稿日期:2020-03-16

作者简介:吕周聚(1962—),男,山东莱阳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BZW097)的阶段性成果。

② 围绕这一课题出版的相关文集、著作主要有: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郑欣森:《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张梦阳:《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闫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摩罗、杨帆编选:《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8页。

件”,便如导火索一般引发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满与愤怒,他在对侵略者感到愤慨的同时,也对中国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看客心态予以批判,并从理论的高度来探索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与方法。在其早期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他就深入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并提出了建构中国现代国民性的初步设想。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他的“立人”思想的构建中,他将国民性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存在,他要批判解构这种国民劣根性,要用新的国民性来取代这种落后的国民性。那么,鲁迅所要建构的新的国民性是什么?他要用什么样的国民性来代替落后的国民性?

## —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原来庞大的中华帝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地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对策。总体来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间,这些有识之士探索了三条救国之路:一是器物层面的救国,主要体现为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目的,力求通过修铁路、开矿藏等“洋务”运动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二是体制层面的救国,主要体现为戊戌变法运动,通过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即便有了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术,如果国家体制有问题,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没有希望的,于是有了“公车上书”事件,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中国失掉了一次变革的大好机会;三是人的层面的救国,主要体现为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器物也好,体制也好,都是由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人是国家社会的核心,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是现代的人,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性国家。在那个时期,首先将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日本,当时日本国内正在讨论“国民性”问题。<sup>①</sup>受此启发与影响,他开始思考关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其办报宗旨即“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探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sup>②</sup>梁启超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纳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并将其视为一种病来进行救治。他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从1902年到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篇政论文章《新民说》,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有了新民对内就会有新制度、新政府和新国家,对外就能实行民族主义,所谓“新民”,“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sup>③</sup>。通过与西方白种人的比较,梁启超发现中国国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造中国国民性这一重要问题。

梁启超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国民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立人”思想,这是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鲁迅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先是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后来远赴日本留学学医,希望学成归来用先进的医学为国人医治肉体上的疾病,使中国人在肉体上强健起来,改变

①“‘国民性’问题在日本一直是一个与近代民族国家相生相伴的问题。作为一个概念,Nationality从明治时代一开始就被接受,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中国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41页。

②《本报告白》,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1号,1902(光绪二十八年)年1月1日。

③梁启超:《新民说一》,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第1号,1902(光绪二十八年)年1月1日。

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然而,在仙台医专经历了“幻灯片事件”之后,鲁迅学医救国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①</sup>从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成绩来看,作为班上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其成绩居中游之上,如果坚持下来,顺利毕业应该没有问题。换言之,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不是因为其客观条件不允许学下去,不是为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其主观思想和人生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医治中国人的肉体疾病转向医治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医学与文学虽然皆是以人为对象,但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医学关注人的肉体,医治人的肉体疾病;而文学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sup>②</sup>。从个人角度来说,精神是与个体的人的性格、气质密切相关的;从民族角度来说,精神则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民族精神与个人精神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个人精神的集合,个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折射。鲁迅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民性所存在的问题,并力图通过提倡新文艺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建构一种新的国民性。

通过“幻灯片事件”,鲁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民性特点,即愚昧无知、麻木成性,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生准则,这种准则滋生了一大批麻木冷酷的看客,“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sup>③</sup>。这些看客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鲁迅一生批判的对象。由此出发,鲁迅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看客的形象,如《药》中围观夏瑜被杀的花白胡子、华老栓、华小栓、康大叔等,《示众》中围观“犯人”的胖孩子、胖大汉、秃头老头、抱小孩的老妈子、小学生等。这些看客身上集中体现出了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鲁迅对这些看客持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

如何才能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如何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策略。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中国的悲惨命运与中国的国民性是密切相关的,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强化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而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又导致中国进一步弱化,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如何才能解决人的问题?中国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对此,鲁迅有着清醒的思考,“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④</sup>。鲁迅充分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将“立人”与救国密切联系起来,并对如何“立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一种新的思想观点。

传统观念强调文章与道德的关系。“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sup>⑤</sup>中国传统的“思无邪”“文以载道”便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鲁迅对此提出质疑,“然诗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鲁

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③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

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⑤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迅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发现了以诗反道德的摩罗诗人,“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sup>①</sup>。裴伦的行为被人视为撒旦,是摩罗诗人的代表。鲁迅分析了裴伦、雪莱等摩罗诗人的思想行为,充分肯定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摩罗精神,并将这种摩罗精神视为中国国民精神的楷模,这是其“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鲁迅所提倡的“立人”思想,旨在培养独立健全的国民人格,这种独立健全的国民人格与封建奴性是相对的。中国传统文化虽也强调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加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个人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压抑自己的个性意识来服从国家、集体利益的需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强调人的重要性,但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强调集体性、整体性的人。因此,儒家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禁欲主义思想,而这种禁欲主义思想与中国衰亡的命运之间又有着密切关系。在陈独秀看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致使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sup>②</sup>。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培养了一批“为民请命”的人,也培育出了一批“顺民”。这批“顺民”的基本特点是“少年老成”,唯命是从,没有青春活力,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思想,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封建奴性的重要表现。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传统的育人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个人主义思想,在他和中国思想界之间,画出的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一边叫做中国思想界,一边叫做周树人。这种思想不仅使他脱胎换骨获得‘新生’,也使他在同龄人和同时代人当中孤星高悬”<sup>③</sup>。

鲁迅回顾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缺少具有独立思想、特立独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在一般人看来,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怀才不遇、敢于进谏的爱国诗人,但在鲁迅看来,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sup>④</sup>。正因为如此,鲁迅要“别求新声于异邦”,这“新声”来自于摩罗诗人,“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sup>⑤</sup>。这种富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是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国民形象,是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鲁迅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所提倡的“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现。鲁迅希望中国人成为具有独立个性与思想的现代国民,而不是盲目信从、逆来顺受的封建奴隶。换言之,鲁迅是要建构一种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现代国民性,并用这种现代国民性代替旧有的国民性。

## 二

鲁迅“立人”的方法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实际上,“尊个性”“张精神”既是手段,也是目

①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②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3号。

③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中国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27页。

④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的。换言之,鲁迅所要立的人就是具有独立的个性、健全的精神的现代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尊个性而张精神”?

国民性即国民的性格、个性、特点,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生存环境、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一个国家的成长历史、生存环境、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民的性格特征。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生存环境、文明程度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历史、生存环境、文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的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且这一国民劣根性也是可以改变的。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人的社会性和集体性,而忽视、排斥人的个体性。个人主义思想是西方的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个人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生碰撞冲突,一直饱受误解与诟病,“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sup>①</sup>。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的国人对个人主义思想持否定排斥态度,将其视为“民贼”(国民公敌),这种观点在中国社会上流传甚广,至今仍有人认同这一观点。鲁迅对当时社会上对“个人”一词的误读、误解进行了反驳,他肯定“个人”的积极意义:“‘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sup>②</sup>这种独异的“个人”是人类社会变革创新的动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希望,然而,中国缺少这种“个人的自大”,多的是“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 mob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sup>③</sup>鲁迅对“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的分析细致深刻,切中了中国国民性的本质。从对“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态度:肯定“个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否定“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在鲁迅那里,独异的、自大的个人才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鲁迅对于中国新的国民性的希望。

鲁迅看清了“众数”“庸众”的集体属性——愚昧、麻木、落后、盲从、自轻、自贱,这种属性是中国国民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他看到了“众数”“庸众”对少数人的专制,“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②鲁迅:《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③鲁迅:《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328页。

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sup>①</sup>。这样，“众数”“庸众”就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与阻力，是亟待改造的。由此出发，鲁迅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sup>②</sup>鲁迅将“英哲”与“众人”对立起来，高度肯定“英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胡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与鲁迅相通。胡适认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他说‘多数党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sup>③</sup>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胡适从世界范围内来分析极少数人与众数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自然也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说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隐喻。胡适对国民性问题的分析与鲁迅相同，这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鲁迅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呈现出“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皆是中国的国民公敌，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人云亦云，敢于独战多数，敢于反抗社会，他们便是鲁迅心目中的精神战士，也是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国民形象。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英哲”的悲剧性结局。由于他们有着超前的思想，他们自尊自信，勇于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必然与社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蹠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sup>④</sup>。这种“忿世嫉俗”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中庸、调和、退让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笔下的夏瑜、战士、狂人身上无不体现出这种“忿世嫉俗”的精神特质，他们的结局也都是悲剧。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名家，鲁迅与胡适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个人主义，以身作则，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楷模。

个性与创造性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具有个性、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不会人云亦云、盲听盲从，他会有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思考与发现，会用质疑批判思维来审视前人已有的思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呐喊。这种个性意识和质疑批判思维会转化成一种创造意识，以不同的形式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缺少个性、没有独立思想的人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奴性，循规蹈矩，缺少创新意识。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有创造意识的个人，而要培养有创造意识的个人，则须尊重其个性，张扬其精神，给他们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也正是鲁迅将“尊个性而张精神”视为救国良策的原因。从这一角度来说，鲁迅的这一思想在当下乃至未来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54页。

③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④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三

鲁迅通过“尊个性”“张精神”来达到“立人”的目的,但“立人”并非其最终目的。在鲁迅那里,“立人”是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sup>①</sup>。“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sup>②</sup>。19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如何救国救民,成为鲁迅苦苦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虎狼之口中生存下来,在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最关键的是“立人”。在“立人”之后,所有的事情就都好办了,国家也会随之繁荣强大起来。“人”是所有事情的核心,物质、科学、技术、教育、制度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有了现代的人,就会有现代的国家,就会有强大的民族。

由此来看,鲁迅虽然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也以个人利益为最终目的地,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sup>③</sup>。而鲁迅所提倡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其本质并非要获得个人利益,而是要救国救民。在鲁迅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尊个性而张精神”,那么他就摆脱了封建奴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如果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和思想的人,那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一个现代民族,中国的国民性就得到了改革,这是鲁迅建构中国国民性的内在逻辑。

鲁迅这一代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他们的共同使命。“匹夫”虽然也有“个人”之意,但它与现代的“个人”有所不同。“匹夫”的原意为平民中的男子,泛指平民百姓。“匹夫”大多缺少个人独立意识,而鲁迅所提倡的“个人”则是一个既具有个人独立意识,又具有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个人”,或者说是将“个人”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的“个人”。这些“个人”才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脊梁,“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惧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内之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sup>④</sup>。这种“独具我见之士”正是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国民,只有“人各有己”,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一问题,胡适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sup>⑤</sup>。在胡适看来,每个人必须具有自由意志,但张扬、发展个人的个性是有条件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sup>⑥</sup>。胡适对自由与责任的论述非常深刻,很好地阐释了个人与社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③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④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⑤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⑥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鲁迅、胡适皆受到易卜生思想的影响,易卜生在给他的朋友白兰戴的信中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sup>①</sup>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易卜生深刻地体验到了个人主义与社会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笔下的“国民公敌”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在易卜生那儿,“国民公敌”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其行为却并非为了自己,而是要有益于社会,这也正是鲁迅欣赏他的地方。“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既是鲁迅对易卜生的评价,也是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同时也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命运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所提倡的现代国民性建构理论,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精神界的战士、民族魂。

《阿Q正传》发表至今已近百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部分国民身上表现出种种阿Q一样的思想行为,甚至有人对阿Q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表示认同。这不禁让人产生错觉:阿Q是否又复活了?许多人进而会发出疑问:鲁迅当年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有必要?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产生了广泛实际的社会影响?鲁迅所要建构的现代国民性是否已经成型?实际上,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之它有合适的生存土壤和顽劣的根性,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将其彻底清除的。同时,现代国民性的建构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现代国民性的建构并不仅仅是鲁迅、胡适等少数文化先驱的事情,而是与每一个中国国民有关,只有每一个中国国民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尊个性而张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现代的国民,这样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建构才能最终实现。

国民性既是一个与个人密切相关的问题,又是一个与国家、民族密切相关的问题,但以往的国民性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民族的笼统概括,而忽视了对国民的个性和独特性的探讨。鲁迅从被人们所忽视的国民的个性出发来探讨国民性的建构问题,换言之,鲁迅所要建构的国民性是一种现代国民性,它必然要涉及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诚然,鲁迅对国民性的建构无疑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论,而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借鉴运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来解决中国由来已久的国民性问题,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意识结合起来,力图建构“尊个性”“张精神”的现代国民精神,并达到张扬民族精神、拯救国家民族的最终目的。鲁迅所要建构的理想的国民形象是所谓的“精神界战士”,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sup>②</sup>通过这些个人发出的“雄声”,而让所有的国人获得新生,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大,从个体的改造达到整体的改造,这是鲁迅现代国民性建构的内在逻辑。从这一角度来说,鲁迅所要建构的中国国民性具有了现代性、超前性、世界性,甚至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是中国人的一个长远的追求目标,是中国国民性的一种理想状态。

鲁迅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他将“立人”视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他所要立的人及其立人的方法都与这一社会语境密切相关。在鲁迅那里,对国民性

<sup>①</sup>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sup>②</sup>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的批判与建构是同步进行的,鲁迅所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国民性,他所要建构的是现代国民性。相对于《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更具有建设意义。鲁迅笔下的“狂人”“战士”是其理想中的国民形象,是他所建构的理想的中国现代国民性。在他们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尼采的“超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的影子,但他们又不同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是将个人利益置于中心,而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小我与大我的合一。这种现代国民性建构,虽然只作为文学形象出现,但它却是中国建构理想中的国民性的方向。正因如此,无论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鲁迅的“立人”思想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On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Lyu Zhouj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Lu Xun's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were carried on simultaneously. Lu Xun's earlier idea of "cultivating independent persons" was more constructive than his criticism of the citizens' inherent weaknesses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No doubt,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haracter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individualism, but he did not copy blindly the Western ideas; instead, starting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of China, he drew on Western individualism to solve the long-existing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He combined Western individual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an effort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national spirit of "respecting individuality" and "expanding the spirit" to reach the ultimate goal of publicizing national spirit and saving the nation. Though tinged with the Utopian color, Lu Xu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haracter is the direction. And just because of this, be it in the past, at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Lu Xun's idea of "cultivating independent persons"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China.

**Key words:** Lu Xun; national character;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孙秋英

# 论艾德礼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初步形成(1945—1951)<sup>\*①</sup>

毛锐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早在二战进行过程中,英国联合政府就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联合政府1941年的财政预算以及1944年政府颁布“就业政策白皮书”标志着凯恩斯所宣扬的充分就业原则被政府所接受。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也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只是出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所采取的手段经历了由经济计划到需求管理的转变过程。道尔顿任财政大臣时期主要采用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建设和经济计划管理来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有计划的发展战略”。随后的克里普斯和盖茨克尔任职期间,虽也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但更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更多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即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实施间接调节。

**关键词:** 艾德礼政府;需求管理;经济计划;管制政策

**中图分类号:** K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55-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7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是否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延用了战时经济政策,“需求管理”没有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工党政府上台后最初两年的经济政策与战时的经济政策没有变化,1947—1949年,工党政府采取通货紧缩的财政策略,但这不是凯恩斯的通货紧缩,随后实行的廉价货币政策,主要也是为了减少政府在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借款和国债的利率负担,同时也是出于对战后经济不景气的担心,而不是刺激需求。<sup>②</sup>有学者认为1952年英国政府第一次对分期付款实行控制,这才标志着英国需求管理政策的开始。<sup>③</sup>第二种观点认为,艾德礼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需求管理。其实早在二战进行过程中,联合政府就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联合政府1941年的财政预算以及1944年政府颁布“就业政策白皮书”,标志着凯恩斯一直所宣扬的充分就业原则被政府所接受且开始在实践中向需求管理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非常原始的”<sup>④</sup>初步运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应用到全球,融入到二战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到1945年,“总论强调的充分就业原则很快就成为学界的正统观点”<sup>⑤</sup>。工党在1945年名为《让我们面对未来》的竞选纲领实际上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在这一文件中所提出的实现充分就业、建设福利

\* 收稿日期:2020-04-02

作者简介:毛锐(1969—),男,浙江宁波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战后英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及对中国的启示”(11CLSZ04);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二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借鉴(1945—2010)”(J11WE02)的阶段性成果。

② 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③ 陈炳才、许江萍:《英国: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④ Donal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647.

⑤ Alfred Borneman, “Fifty Years of Ideology: A Selective Survey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the U. S. 1930 to 1980”,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 No. 1, 1981, p. 26.

制度的目标只是重申了1944年就业白皮书和贝弗里奇报告所提出的目标,而国有化目标的提出,除了显示工党的与众不同之外,更显示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新上任的政府可以采用任何所需措施的意志和决心。<sup>①</sup>在经济方面,1945年工党政府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把“充分就业”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sup>②</sup>战时联合政府虽然在就业政策白皮书中表示,政府会承担充分就业的责任,但却从来也没有保证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激烈讨论,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行政策。而到1945年,工党明确在《让我们面向未来》竞选宣言中提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一项责任,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工党首要考虑的社会改革问题,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上述观点中,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本文提出,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后,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先导,强化国家干预,在战后重建和恢复的过程中,在种种经济目标中,比如经济增长、国内外贸易均衡、英镑稳定等,充分就业始终贯穿其中并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出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所采取的手段经历了由经济计划到需求管理的转变过程。<sup>③</sup>

### 一、艾德礼政府的经济计划

如何恢复战后经济?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工党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实施经济计划。英国在二战的经历证明了在对个人自由进行有限的可接受的约束即管制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二战后英国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将经济置于一种无管制和无计划的状态,那么英国经济可能再次遭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种萧条。国家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只有依靠政府干预,为经济制定计划才可以解决。<sup>④</sup>

与强调国有化的莫里森和强调财政政策的道尔顿不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是当时唯一从经济管制的角度思考英国经济问题的工党高层领导人。他在战争结束前就预测到战时的银根紧缩将会延续至和平时期,那时实施经济计划将不可避免:“当美国的租借法失效时,我们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这将是本国历史上最困难、最窘迫的时期……除非出台一系列实现进口所需水平的整体管制计划。”<sup>⑤</sup>对于工党所热衷的国有化方案,克里普斯并不以为然,“当我们开始进行更广泛的国有化时……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技术问题”<sup>⑥</sup>。

关于经济计划的性质,克里普斯强调,政府要选择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计划或“民主的”经济计划。要实现每个市民最大限度地选择自由,必须实施经济计划。<sup>⑦</sup>他认为,英国的计划与苏联实行的计划并不一样。工党左翼的拉斯基就主张向苏联学习,战后英国可以效仿苏联,建立计划化社会。在他看来,所谓计划,意味着把社会目标放在优先位置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原先的经济自由必然要受到限制。因为“要决定这件事比那件事更重要,社会的资源必须先派这个用场然后再派其他用场。一旦有了优先权,那么自由的内容就显然和无计划社会不同,在无计

① Jim Tomlinson,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Attlee Years 1945-195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7.

② [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③ 艾德礼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的:主要经济部门和机构的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最低标准的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通过对经济的公共管理,致力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本文着重分析第三个支柱,即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工党政府是如何对经济进行公共管理的。

④ 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usterit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299.

⑤ 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usterit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303.

⑥ 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usterit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327.

⑦ 李颖:《英国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控》,《商品与质量》2012年第S2期。

划社会里,各种资源的利用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的”<sup>①</sup>。克里普斯致力于区分民主社会中经济管制的观念和极权主义国家中管制概念的不同,他认为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民主国家中享有自由选择权,即保留市场机制,而后者给人的印象是战前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强制力和残忍性。克里普斯强调的是生产者所遭受的强制力。战时国家政权除了直接指挥军队作战之外,还可以直接控制劳动者。为更好地为国家就业服务,雇主被要求雇佣工人,而工人被要求从事工作。克里普斯强调要摆脱这种强制力,恢复国民的选择权。

从1947年到1951年,政府每年以出版《经济概览》的形式发布简单的短期经济计划,对未来一年的经济进行预测,并就若干方面提出相应目标。比如,1947年2月发表的第一个《经济调查》报告中,主要制定了劳动力、国民收入和支出、国际贸易、投资以及主要原材料的国民经济预算表,制定了煤炭、电力、建筑和轮船制造业的产量指标。<sup>②</sup>但是,这一年的计划指标实施效果不佳。临时性住宅建设完成77%,永久性住宅完成58%,出口额只完成计划的50%。<sup>③</sup>1948年和1949年的《经济概览》要比1947年更加详细,制定了更加详尽的发展基础工业、公共事业以及新型原料的开发的投资计划。1948—1951年的年度计划主要围绕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促进英国经济发展、改善国际收支。这几年的经济计划由于有“美援”做后盾,计划执行效果较好。<sup>④</sup>

工党的经济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工会和资方的双重反对。在战争时期,工会领导人获得了巨大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战后工党上台执政,这种影响力理所当然地保留下来,并因为战后劳动力的紧缺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的力量。战后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这种影响力与政府谈判以补偿战争时期工会成员在收入上的损失,他们自然对经济管制持抵制态度。<sup>⑤</sup>资方反对经济计划是因为他们害怕计划体系会侵害私人管理者控制资源流动的能力。英国企业家在战时积极配合和支援政府赢得战争,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力量和受尊敬程度,在战争期间工党的内阁部长们也依赖这些企业家来管理经济。实力强大的资方集团不仅反对国有化,也反对经济的计划化。为了更好地实行经济计划,工党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经济计划机构:中央经济计划部(The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Staff)、经济计划局(The Economic Planning Board)和产业部门国民生产顾问委员会(The National Production Advisory Council on Industry)。<sup>⑥</sup>1945—1947年,克里普斯为17个主要产业任命由四位企业家、工会成员和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官员组成的部门工作小组。但这些机构基本是咨询机构。根据《1947年产业组织和发展法》的要求,要在主要的产业领域设立三方协商性质的发展理事会,但最终只在棉纺织业、银器业、服装业和家具业四个产业建立起来。其中除了棉纺织促进协会(Cotton Board)是真正的、重新命名的同业公会,其他的都在雇主的反对下失败了。同时,随着经济管制措施的逐渐废止,经济计划对于实现充分就业不再是必须的了。因此,虽然制定了经济计划,但是官员们并不愿去执行。1951年保守党的丘吉尔上台后,工党的计划化政策被抛弃,转而实施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 二、延续战时的管制政策

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有化,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资料,为实现政府计

①[英]拉斯基:《论当代革命》,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74页。

②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Co. Ltd, 1985, p. 305.

③倪学德:《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④李颖:《英国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商品与质量》2012年第S2期。

⑤K.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25.

⑥孙殿柏:《比较经济制度》,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第128页。

划目标服务。二战结束之后,枢密院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出任“工业社会化委员会”。到1951年为止,他一直全面负责国有化计划。国有化的程序通常是,政府任命全国级别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即将国有化企业的相关立法,并在“授权接管日”接管相关企业。1945—1951年间,艾德礼政府先后将英格兰银行、煤矿(1945年)、航空(1946年)、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运输、电力(1947年)、煤气(1948年)和钢铁(1951年)等工业进行国有化,形成了战后第一次国有化高潮。这一历时6年多的国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提高了英国国有化程度,国有工业占英国企业总数的20%,国有企业人数由1907年的52万增加到200万<sup>①</sup>;国有企业在英国的煤炭、钢铁、燃料、电力和运输等基础部门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并左右经济的发展。1938年,国有企业所占投资比重只有4.7%,到1950—1953年达到21.5%,1954—1957年更是达到战后最高点22.4%。这不仅在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在当时西欧社会党掌权的国家里也不多见。<sup>②</sup>

计划的第二种形式就是管制,主要是指对实物的管制。在工党《让我们面对未来》的竞选宣言中就强调要“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租金”<sup>③</sup>实施管制,以此确保公平分配,阻止牟取暴利。可见,在工党的主张中,最重要的是再分配而非生产。<sup>④</sup>当时,战后工党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支付经济恢复所需要的进口商品。1945年秋天,政府的外汇收入仅够支付40%的国外开支。<sup>⑤</sup>凯恩斯指出,英国正遭受“财政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危机。如何解决危机,是使用行政手段的管制还是价格机制?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中,行政干预无疑是最优先考虑的手段。而战争结束后,工党延续了战争时期的管制政策。工党政府的实物管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sup>⑥</sup>

第一,消费品定量配给。主要是对粮食、罐头、衣服、家具和煤炭等的定量配给,比如家具销售对象仅限于新婚夫妇和房屋被战争摧毁的家庭;对去国外度假或者房屋修补也要给予不同程度的限制。配给消费所占的比例不高,最多不超过总消费的三分之一。1949年之后,这一比例不超过八分之一。有些在战时没有定量配给的食物如面包和土豆在战后却实行了两次定量配给。第一次是1946年7月,第二次是1947—1948年的冬天。还有,糖果类食品在1949年4月取消定量配给后,因为出现大规模抢购,而不得不重新实行定量配给。<sup>⑦</sup>总体上,战后的配给没有影响居民的消费。1947年,英国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1948年6月,取消了服装的定量配给;1949年3月,对家具的管制废除;1950年,英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超过战前水平,但直到1954年夏天,食用动植物油、黄油、奶酪、熏肉和其他肉类等才取消定量配给。

第二,价格控制。与对消费的定量配给紧密相联系,政府在价格方面实行了更广泛的管制。政府通过直接购买和销售的商品价值超过总消费支出的一半,如果考虑到政府间接控制的消费支出,这一比例达到60%。价格管制有利于减缓进口商品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和消费成本的上涨速度,但是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即在缺乏监督者和精确管制标准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不同,因而造成所生产商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随着消费品定量供给的废除,1949—1950年间的价格管制也有所缓和。但朝鲜战争期间价格管制又有所加强。到1952—1953年,除了房租、公共汽车和铁路票价以及煤炭价格之外,其他领域的价格控制都被废除。

①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②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③F. W. S. Craig,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18-1966*, Chichester: Political Reference Publications, 1970, p. 94.

④F. W. S. Craig,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18-1966*, Chichester: Political Reference Publications, 1970, p. 99.

⑤Alec Cairncross,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945*,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45.

⑥Alec Cairncross,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945*,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68-69.

⑦G. D. N. Worwick and P. Ady, *The British Economy 1945-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286.

第三,进口限制。这是出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必须采取的措施。英国政府既要把进口限制在可支付的范围内,又要尽可能地非美元区进口商品和资源。因此,到1946年,五分之四的食物和原材料进口都是由政府进口到国内,如果把进口的制成品也包括在内的话,政府控制的进口规模占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二。<sup>①</sup>政府还通过向私人公司发放许可证的办法,控制了所有制成品的进口。私人公司进口石油,不仅需要许可证,还需要配额。到1949年,政府控制了96%的进口份额。然而,在194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达成协议,实施进口自由化,这意味着必须解除进口的管制。英国只同意解除对非美元国家(不包括苏联)进口的管制,从美元国家的进口仍受到限制。有时,缩减(Cuts)是在每一个连续的收支平衡危机下进行的,1948年美元进口的价值缩减了30%,从西半球国家的进口比例从43%减少到30%。1950年,进口自由化进程加速,此时私营贸易商的进口量已经占总进口量的50%。随着朝鲜战争引发的重整军备和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进口管制再次加强。一旦危机过去,进口自由化又重新开始,到1953年自由进口比例达到50%。

第四,原材料的配给。最初所有的重要原料都要实行配给,最重要的是煤炭、钢铁和木材。按照价值计算,在1946年,94%的15种主要原材料都实行配给,1950年这一比例达到47%,1952年,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分配比例达到64%。同时,随着进口的增加,管制的需求在减少。在1947年,停止了铝、羊毛和橡胶的配给;1949年,废除了罐头、棉花和大多数硬木的配给;在1950年5月,钢铁的配给取消;1952年2月,因重整军备又重新实行钢铁的配给。到1954年,煤和马口铁以及所有的原材料分配才被废除。

第五,劳动力的管制。战时政府规定,在特定行业,除非征得劳工部授权,企业无权任意解雇工人,工人也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企业只能通过劳工介绍所招聘所需员工。战争结束后,政府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管制,控制范围也仅限于煤炭业和农业。可见,战后虽然对劳动力实施了管制,但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很小,1950年初,劳动力的管制彻底废除。

### 三、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945—1951年间,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英国政府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更多是运用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总需求<sup>②</sup>,即通过需求管理,来影响就业。因而这一时期英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对内促进投资,促进经济恢复,提高就业水平;对外保护英镑,发展对外贸易。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阐述三位不同的财政大臣在任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主要从财政预算和税收方面展开。

#### (一) 休·道尔顿时期(1945年7月27日至1947年11月13日)

道尔顿上任之初,英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一方面,美国在1945年8月21日宣布终止租借法案,搞得英国措手不及,没有周旋的余地;另一方面,英国6年的战争开支超过国民收入的50%,战前英国所拥有的财富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出口贸易额只相当于战前的三分之一,欠英镑区国家的债务达到35亿英镑,英国已经难以支付进口的费用。英国政府不得不在9月份再次寻求美国的援助。在向美国寻求6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被拒绝后,英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妥协,以2%的利息,获得美国37.5亿美元的贷款。从1951年开始偿还贷款,到2000年还清。这

<sup>①</sup>J. C. R. Dow, *The Manage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45-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54.

<sup>②</sup>李平、董曦明、刘作明:《英国的财政政策及其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增刊。

意味着,“在20世纪的剩余年份里每年要付出1.4亿英镑”<sup>①</sup>。随后,英国又从加拿大获得贷款12亿美元。在财政危机稍微缓解后,工党就把战后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和经济计划之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三大战略措施的辅助政策。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英国政府的思路是发展出口产业,把出口量增加到战前的175%,以弥补由于海外投资减少、英镑债务以及其他困难所造成的支付短缺。为此,在1945年10月道尔顿提出的第一个预算案中,把标准税率从10%降为9%,减税3.85亿英镑。在第二年4月提出的第二个预算案中,他又把超额利润税从100%降到60%。通过这两个预算案,共减税超过5亿英镑。但减税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在货币政策方面,道尔顿延续了战前的低利率政策,即以低成本为战后建设计划提供资金,以避免萧条。在1932年到1951年的19年里,英国银行利率始终保持在平均2%的水平。短期市场利率也保持稳定。国库券利率在1930年代中期一直维持在0.5%的低水平。战争期间,英国货币政策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在战争早期由于英格兰银行准备以更高的利率购买国库券,所以利率一直固定在1%。<sup>②</sup>战争后期,政府一直把利率定在3%,并以此指导债务管理政策。道尔顿采取低利率政策并不是英国所特有的。1946—1948年间,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也只有1%,到1951年春天,利率也仅仅增加到1.75%。同时期,加拿大银行的利率只比美国高0.25%。由于战后英国向美国和加拿大大量举债,英国政府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美国和加拿大会指责英国政府把从他们那里借来的钱以高利率借出谋利。

为了维持低利率,道尔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维持固定汇率。1946—1947年的寒冬<sup>③</sup>所引起的燃料危机引发了外汇危机。为了应对燃料危机以及向德国境内的英占领区支付各种货款,英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导致在1947年夏季出现兑换危机。7月底美国和加拿大的贷款只剩不到2.5亿和1.25亿英镑。更糟的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的规定,英镑不得不在7月15日之后实行自由兑换。这引发大规模的英镑兑换美元的风潮,美元和黄金大量流出英国。8月20日,道尔顿不得不宣布暂停自由兑换。第二,从1945年11月30日开始,国库券账面利率降低0.5%,同时其他短期利率也相应下降。第三,把长期利率从3%降低到2.5%,以降低融资成本;第四,通过实物管制控制国民经济,减少市场力量对价格的影响,防止利率波动。

道尔顿的低利率政策无疑是有利于降低国有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成本,并使地方当局和私有企业从尽可能低的利率中获益。但弊端也很明显,正如伦敦城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低息政策”会助长通货膨胀。<sup>④</sup>而道尔顿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减税政策更加剧了批评者们的担心。

战后初期,英国朝野一直害怕会重演一战后出现的持续的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投资削减和军队大规模复员的背景下,现有的预算案难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维持固定汇率,进口价格快速增长以及英镑不真实的升值,都大大增加了避免通货膨胀的难度。面对各方压力,在1947年11月12日的临时预算中,道尔顿不得不提出增税,希望能筹措2亿英镑,来降低通货膨胀的风险。这是经济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但由于在财政预算采访中的错误言行,导致国家经济机密泄露,道尔顿不得不辞职,接替他的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 (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时期(1947年11月13日至1950年10月19日)

①[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2页。

②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427.

③[英]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8—519页。

④[英]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王子珍、秦新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成为财政大臣时,英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的国有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高潮已经过去,经济正逐步走上正轨。到1948年,国有化计划基本完成,但是企业产权的变更并没有加强工人对公司的控制,政府也没有利用国有化之机革新传统私人部门产业结构使之合理化。自1949年以来,工党政府内部对国有化的热情也开始消退,在这一年的竞选宣言中是否要包含国有化提议,工党内部也出现分歧。<sup>①</sup>作为英国福利制度两大支柱的国民保健方案和社会保险方案已经实施,前者对每个国民包括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人,一律提供免费医疗,不论其是否已经保险。后者则规定,凡参加此项保险,定期缴纳保险费的,一旦患病、失业、怀孕、丧偶、退休等变故,都会得到以现金支付的保险赔偿。这导致到1947年8月,政府就已经把原本预计1951年用完的美元贷款消耗殆尽,从而引发保守党对工党政府的指责,即政府在急需恢复经济生产的情况下却把宝贵的资金用于福利国家的建设。的确,平衡外贸赤字与建立福利国家在某些方面是矛盾的。因为,来自于美元区的进口或是用于国内消费,或是用于生产商品用来出口,但却不可能同时充分满足这两个方面。<sup>②</sup>幸运的是,随后美国开始实施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英国接受总额为48.75亿美元的援助,这使英国成为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受援国,英国经济第二次注入美元贷款兴奋剂。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逐渐走出萧条,英国朝野对是否还要采取战时经济管制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管制只是市场机制的补充,目的是为了充分实现充分就业。管制的出现源于物资的匮乏,一旦物资匮乏危机解除,实行管制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在实际管制过程中,工党政府往往忽视价格机制,把定量配给作为一种确保公平分配的手段。市场机制决定了受管制物品的价格一直保持不变是不现实的,所以必须尽快摆脱管制。<sup>③</sup>工党内部高层对管制的认识也有分歧。莫里森(Morrison)支持国有化,道尔顿(Dalton)更倾向于使用财政政策的间接调节。而唯一从经济管制的视角来分析经济走势的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克里普斯认为,民主社会中的管制必须通过大多数的同意、说服和协商,不可能使用“暴力和冲动……以及近乎集权主义的管制”<sup>④</sup>,但他对管制和价格机制如何结合却含糊不清。因而,到1947年,克里普斯改变了对管制的看法。他认识到,直接对经济活动加以管控对经济发展是弊大于利的,而以财政和金融手段进行间接控制要好于直接控制。在1950年4月的预算演讲中,他明确宣布“管制已经被抛弃”<sup>⑤</sup>,这也标志着工党的经济政策开始由直接管制向需求管理的转变,即由直接的实物管制向通过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对经济需求实行间接管理的转变。<sup>⑥</sup>

在克里普斯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他更喜欢依靠财政控制即预算的手段来调节经济,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克里普斯强调,在可能通过税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方面,政府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将来,我们必须紧紧依靠创造更多的可分配的财富,而不是依靠现有收入的再分配”。其政策主要表现为紧缩财政,在1948年4月的预算案中提出:一是紧缩私人消费以节省外汇,以平衡国家的外汇赤字;二是针对国内消费采取高税收政策;三是推行“限制工资”政策,避免出口商品价格增长过快,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四是减少军队开支,减少住宅和工厂建

①K.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4, p. 400.

②[英]W.N.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17页。

③F. W. S. Craig,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18-1966*, Chichester: Political Reference Publications, 1970, p. 94.

④R. W. B. Clarke, *Anglo-America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Peace 1942-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79.

⑤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usterit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332.

⑥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Austerit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 300.

设以节约基本建设费用。紧缩财政的措施刺激了工业产量的巨大增长,产量增加又促进了出口增加,经济渐趋繁荣。但是,英国脆弱的外汇储备使英国经济发展极不稳定。1949年春,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英国的出口减少,英国的美元赤字从1949年第一季度的8200万英镑飙升到第二季度的1.57亿英镑,即使是正在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也无法弥补这一亏空。英镑贬值的压力和预期越来越大,最终在1949年9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30.5%,英镑与美元的兑换率从4.03美元下降到2.80美元。英镑贬值虽然有助于降低英国商品的成本,提高英镑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也造成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导致取消工资限制并引发通货膨胀。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局面,10月24日,政府宣布每年紧缩通货2.5亿英镑。<sup>①</sup>除了英镑贬值,克里普斯的货币政策依然延续了“廉价货币政策”,通过保证银行信贷的流动性,降低公债成本,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1949年11月,政府为了核查货币供应的增长限制自身大量使用预算盈余之外,几乎感觉不到货币政策的存在。克里斯托弗·道指出:“在这一两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声明提到信贷和利率……在1948年、1949年和1950年的预算案中也没有提到货币政策。”<sup>②</sup>

总的来说,在克里普斯任职的三年里,英国经济走上了繁荣之路,每年的增长率达到4%;商品出口增长60%,大大超过进口商品适中的14%的增长率;价格和工资的上涨被控制在适中的水平;许多直接的经济管制被取消。因此,在1950年12月,英国宣布停止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紧缩政策取得成功。此外,克里普斯成为财政大臣后,把他在经济事务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班人马悉数调到了财政部,这避免了计划化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冲突的风险。自此,财政大臣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人物。

### (三) 盖茨克尔时期(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10月26日)

为了追随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政策,1950年9月工党政府公布了为期3年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预计军费开支总额为47亿英镑。战争预期使英国再次陷入通货膨胀和外贸收支赤字危机之中。此时,积累多时的针对国民保健制度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开始酝酿发酵,工党高层分歧严重。1950年10月19日,盖茨克尔接替克里普斯担任财政大臣。在他的第一个预算案中,盖茨克尔提高了利润税、娱乐税、购货税和所得税;在拒绝提高工人的最高津贴限额的同时,为国民保健制度的开支设定了最高数额,这标志着工党一直引以为豪的建设福利国家的梦想开始破灭。<sup>③</sup>这直接导致工党左派的比万、哈罗德·威尔逊以及约翰·弗里曼的辞职。盖茨克尔增税和削减开支的措施依然不能弥补国防开支增加,这迫使盖茨克尔开始转而关注货币政策。在1950年11月,英格兰银行提出需要提高银行利率以反对通货膨胀,盖茨克尔接受英格兰银行的建议。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成功。到1951年的第三个季度,英镑危机再次爆发,整个英镑区出现6.83亿美元的赤字。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盖茨克尔不得不对股票红利和价格重新实行管制,但效果甚微。最终,工党不得不实行新的大选。这次运气没有站在工党一边,1951年10月26日,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以321对295赢得大选,再次成为执政党。

在道尔顿任财政大臣时期主要采用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建设和经济计划管理来实现充分就业的方法来发展经济。随后的克里普斯和盖茨克尔任职期间,虽也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但转向更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更多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即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实施

①[英]W.N.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50页。

②J. C. R. Dow, *The Manage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45-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27.

③[英]W.N.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张毓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57—558页。

间接调节。<sup>①</sup> 这表明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放弃了党章第四条所要求的实行完全国有化的目标,转而采取一种与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完全不同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同时发挥作用。工党政府认识到,如果凯恩斯主义有效,那么不用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也不用剥夺他们对投资和资源分配决定的控制权,只需要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就能够确保工人阶级充分就业。<sup>②</sup> 这就解决了二战之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使两个阶级的妥协成为可能。但在工党左派看来,这种妥协是意识形态的“失败”,这为将来50年内工党左右翼之间的争斗埋下了隐患。

由上可见,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已经完成了由计划化向需求管理的转变,基本确定了英国战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政府主要借助财政政策中的财政预算政策来回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在经济低迷时,利用预算赤字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当经济繁荣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时,通过减少公共开支,提高利率等来降低需求。货币政策方面因主要是保持稳定的利率,不受财政大臣的重视,只起到辅助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财政预算政策深受国际收支平衡因素的限制。在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时,一旦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政府就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一特点贯穿了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整个需求管理时期。

## Formation of the 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under Attlee's Ministry(1945—1951)

Mao R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had already taken Keynesianism as the guiding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Budget 1941* and *The 1944 White Paper on Employment Policy* marked the acceptance of the full employment principle by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Attlee's Ministry took full employment as the principal goal in post-war year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economic recovery. Measures taken by Attlee's Ministry changed from economic planning to demand management. In his term, Chancellor Dalton took measures such as nationalization, constructing benefit system and making economic plan to insure full employment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which was a “planned development strategy”. Later, Chancellor Cripps and Gaitskell in their terms, also made annual economic plans but they valued the market more and applied more the demand management advocated by Keynesianism, that is, using the fiscal policy and financial policy to carry out indirect regulation.

**Key words:** Attlee's Ministry; demand management; economic planning; regulatory policy

责任编辑:张登德

<sup>①</sup>倪学德:《和平的社会革命——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sup>②</sup>[英]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 实践教学的理性<sup>\*①</sup>

徐继存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实践教学担负着培养学生实践理性的重任,由于实践理性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实践教学认识的偏差,使得实践教学长期处于一种言而不明的状态。促使学生丰富感性世界、掌握基本技能、增强实践判断和养成实践态度,既是实践教学的责任,也是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为了规范实践教学的运行,提升实践教学的理性,需要构建观念模型、监控实施过程和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实践教学;实践理性;问题;改进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64-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8

实践教学是教学的重要构成,我们必须关心实践教学的成效。实践教学由来已久,但积弊也多。我们应该直面实践教学的现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研究,提升实践教学的理性。

## 一、实践教学的困境

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规格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世界,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而改造世界。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可以称为理论理性,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称为实践理性。一般认为,理论理性由理论教学担当,实践理性则由实践教学负责,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但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是割裂的,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关联,这是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互区别又相互规约所决定的。理论理性着眼于事物的“是如何”,旨在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要解决的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实践理性着眼于事物“应如何”,试图将事物的“本来面目”变成一种理想的状态,要回答的是“我应当做什么”。如果说理论理性求“真”,那么实践理性不仅求真,更有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憧憬。实践理性需以理论理性为基础,却又不是理论理性的简单应用,它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破理论理性的疆域,迈入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现人的自由意志。“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只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终极的东西,而且还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sup>②</sup>在这一意义上,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为实践理性不仅有理论理性的普遍性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而,相对于培养理论理性的理论教学来说,培养实践理性的实践教学则更为复杂和艰难。

\* 收稿日期:2020-03-02

作者简介:徐继存(1967—),男,山东沂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乡村微型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研究”(17CZKJ23)与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中小学改革研究”(VZ2019001)的阶段性成果。

②[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人生命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限性的矛盾逼迫人们只有通过承继人类既有的认识成果,即以人类的间接经验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非事必躬亲,才能更加便捷地提升认识世界的的能力。这些间接经验以分门别类的形式转化为学校课程,成为教师引导学生认识世界的主要凭借。尽管教学也是人类认识的一种方式,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但它毕竟不是直接地去探索人类的未知,具有不完全等同于人类一般认识活动的特殊性。教学认识的这种特殊性,自教学产生之日起就决定了理论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相对而言,实践教学常常被忽视,甚至成为理论教学的附庸。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教学就是理论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在现有的教学论教材体系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专门论述实践教学的章节,至多有一些涉及实践教学的只言片语。也许,有人认为,教学论主要探讨的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学问题,实践教学主要应在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领域开展。换言之,基础教育不需要实践教学,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基础教育的责任。这不仅极大地窄化了教学论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割裂了教学的递进性以及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连贯性。

我们不难发现,基础教育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理论教学的方式对待各种综合实践活动,用教师的讲授代替学生主体参与和实践操作的现象。即使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实践教学也常常凭习惯运作,缺乏基本的实践理性。随着教学科学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教学论知识,这些知识在为教师的理论教学提供必要指导和借鉴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教学自信,至于是否真正培养了学生的理论理性,似乎也无人去过分追究,学生的学业成绩似乎就证明了一切。熟知的东西未必是真知的东西。对许多学校和教师来说,实践教学并不陌生,可又常常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即使如此,由于国家与社会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强烈诉求,实践教学又不得不进行,它耗费了学校的很多财力和物力,占用了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效果却又无法予以明晰的评判。这的确是当下实践教学的吊诡之处。

人的实践活动是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没有理性的制导和规约,这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就会违背人的初衷,走向人的反面。正是这种理性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判断,构成了人类行为的指针。“手里有了这一指针,在一切所面临的事件中,人们会怎样善于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个合符责任,哪个违反责任。即使不教给他们新东西,只需像苏格拉底那样,让他们注意自己的原则,那么即便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哲学,人们就知道怎样做是诚实的和善良的,甚至是智慧和高尚的。由此可以推断,每一个人,以至于最普通的人,都能够知道,每个人必须做什么,必须知道什么。”<sup>①</sup>这当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理想状态,应该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努力方向。只是,这种实践理性既不是人的自然禀赋,也不是理论学习的必然结果,而是必须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获得的一种内在品质。“这就像技艺的情形一样。对于要学习才能会做的事情,我们是通过做那些学会后所应当做的事来学的。比如,我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建筑师,通过弹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sup>②</sup>由于实践活动是一种在时间中逐渐开展的不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内在于实践活动的理性因而具有非连续性和非严密性,常常难以化约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逻辑或话语逻辑,这就使得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人只能根据当下情境的直接感知对实践所关涉的事物以及

①[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页。

自己行动的后果进行预测,作出自己的行动抉择。布迪厄说:“实践在时间中展开,具有会被同化所破坏的全部关联性特征,比如不可逆转性;实践的时间结构,亦即节奏、速度,尤其是方向,构成了它的意义:比如音乐,对这一结构的任何使用哪怕只是改变一下速度,加速或减速,都会使其受到破坏,而这一破坏不能简约为基准轴的简单改变所产生的效应。总之,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时间,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中展开,还因为它在策略上利用时间,特别是速度。”<sup>①</sup>任何试图将实践理性化约为普遍性的理论逻辑或话语逻辑的做法,都可能“将逻辑的事物错当成事物的逻辑”,歪曲或误解了实践理性。这正是旨在培养学生实践理性的实践教学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其常常处于言而不明状态的主要原因。

## 二、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

实践教学的确不像理论教学那样有相对确定的课程体系、严格的教学程序以及诸多可供选择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即使如此,实践教学在根本上毕竟还是教学,而且它还承担着培养学生实践理性的重任,因而就有必要探讨怎样的实践教学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实践理性的发展,至少也应该明确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知道开展实践教学应该做些什么,才有可能使实践教学克服茫然的状态,走上理性的发展道路。

### (一) 丰富感性世界

人的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自在世界,也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推动着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而不断生成的现实世界又会成为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前提。可以说,现实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结果与前提的统一。实践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走出观念世界的藩篱,真实地面对现实世界,在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改造现实世界,从而改造自身,提升自己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因此,实践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虽然它在目的、环境和方式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社会实践,但它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基本属性和特点,由此也就形成了它与理论教学的根本分野。

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从来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某种思辨活动建构的抽象物,也不是某种机械论意义上的自然物。“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sup>②</sup>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能“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sup>③</sup>。从现实的人出发,就要关注人的感性,尊重人的感性体验。事实上,人的物质性本身就蕴含着人的感性之维,人的身体组织特别是人的自身体验交织着人的需要和情感,表达着人的意志和意愿,塑造着人“经历”和“经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感性是人的一切理性包括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切理性的抽象必须朝向的领域。不仅如此,人的每一种感性体验都连接着人的现实性。“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享受不同。”<sup>④</sup>人对世界的把握不能只是认识它的总

①[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④[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6页。

体特征,对它进行逻辑推演、作分析、得结论以及构建相关理论,还需要去实际地观察和亲身经历,才能体验和领悟它的多样和微妙。在很多情况下,感性的贫乏恰恰是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即使将实践教学视为某种知识的应用,也应该将它与学生的感知、情感、欲望、希望,以及能调节思想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一味地通过被动记忆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来塑造学生精神生活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丰富学生的感性世界既是实践教学的内容,也应该是实践教学的目标。

## (二)掌握基本技能

任何实践活动都包含着一定的技能要求,基本技能的运用是实践活动顺利完成的保证。技能是人在既有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它包括智力技能和动作技能两个方面的思想。智力技能是人动脑构想的能力,也是人通过精神力量把握对象的思维能力;动作技能是人动手操作的能力,也是人通过物质手段变革对象的活动能力。智力技能和动作技能虽有差异,但在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两者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动作技能的实现离不开智力技能的指导,智力技能的实现也有赖于动作技能的施行,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所谓“心灵手巧”。技能最典型的特征是“做”,而不是单纯的“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做中学”与内在感知,而不是外在灌输。“做”强调的是个体的亲历、参与、体验和本体感受式的训练。<sup>①</sup>这恰恰是实践教学的优势,也是实践教学的分内之事。今天,智能化的设备和自动化的装置虽然能够代替人的某些机械性的操作活动和定常化的思维过程,但无法取代人在实践过程中的非定常化和创造性反应。所以,技能不仅将继续存在,而且还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技能的掌握需要反复的训练,只有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才能内化为直觉能力等内在素质和敏感性。有学者将技能的形成与发展归结为“三段式”:动作技能的协调阶段、智力技能的深化阶段与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统一的技巧阶段。<sup>②</sup>有学者将技能的掌握划分为7个阶段:初学者阶段、高级初学者阶段、胜任阶段、精通阶段、专长阶段、驾驭阶段和实践智慧阶段。处于前3个阶段的人,只知道根据规则和程序操作,不能处理特殊情况,谈不上技能的获得;在后4个阶段,技能本身内化到人的言行中,成为一种情境敏感的自觉行为,能对不确定的情况做出本能的及时反应,达到一种技巧阶段。技巧是技能形成过程中的高级阶段,是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协调配合的完美表现。当技能内化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存在形态,成为人处理日常问题的一种实用性知识或行为向导的时候,就达到了实践智慧的阶段。<sup>③</sup>这是对技能掌握阶段的一般性划分,各个阶段的递进快慢会因实践领域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对一个人有效的方式,未必对他人有效。在技能的掌握过程中,能够言传的因素是有限的,而且还是不清晰的,因为它是人长期亲身体验的积累,如果不经过实践的磨炼,他人是很难从中得到有效信息的。因此,实践教学需要针对具体的实践领域和学生的个性特点,分析该领域所要求的基本技能,探讨这些技能获得的内在机理,制定出科学的技能训练方案。

## (三)增强实践判断

人的实践活动会随着实践对象、情境和人自身的变化而不同,随时需要人的“急中生智”“当机立断”。然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某种普遍性规范是否适用于特殊情境只能有赖于人

<sup>①</sup>成素梅:《技能性知识与体知合一的认识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sup>②</sup>陈凡、陈昌曙:《关于技能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sup>③</sup>成素梅:《技能性知识与体知合一的认识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审慎的判断和调整,如果将具体的实践活动变成某种理论的简单应用,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即使拥有丰富的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人也未必能辨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选择。阿伦特曾把判断视为与思想、意愿同等重要的心智能力,认为人的“不思想”与“不判断”所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人作恶本身的危害的总和。她指出:“判断力的缺乏表现在所有领域:在知性(认知的)事物中我们称为愚蠢,在审美问题上我们称为缺乏趣味,而碰到行为问题时我们称为道德的迟钝或精神错乱。”<sup>①</sup>在社会流变日趋加剧的时代,人的判断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判断活动恰恰是人在旧的价值标准失效,而新的情况尚无人们认同的价值标准可依的遭遇下,基于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而展开的精神活动。只要承认判断之于实践活动的不可或缺,增强学生的实践判断就是实践教学应然之责。

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实用主义活动和私人的谋利活动,它始终处于与他者的密切关系之中,也即属于公共领域。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必然要求一种无偏倚性的思考和判断。“无偏倚性蕴含着一种慎思性的观点,它要求人考虑问题不由一个人的自我利益、狭隘的同情或特立独行的信念来决定,也不纯然服务于这些东西。它是一种包容性的甚至是整全性的观点。”<sup>②</sup>可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人常常囿于自身的利益、愿望、角度和立场作出判断,失去他者视野,从而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利他的行为实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自己利益为条件的,是从属于利己性质的行为;另一种是以自身价值为条件的,这是出自美好心灵的行为。这两者都是‘为自己着想’,但前者是自私,后者是自重。自私只是做事,而自重却是做人。”<sup>③</sup>做人是做事的根据,做事是做人的确证。实践教学不能只是教会学生做事,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做人,展现人性的光辉。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言语的说教是苍白的,教师的身教则更为关键。

#### (四) 养成实践态度

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它是实践的先导,但理论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它来源于实践,且只有回到实践才能真正地改造世界。理论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分工所导致的,它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形式,以范畴自身的运动作为内容进行的精神生产。脱离了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就会成为形而上学的思辨,正像精神劳动一旦离开物质劳动就会变成抽象的一般神秘活动一样。这种理论活动的产物“是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sup>④</sup>。从这种抽象的东西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变成了某种观念世界的影子和理论构造的产物。“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以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sup>⑤</sup>这是对事物和运动进行抽象“颠倒”的逻辑,最多只能直观地解释世界,而不能实际地改造世界。面对现实世界,人应该始终秉持一种实践的态度,反对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构造活动。“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⑥</sup>

①[美]汉娜·阿伦特著,杰罗姆·科恩编:《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6页。

②[美]莎伦·R·克劳斯:《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谭安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③赵汀阳:《论可能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6页。

④[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136页。

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化,具有对象性和感性的特点。所谓实践态度,就是人作为人的自身意识和自我意识,就是人作为人的直接现实意识和感性活动意识。这种意识决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是在肯定现实世界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理解,致力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寻求的是人自身的解放。因而,实践态度是对理论神秘化的破除,是对理论本身的一种超越,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今天,对于长期习惯于理论构造和教学的师生来说,情况正如列宁所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践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sup>①</sup>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引导学生以实践的态度对待一切理论活动及其产物,认识到实践活动才是真正人的活动,从而自觉地增强实践意识,不做现实世界的辩护士或犬儒主义者。

### 三、实践教学的运行

培养学生实践理性的实践教学应该是理性的。尽管对这种理性所进行的任何归纳和概括都可能是粗略而非精确的,但却是必要和必须的。

#### (一) 观念模型的构建

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行为,它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之前能够建构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设定实践活动的具体目标,规定实践活动的方向,调控实践活动的过程,保证实践活动的预见性和计划性,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活动中的显著表现。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所谈的劳动过程开始之前人在头脑中构建的“蜂房”“表象”“观念存在”就是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没有这种观念模型,任何实践活动都只能是盲目的或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对于实践教学来说,能否构建科学的、可行的观念模型,决定着它是否具有成效。

实践教学观念模型的构建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它既不是一种习惯性行为的再现,更不是一种主观随意的想象,需要在总结实践教学经验和全面把握实践教学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设想出具有变革意义的计划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理性的抱负,即参照未来的计划而彻底改变现状的状况,这就需要对现在具有即便是最少的把握。”<sup>③</sup>人们年年在进行着实践教学,但很少花功夫去总结实践教学的经验;人们都认为实践教学不可或缺,但又不愿意去弄清楚实践教学的现状。这是对实践教学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学校和教师的重视。

#### (二) 实施过程的监控

任何实践教学都是已知与未知、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实践教学观念模型永远无法穷尽实践教学的所有未知和非确定性因素。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即使再理想的观念

<sup>①</sup>《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页。

<sup>③</sup>[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88页。

模型,也应因实践教学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和修正。为了应对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就有必要对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实践教学过程的监控离不开师生对实践教学过程的反思与他者对实践教学的观察和评判。作为实践教学的直接操作者,师生对实践教学过程的反思是改进实践教学的必要环节,也是提升实践理性的基本途径,应该伴随着实践教学实施的全过程。实践教学过程的监控之所以需要他者的参与,是因为他者作为旁观者具有远离实践教学过程的时空,这种距离感可以使其获得对实践教学过程判断的一种整全式的视野。相对于师生来说,他者更能抛开自我的立场和利益来关注实践教学的过程,赋予实践教学行为的意义。

在实践教学实施过程的监控中,师生如果既坚守自主的判断和责任,又确保自己的判断具有某种客观的基础和主体间性,就必须寻求与他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借助他者的视角和判断,扬弃自身的主观性和个别性,避免自以为是,陷入当局者的迷境。事实是,师生的实践教学感觉大都内化为一种个体性的感觉,社会各领域通常又置身于实践教学之外,致使实践教学的共通感日趋衰退。实践教学是学校之事,也是社会之责,需要学校与社会的相互协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形成良好的对话环境,谋求彼此之间的共通感。“理想的言说情境既不是一种经验现象,也不完全是一种观念建构,而是我们在参与理性讨论之际不可或缺的相互假定。此一假定可能违背事实,但不必然违背事实。不过即使违背事实,它在沟通过程的运作上,仍然是一个有作用的虚构。因此我认为理想的言说情境代表一种人类的期望、一种预示,此预示本身就保证我们能够将实际上所达成的共识和合理的共识关联着一起;同时理想的言说情境可以当作实际上所达成之共识的一个判准……(理想之言说情境的假定)因而是双重性质的:既是一种期待,但同时又实际发生作用。”<sup>①</sup>当前,重要的是转变实践教学的观念,将实践教学视为学校与社会责任共担的领域,通过塑造实践教学的共通感,推进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 (三)评价体系的建立

评价是实践教学的基本环节,它对实践教学具有导向、反馈、规范和激励等多方面的功能。尽管实践教学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然而由于实践教学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很多学校依然没有建立起切实而有效的评价体系,这是当前实践教学处于散漫无序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对学生通过实践教学获得发展的水平和效果进行评价自然是实践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但是,完整的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还应当包括对教师的评价和对学校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主要是对教师实践教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教师实践教学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的的评价;对学校的评价主要是对学校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以及学校实践教学的规划和管理的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实践教学的评价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方法都有优势和局限,不应只选用某一种评价方法,而应努力使多种评价方法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教学评价过程中,更应针对实践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突出重点,规避因泛化和繁琐而导致的过度评价。否则,不仅不能促进实践教学的发展,而且还会增加实践教学的负担。就目前学校实践教学的总体而言,对学生的评价应更多地选用表现性展示评价法,以激励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树立学生通过实践教学获得发展的信心;对教师的评价宜采用常规评价法,以端正教师实践教学的态度,强化教师实践教学的规范意识;对学校的评价可以采用自评法,以厘定学校实践教学的主体责任,提升学校实践教学的自省和自觉。

<sup>①</sup>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 Ration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Xu Jicu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rationality.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itself and the deviat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has been in a state of uncertainty for a long time. Whether students can enrich the perceptual world, master basic skills, enhance practical judgment and cultivate practical attitude is not on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but also the basic cont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oncept model,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rationality; problems; improvement

责任编辑:时晓红

# 开放性、尽责性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sup>\*①</sup>

张景焕

(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以457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开放性、尽责性人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与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学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上存在性别差异,均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但对独创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中介作用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独创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开放性;尽责性;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72-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09

## 1 问题提出

创造性问题解决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综合性创造活动,是以新颖而有效的方法对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解答。<sup>②</sup>创造性问题解决贯穿于人们现实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在复杂环境中迅速脱颖而出。<sup>③</sup>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往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多从顿悟、原型启发等聚合思维角度考察大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sup>④</sup>然而,发散思维也是问题解决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其核心因素。<sup>⑤</sup>从发散思维的角度研究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 收稿日期:2020-03-20

作者简介:张景焕(1965—),女,辽宁建平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遗传与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影响”(3177123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心理学范式的教学失范行为的形成研究”(15YJA880075)的阶段性成果。

②Christiaans H. H., “Creativity as a design criter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14, No.1, 2002, pp.41-54; Scherer R. and Gustafsson J. E., “The relations among openness, perseverance, and performance i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 substantive-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Vol.18, 2015, pp.4-17.

③Greiff S., Holt D. V. and Funke J., “Perspectives on problem solving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alytical,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The Journal of Problem Solving*, Vol.5, No.2, 2013, pp.71-91; Molnár G., Greiff S. and Csapó B., “Inductive reasoning, domain specific and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Vol.9, 2013, pp.35-45.

④曹贵康等:《顿悟问题解决的原型事件激活:自动还是控制》,《心理科学》2006年第5期;田燕等:《原型表征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启发效应的影响》,《心理学报》2011年第6期。

⑤Guilford J. P., “Crea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 1950, pp.444-454; Basadur M. and Hausdorf P. A., “Measuring divergent thinking attitudes related to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9, No.1, 1996, pp.21-32; Dumas D., Schmidt L. C. and Alexander P. A., “Predicting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engineering design”,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Vol.21, 2016, pp.50-66.

人格对创造力变异的解释高达 20%,是产生创造力的性格来源。<sup>①</sup> 在人格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中,大五人格受到广泛重视<sup>②</sup>,但具体到大五人格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研究却相对缺乏。以往的研究证明,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和尽责性对科学和艺术创造力的解释效果量最大。<sup>③</sup> 在搜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大五人格中与日常生活问题解决关系最为密切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为预测变量,探讨这两种人格特征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开放性是产生创造力最为基础的核心特质。<sup>④</sup> 有研究以多用途任务(Alternate Uses Task)、创新行为量表(Creative Behavior Inventory)等 6 种方式测量创造力,并考察各种人格特征与这 6 种测量的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均发现开放性与创造力的关系最为密切。<sup>⑤</sup> 研究者一致认为,开放性对不同领域(如艺术、科学)的创造力和不同表现水平的创造力(如创造性思维风格、创造性成就、创造行为)均有较强的预测作用。<sup>⑥</sup> 因而,本研究推测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

尽责性与一般创造力关系的研究结论不甚一致。有研究发现高创造个体具有低尽责性的特质<sup>⑦</sup>,也有研究发现尽责性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不相关<sup>⑧</sup>,还有研究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境中,高创造性的个体也表现出高尽责性<sup>⑨</sup>。进一步分析这种不一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尽责性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受问题解决任务或测验类型的影响<sup>⑩</sup>,高尽责性个体在提出和制定问题解决方案时能提出更具适宜性的办法,但由于高尽责性个体看重遵守规则和规范,往往导致其过度谨慎和条理。而谨慎和对适宜性的看重可能导致过度过滤独特的想法,进而可能抑制独创性。<sup>⑪</sup>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推测,尽责性有助于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提出更多、更适宜的办法,但所提出的办法未必是新颖而独特的。

①Sternberg R. J. and Lubart T. I., eds., *Defying the crowd, cultivating creativity in a culture of conform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Feist G. J. and Barron F. X., "Predicting creativity from early to late adulthood: intellect, potential,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37, No.2, 2003, pp.62-88.

②Kandler C., Riemann R., Angleitner A., Spinath F. M., Borkenau P. and Penke, L.,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The Roles of Genetic Factors: Personality Trait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Sour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1, No.2, 2016, pp.230-249; Kaufman S. B., Quilty L. C., Gazioplen R. G., Hirsh J. B., Gray J. R., Peterson J. B. and DeYong C. G.,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 Differentially Predict Creative Achievement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84, No.2, 2016, pp.248-258; Puryear J. S., Kettler T. and Rinn A. N., "Relationships of personality to differential conceptions of creativity: a systematic review",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Vol.11, No.1, 2017, pp.59-68.

③Feist G. J., "A meta-analysis of personality in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 No.4, 1998, pp.290-309.

④McCrae R. R., "Openness to experience: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Factor V",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8, No.4, 1994, pp.251-272.

⑤Puryear J. S., Kettler T. and Rinn A. N., "Relating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 considering what and how we measur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Vol.53, No.2, 2019, pp.232-245.

⑥Furnham A., Batey M., Anand K. and Manfield J., "Personality, hypomania,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44, No.5, 2008, pp.1060-1069; Kerr B. and McKay R., "Searching for tomorrow's innovators: profiling creative adolescent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25, No.1, 2013, pp.21-32.

⑦Robert C. and Cheung Y. H.,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tiousness and group performance on a creative task",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44, No.2, 2010, pp.222-231.

⑧李海燕等:《学校环境对初中生人格特征与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关系的影响》,《心理科学》2010年第5期。

⑨George J. M. and Zhou J., "Wh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conscientiousness are related to creative behavior: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86, No.3, 2001, pp.513-524.

⑩Reiter-Palmon R., Illies M. Y., Cross L. K., Buboltz C. and Nimps T., "Creativity and domain specificity: The effect of task type on multiple indexes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Vol.3, No.2, 2009, p.73.

⑪Runco M. A., Illies J. J. and Russell E., "Creativity, originality, and appropriateness: What do explicit instructions tell us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Vol.39, No.2, 2005, pp.137-148.

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影响的机制。根据 Choi(2004)等提出的“特质过程模型”<sup>①</sup>,人格特质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是通过心理过程(自我效能感)来实现的。因而本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内部心理变量。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自我效能感联系密切<sup>②</sup>,具体来说,开放性和尽责性均能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按照 Bandura(1997)的观点,高水平的效能感是发现新知识及产生创造性成果必备的先决条件。自我效能感与一般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已经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sup>③</sup>而且,作为人类能力生成系统的重要一环,自我效能感通常在人格特质与个体行为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sup>④</sup>据此,本研究认为,开放性、尽责性不仅可以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而且高开放性和尽责性的个体在解决问题时会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能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即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提出3个假设:(1)开放性正向预测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2)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而对独创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3)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济南3所高校选取本科一年级大学生为被试,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被试457名,平均年龄为 $19.31 \pm 0.95$ 岁。其中男生178人,平均年龄为 $19.46 \pm 1.02$ 岁,女生279人,平均年龄为 $19.21 \pm 0.90$ 岁。

### 2.2 研究工具

#### 2.2.1 开放性和尽责性的测量

研究选取 Costa 和 McCrae(1992)的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中开放性、尽责性分问卷进行测试。开放性和尽责性问卷共24道自陈式问题,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总分越高代表开放性、尽责性的水平越高。在该研究中,开放性、尽责性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0、0.75,研究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开放性问卷拟合指标为 $\chi^2/df=2.90$ 、RMSEA=0.06、TLI=0.80、CFI=0.85、IFI=0.85;尽责性问卷拟合指标为 $\chi^2/df=2.40$ 、RMSEA=0.05、TLI=0.90、CFI=0.87、IFI=0.92。

####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最初由 Schwarzer 及其同事(1981)编制,中文版由张建新和 Schwarzer(1995)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0个项目,采用4点计

①Choi J. N.,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 of creative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16, No.2-3, 2004, pp.187-199.

②Karwowski M. and Lebuda I., “The big five, huge two, and creative self-belief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Vol.10, No.2, 2016, pp.214-232.

③Prabhu V., Sutton C. and Sauser W., “Creativity and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Understand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20, No.1, 2008, pp.53-66.

④Caprara G. V., Alessandri G. and Eisenberg N., “Prosocia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traits, values, and self-efficacy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02, No.6, 2012, pp.1289-303; Sánchez-Cardona I., Rodríguez-Montalbán R., Acevedo-Soto E., Lugo K. N., Torres-Oquendo F. and Toro-Alfonso J., “Self-efficacy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s antecedent of study engagement: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46, No.2, 2012, pp.2163-2167.

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

### 2.2.3 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

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为自编问卷,测试题编制参照托兰斯测验多用途测量,评分方法借鉴托兰斯创造思维测验(TTCT)和同感评估技术(CAT)。<sup>①</sup>本研究题项来源于两个方面:开放式问卷与舆论焦点事件。开放式问卷题目为:“请用简洁的语言尽可能多地写出自己知道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161名大学生(男生74人,20.12±0.24岁,女生87人,20.68±0.38岁)作答。在对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分析后,得到4099种回答,每人回答在9—36条之间,平均反应数为25.56±9.03。对相同或类似的陈述进行内容归类分析,并对最终所得的回答进行频次统计,选取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8个类别:环境保护类、食品安全类、教育公平类、就业歧视类、行贿受贿类、弄虚作假类、职业道德类和交通违规类作为备选问题。将这一结果与人民网热点舆情事件进行比较和归纳,删除重复的问题或事件,得到14个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再次让大学生从中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件”(107人作答),最终形成初测问卷,初测问卷包含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就业歧视、弄虚作假、职业道德和交通违规等6个话题,参照调查中大学生对问题的描述形成具体的问题。

初测问卷在170名大学生中进行预测,每个题目有5分钟作答时间。参考有关创造力评价方法,该研究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3个维度来评价创造性问题解决。具体方法如下:流畅性是指被试所有反应的总数,反映被试的观点产生能力,一个反应计1分。适宜性反映被试所列方法对于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宜程度。适宜性的评分采用同感评估技术(CAT),请5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被试所列解决方法的适宜性进行独立评定,采用等级评分制,“非常好”计3分,“较好”计2分,“一般”计1分,“无应用价值”计为0分,取5人的平均分作为该反应的适宜性得分。独创性反映被试观点产生的新颖程度,其计分方法同适宜性,在等级评分时,“非常新颖”计3分,“较新颖”计2分,“一般”计1分,“无新颖性”计为0分。5名经过训练的创造力研究小组的研究生对被试的回答予以评分。评分之前,所有评分者阅读被试所有的回答及评分标准,试评10份问卷以熟悉评分标准,不一致的地方需5人一起讨论评分标准,直到达成一致。所有评分完成后计算评分者的一致性,结果表明,3个维度上的评分者一致性都在0.95以上,说明评分是有效的。以5位评分者对每个回答的平均分作为该回答的最终评分,通过计算每个题目上被试在某个维度上得分与被试在6个题目上该维度得分的总分的相关(即题总相关),删除相关较低的3个题目,最终形成由食品安全、弄虚作假和职业道德3个题目组成的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例如,食品安全问题:“食用含瘦肉精的肉品会危害人体心脏等重要器官,有些饲养户为了增加动物的瘦肉量,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肉品价格,不顾其危害在饲料中掺入瘦肉精。请尽可能多地提出新颖、独特且有效的应对办法。”

以被试在3个问题上的得分的平均分作为创造性问题解决各维度(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上的得分,分别计算被试在3个题目上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5、0.66、0.62。本测验以托兰斯创造力测验中多用途任务作为效标,测验中的流畅性和独创性与多用途任务的流畅性和独创性相关显著( $r=0.39, 0.24, ps<0.001$ ),符合领域创造力与一般创造力中低相关的理

<sup>①</sup>宋晓辉、施建农:《创造力测量手段——同感评估技术(CAT)简介》,《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论前提。<sup>①</sup>

### 2.3 程序

正式测验以班级为单位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主试进行集体施测。在正式测验前,对主试进行统一的严格培训,内容包括指导语、施测时间及程序。正式问卷包括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及开放性与尽责性、自我效能感题目3个部分。每次测试都是先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以控制作答时间。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题目的每个问题分别在一页纸上,每个问题规定5分钟作答时间,5分钟后翻到下一题。3个问题做完后开始开放性典型反应问题作答。所有测试结束后,主试当场收回问卷,整个施测过程约为30分钟。利用SPSS20.0及Hayes(2013)<sup>②</sup>编写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采取大学生自我报告的方式来获取各变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sup>③</sup>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因素分析后得到1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507%<sup>④</sup>,远小于40%的临界值,故该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 3.2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和性别特点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和各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特点、各维度得分的性别差异( $M \pm SD$ )

性别	流畅性	适宜性	独创性
男生(n=178)	5.49±1.75	7.90±2.56	3.09±1.41
女生(n=279)	5.89±1.65	8.39±2.33	3.23±1.53
<i>F</i>	5.99*	4.44*	0.97
总体	5.74±1.70	8.20±2.43	3.18±1.48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下同。

从表1中可以看到,男生和女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F_{(1,455)} = 5.99, p < 0.05, \text{partial } \eta^2 = 0.013$ ),在适宜性上也存在差异显著( $F_{(1,455)} = 4.44, p < 0.05, \text{partial } \eta^2 = 0.010$ ),且均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

### 3.3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分析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矩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开放性、尽责性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开放性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显著正相关;尽责性与流畅性和适宜性显著正相关,与独创性相关不显著;自我效能感与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显著正相关。

①张景焕等:《父母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社会创造力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年第6期。

②Hayes A. F., ed.,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

③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④姜永志、白晓丽:《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对疏离感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年第5期。

表 2 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1 开放性						
2 尽责性	0.36***					
3 自我效能感	0.38***	0.39***				
4 流畅性	0.10*	0.12**	0.15**			
5 适宜性	0.10*	0.12**	0.13**	0.94***		
6 独创性	0.13**	0.07	0.21***	0.68***	0.57***	
<i>M</i>	3.30	3.56	2.59	5.74	8.20	3.18
<i>SD</i>	0.40	0.47	0.42	1.70	2.43	1.48

### 3.4 开放性和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作用

为了避免出现可能的抑制效应,回归分析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考察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独立预测作用(分类变量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由于所得数值比较小,为了得到更准确的估计,该研究保留了3位小数,结果如表3。

表 3 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回归分析

		Y:流畅性					Y:适宜性					Y:独创性				
		$\beta$	$R^2$	$\Delta R^2$	<i>t</i>	<i>F</i>	$\beta$	$R^2$	$\Delta R^2$	<i>t</i>	<i>F</i>	$\beta$	$R^2$	$\Delta R^2$	<i>t</i>	<i>F</i>
第一层																
	性别	0.104	0.011	0.011*	2.202*	4.849*	0.089	0.008	0.008	1.881	3.536	0.036	0.001	0.001	0.748	0.560
第二层																
	性别	0.115			2.435*		0.100			2.107*		0.049			1.027	
	开放性	0.112	0.023	0.012*	2.377*	5.275**	0.109	0.020	0.012*	2.313*	4.460*	0.134	0.019	0.018**	2.827**	4.281*
第一层																
	性别	0.101	0.011	0.010*	2.134*	4.556*	0.079	0.006	0.006	1.667	2.779					
第二层																
	性别	0.097			2.060*		0.075			1.589						
	尽责性	0.120	0.025	0.014*	2.538*	5.527*	0.122	0.021	0.015*	2.583*	4.742*					

注: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的方法是定义女性为1,男性为0。

根据表3,在控制性别变量之后,开放性显著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 $\beta$ 分别为0.112,0.109,  $ps < 0.05$ )和独创性( $\beta$ 为0.134,  $ps < 0.01$ ),同时模型的解释率得到了显著增加( $\Delta R^2$ 分别为0.012,0.012和0.018)。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 $\beta$ 分别为0.120,0.122,  $ps < 0.05$ ),模型的解释率得到显著增加( $\Delta R^2$ 分别为0.014,0.015),验证了假设2。

### 3.5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分别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满足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本研究采用 Hayes(2013)编写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重复抽样5000次。先将开放性/尽责性、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问题解决(各维度)进行中心化处理,分别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4。

表4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i>Boot</i>	<i>Boot</i>	95% <i>CI</i>	<i>Boot</i>	<i>Boot</i>	95% <i>CI</i>	下限	上限
			indirect effect	<i>SE</i>	下限	上限	direct effect	<i>SE</i>		
开放性	自我效能	流畅性	0.04	0.01	0.01	0.06	0.05	0.05	-0.06	0.15
		适宜性	0.04	0.02	0.01	0.09	0.07	0.08	-0.08	0.22
		独创性	0.05	0.02	0.03	0.09	0.06	0.05	-0.03	0.15
尽责性	自我效能	流畅性	0.04	0.01	0.01	0.07	0.04	0.05	-0.05	0.14
		适宜性	0.04	0.02	0.01	0.09	0.08	0.07	-0.06	0.21

首先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预测流畅性/适宜性/独创性中的中介作用,以性别和尽责性作为控制变量,发现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 0.06][0.01, 0.09]和[0.03, 0.09],均不包含0,而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分别为[-0.06, 0.15][-0.08, 0.22][-0.03, 0.15],说明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3个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0.04, 0.04, 0.0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44%, 36%, 45%。然后,以性别和开放性作为控制变量,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预测流畅性/适宜性时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 0.07]和[0.01, 0.09],均不包含0,而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分别为[-0.05, 0.14]和[-0.06, 0.21],说明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的大小分别为0.04, 0.04,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50%, 33%。

#### 4 讨论

##### 4.1 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总体情况和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一定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是大学生所普遍具有的。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3个维度中,独创性得分标准差较大,约为平均数的47%,而流畅性和适宜性的这一比值约为29%。可见在想法的数量及适宜性上,大学生个体差异较小,而在想法的新颖、独特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叶仁敏、洪德厚和托兰斯(1998)<sup>①</sup>的创造思维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分布与一般创造力的分布大致相同。

此外,创造性问题解决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流畅性和适宜性上均高于男生。原因可能在于,女生在词语使用方面占有优势<sup>②</sup>,这一优势使得女生能流畅地表达更多观点。从表达的内容看,女生在道德情感、关爱感和责任感上高于男生<sup>③</sup>,其助人意愿也显著高于男生<sup>④</sup>;此外,社会对女性关心他人福祉的期望也高于对男性,这使得女生比男生更看重人际关系<sup>⑤</sup>,因而女生可能更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而能够想出更多、更具适宜性的办法。本研究同时发现,女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独创性上并未优于男生,这一发现与已有的有关一般创造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相

①叶仁敏等:《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的测试和中美学生的跨文化比较》,《应用心理学》1988年第3期。

②Jensen A. R., *The g factor: The science of mental ability*, Westport, CN: Praeger, Vol.648, 1998; D. F. Halpen, "A cognitive-process taxonomy for sex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bilit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3, No. 4, 2004, pp.135-139.

③卢家楣等:《我国青少年道德情感现状调查研究》,《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④姬旺华等:《公正世界信念对大学生助人意愿的影响:责任归因和帮助代价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年第5期。

⑤Gilligan C., ed.,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一致。<sup>①</sup>这说明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核心维度——独创性上并无性别差异。

#### 4.2 开放性和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关系

开放性指个体对新经验的积极寻求,对模糊情景的容忍和探索。本研究发现,开放性能够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和独创性。这与研究假设一致,说明开放性高的个体,其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能力也高。本结论与以往关于创造力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验证了开放性对创造性表现的“催化”作用。高开放性的个体情感丰富,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富于想象力和求知欲,能够自由支配思想和情感,解决问题的策略多,这三者的结合能够产生新颖的、有价值的问题解决方案和想法。因此,开放性作为创造性个体的共同特质,同样促进了个体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方面的表现。

本研究发现,尽责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和适宜性,但不能预测其独创性。因为高尽责性的个体勤奋、谨慎、自律<sup>②</sup>,这些特征对于产生更多、更具适宜性的观点是有利因素,但是,产生非同寻常的观点却更需要超越规则和规范的束缚,因而,尽责性可能抑制了独创性想法的表达。同时,该研究验证了创造力测量类型影响人格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相关结论。已有的关于一般创造力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变量对创造力不同维度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这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

#### 4.3 自我效能感在开放性、尽责性与创造性问题解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开放性和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发现这两个人格特征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预测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实现的。首先,自我效能感作为重要的心理过程,是直接推动个体进行活动的动力。<sup>③</sup>中介作用的发现与 Prabhu 等人(2008)在一般创造力领域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跨领域的一致性。

将自我效能感与开放性、尽责性及创造性问题解决联系起来看,开放性和尽责性高的个体会产生更高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增强了个体对当前事件的投入,因而,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程度也会增加,这可以有效提升创新表现。分别来看,高开放性的个体因其对新知识和不寻常的想法更感兴趣,通常更能将对创造所持有的高效能感转变为实际的创造表现<sup>④</sup>;尽责性强的个体勤奋、努力,以成就为目标导向<sup>⑤</sup>,他们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往往深思熟虑,对提出解决方法表现出信心<sup>⑥</sup>。因此,高开放性和尽责性个体更可能表现出对完成任务的自信,也更有可能根据具体情境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这一研究结论在真实问题解决领域拓展了“特质过程模型”,验证了自我效能感这一个体因素在人格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重要作用。

①王福兴等:《言语、图形任务条件下青少年发散性思维的差异研究》,《心理科学》2009年第1期;沃建中等:《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研究》,《心理科学》2009年第3期;贾绪计等:《独立自我建构、创造性人格、创意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②Barrick M. R. and Mount M. K.,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job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44, No.1, 1991, pp.1-26.

③Locke E.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7, pp.169-171.

④师保国等:《师生关系对小学生创造性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2期。

⑤Digman J. M., “Personality structure: Emergence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41, No.1, 1990, pp.417-440.

⑥Löckenhoff C. E., Duberstein P. R., Friedman B. and Costa P. T., “Five-Facto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health among caregivers: The role of caregiver strain and self-efficacy”, *Psychology and Aging*, Vol.26, No.3, 2011, pp.592-604.

本研究的意义有两点:一是拓展了创造力的研究领域,在以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编制了创造性问题解决测验,为今后关于真实问题解决的创造力研究提供了工具。创造力具有领域特殊性<sup>①</sup>,是与具体任务相联系的<sup>②</sup>,任何一个创造思维测验都不能完全地实现对人的创造潜能进行全面的跨领域评估<sup>③</sup>。比如,研究发现,采用抽象任务测量的创造力与真实世界中的创造表现相关很低<sup>④</sup>;托兰斯创造力测验虽然已被证明与个体的一些创造行为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但与社会层面的创造力并无关联<sup>⑤</sup>。因此,采用真实问题测量个体创造力能够更好地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二是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的预测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创造人格特质对于不同领域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中介作用的发现,揭示了开放性和尽责性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路径,加深了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影响因素的理论认识,并为提高大学生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导。大学生可以通过积极寻求和开放自身经验,探索不熟悉情境等途径提高自我效能感,以提高自己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未能考察个体人格特质、自我效能感和创造性问题解决在发展变化上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建议今后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次,本研究探讨了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作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在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感是创造性绩效的必要条件。<sup>⑥</sup>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创意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作用。另外,本研究分别考察了开放性、尽责性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影响,而其他人格特质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未来研究可探讨其他人格特质与真实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研究样本局限在一个城市的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可扩大取样范围,包括跨文化和跨年龄段,深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年龄背景下的个体特质与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寻求更多的证据支持。

## 5 结论

(1)女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适宜性水平高于男生。

(2)开放性正向预测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流畅性、独创性和适宜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尽责性正向预测流畅性和适宜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①Baer J., "How divergent thinking tests mislead us: Are the Torrance Tests still releva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ivision 10 debate",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Vol.5, No.4, 2011, pp.309-313; Pretz J. E. and McCollum V. A., "Self-perceptions of creativity do not always reflect actual cre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 Vol.8, No.2, 2014, pp.227-236.

②Bear J., "Commentary: Divergent thinking tests have problems, but this is not the solution",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Arts*, Vol.2, No.2, 2008, pp.89-92.

③Treffinger D. J., "Review of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he Ninth Mental Measurements Yearbook*, Vol.2, 1985, pp.1632-1634.

④Feldhusen J. F. and Goh B. E., "Assessing and accessing creativity: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o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8, No.3, 1995, pp.231-247.

⑤Runco M. A., Millar G., Acar S. and Cramond B.,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as predictors of personal and public achievement: A fifty-year follow-up",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Vol.22, No.4, 2010, pp.361-368.

⑥Bandura A. and Locke E. A., "Negative self-efficacy and goal effects revisit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88, No.1, 2003, p.88.

##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onscientiousnes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Zhang Jinghua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A sample of 457 college students was assessed with questionnaire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onscientiousness) and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it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nd specifically, the female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male in the fluency / suitability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nd no gender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originality. (2) Openness to experience positively predicted fluency / suitability / originality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conscientiousness positively predicted fluency / suitability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but not originality notably. (3) Self-efficac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fluency / suitability / originality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tiousness and fluency / suitability of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Key word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onscientiousness;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self-efficacy

责任编辑:时晓红

# 论习近平的新时代人才观<sup>\*①</sup>

韩 萌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以“辨贤”为中心的识才观、以“尚贤”为中心的爱才观、以“任贤”为中心的用才观、以“怒贤”为中心的容才观、以“引贤”为中心的聚才观,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重要内容。这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促进人才评价科学化、人才选拔制度化、人才开发规范化、人才激励多元化、人才保障法治化、人才聚集国际化提供了顶层设计和理论遵循。

**关键词:** 习近平;人才观;辨贤;尚贤;任贤;怒贤;引贤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82-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0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既是培育和造就具有世界一流竞争优势的人才队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的制度保障,也是我国建设全球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才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未来发展的基石,并对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他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所强调的“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论断作为其人才观的五个维度,蕴涵在历年的讲话、文稿、批示、书信等重要文献中,为新时代我国由“人才大国”迈进“人才强国”提供了顶层设计和理论遵循。

## 一、以“辨贤”为中心的识才观

中国古代谓德、量、才、志、绩者为“贤者”,即人才。因此,如何准确、真切、科学地“识才”,是习近平人才观中提出的第一个辨贤方案。其中,识才包括“什么是人才”和“如何识别人才”两个方面,而识别人才又包括“识别人才的标准”和“识别人才的方法”两个层面。因此,识才观包括人才的考察、筛选、考核、开发以及甄别、评价等方面,体现出习近平多维考察、短中见长、以德为先、立体评价的高远立意。

识才首先要“兼听、兼采”。孟子见齐宣王论治国理政之事,谈及用人时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sup>②</sup>这段古语说的正是选人、用人要兼听、兼采,方能识得真金、选出贤人。对此,习近平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一双眼睛’受视角和景深的影响,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一些偏颇。而用‘多双眼睛’就能多视角、

\* 收稿日期:2020-03-12

作者简介:韩萌(1984—),女,山东肥城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略联盟: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发展的共生机制研究”(CIA150185)的阶段性成果。

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第七章,宛华主编:《四库全书精华》,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多侧面、多层次地识别一个人,可以尽量避免‘失真’现象的产生。”<sup>①</sup>“多双眼睛”即不能仅以领导者个人的观察、感觉和印象去看待和评判人才,而是要用好集体的多维考察,避免一叶障目,善用人之长又善避人之短。因为个体的认知维度决定了一双眼睛容易造成知人不深、识人不准、选人不当甚至用人失误等问题。古代的“辨”字即代表“察看、考问而确定”的含义,故“辨贤”要求辩证地认识和分析人才,将显绩与潜绩并重,为人才提供好的机会与平台,以及增强其素质与能量的思想引领和精神关怀。正所谓“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sup>②</sup>。

识才要坚持“以德为先”。自先秦以来,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就把才能和品行作为重点考察内容,并先后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等重要理念。<sup>③</sup>明代思想家吕坤亦言:“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辨是第三等资质。”<sup>④</sup>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作为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是我党多年总结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德也是习近平同志一贯的识才用人要求。习近平同志要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sup>⑤</sup>有学者概括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时代英雄的三大鲜明品格,即“忠诚”“执着”“朴实”<sup>⑥</sup>,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才所应具备的重要品格。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必须在基层中、群众中和乡语口碑中甄别人才、评价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和创业实绩中考察人才、认识人才。通过全面考察、慧眼识才,重点褒奖贡献突出的干部,支持一身正气的干部,鼓励老实干事的干部,鞭策相形见绌的干部,教育跟风行事的干部,约束投机钻营的干部,惩处贪污腐败的干部,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因此,坚持诚信守诺和失信惩戒制度,探索基于道德操守和诚信声誉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强对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从业操守等评价考核,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评价诚信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

识才要注重“近距离观察”。古人云: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皆流,则亦能兼达众才。识别人才的过程,也是一个识才者对被识者的考察过程。通过近距离观察和重大关头考察来深入了解和辨识人才,体现在能否善于从小处识别人才,从细处察看素质。例如“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sup>⑦</sup>。这就要求担负识才使命的领导干部,既不能让踏实干事做出贡献的“老实人”“改革者”吃亏,也不能让心术不正投机钻营的“两面人”“圆滑官”沾光。针对因唯票取人、满票干部而产生的大面积拉票、贿选、编织关系网的现象,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尖锐指出:“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sup>⑧</sup>

识才要多维度完善“人才评价指挥棒”。评价标准是人才评价的核心,也是社会最为关注的问

①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③代金平、卢成观:《新时代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实践基础和理论价值》,《探索》2020年第2期。

④吕坤著、欧阳灼点校:《呻吟语》,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2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⑥韩云波:《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探索》2020年第2期。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8-419页。

⑧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题之一。通常而言,人才评价应以德、智、能、绩四个基本指标对人才进行细化衡量,而非单一的硬性指标。对人才单纯以“好或者不好”的模糊评价来决定其“上下”,是极不负责任的。当前,深化我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评价指标、制度与措施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的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唯论文论英雄等突出问题,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5月28日的院士大会上提出:“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sup>①</sup>在此导向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从多维度发挥并完善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

## 二、以“尚贤”为中心的爱才观

“尚贤者,政之本也。”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才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是创新的根基与核心要素。故爱才观包括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尊敬、关心、爱惜、支持以及培养人才、保护人才、成就人才等方面,体现出习近平同志求贤若渴、惜才如金、注重人才培育和人才驱动的爱才情怀。

第一,爱才的首要基础是高度重视人才、尊敬人才。早在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时,为组建正定经济顾问团,亲自向全国知名学者发出100多封“求贤信”。后又在2006年的浙江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指出:“要强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做到求贤若渴,爱才如命,惜才如金,唯才是用,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来培养造就和使用好人才。”<sup>②</sup>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据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Adecco)发布的《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GTCI2018)排名榜显示,全球119个国家中瑞士居世界首位,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中国仅排名第43位。<sup>③</sup>当今时代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因此,“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sup>④</sup>,使人才充分感受到实现价值的满足感、服务社会的成就感、得到尊重的荣誉感。

第二,爱才之基在于储才,储才之要在于育才。人才的培养、开发和使用是一门科学。从世界范围看,人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只有遵循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和个性要求,优化培养人才成长的条件和路径,进行系统性、持续性、有针对性的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才能将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习近平同志极为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曾在多个场合谈及对人才的希望和要求:“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sup>⑤</sup>“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sup>⑥</sup>这些论述强调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地位,并对我国的育人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过去,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管理过程中,常常忽视或漠视人才的成长规律和成才要求,用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的模式约束人才,用生产指标的形式和竭泽而渔的方式“催产”人才成

①《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②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③《2018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标报告》,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18739021204078。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9页。

果,导致欲速则不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泯灭了人才。教育是育才的主阵地,教师是育才的主力军,各级各类学校要大力培养和优化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教育得到重视,人才方能如井喷涌现。

第三,爱才之根本在于保护人才。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才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理应成为人才的坚强后盾。早在1983年4月11日,习近平在正定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严肃查处“对勇于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争的积极分子和勇于改革献身四化建设的先进人物进行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的事件”<sup>①</sup>。此后,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在经济领域改革,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强化激励、聚集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要信任他们,不能委之以事权之后,又滥加猜疑。”<sup>②</sup>要通过党政、法律、经济、舆论、情感等途径创设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对人才及其成果予以扶持和维护,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统筹、协调和保护好各类人才,包括存量人才和增量人才、不同地区人才和不同领域人才、国外人才和国内人才、体制内人才和体制外人才等,做到“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形成创新人才辈出的局面”<sup>③</sup>。对于已经发现的创新人才,要勇于打破条条框框,在工作、学习、科研、生活上提供尽可能的帮助,真正做到在珍惜、爱护人才的同时,信任人才并放手使用人才,保护他们“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创新精神。

### 三、以“任贤”为中心的用才观

习近平同志在历年关于人才工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用才导向:“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sup>④</sup>因此,用才观包括人才的选拔、配置、激励、管理、保障、肃纪等方面,体现出习近平同志破格选用人才、放权松绑人才、名利激励人才、筑台展现人才的用才胆识。

一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导向是一种引领,也是一种风尚,中国古代就有“见贤思齐、群贤毕至”等用才良言。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指出:“选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主要内容……要‘近君子,远小人’,坚持原则,严格标准,不搞感情用事,摒弃个人好恶的影响,摆脱亲疏远近的干扰,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sup>⑤</sup>在新时代,这种用人导向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注重品行、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认可。其中,注重品行是基础,崇尚实干是关键,重视基层是保障,鼓励创新是枢纽,群众认可是根本。这是一个彼此贯通、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需综合应用、统筹考虑,不能顾此失彼和以偏概全。

二是改革僵化的人才体制。用人必须用当其长、用当其时、用当其位,必须人岗相适、以事择人,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人才宏观统筹和政策创新力度,优化与完善我国人才选拔任用的制度和办法,形成人才的“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监督管理”等一系列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效使用人才,要树立开放、开明、开拓的用人观,不搞论资排辈和求全责备,着力破除各种束缚和限制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他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选拔人才的视野太窄,范围太小,总觉得人才难选,自己把自己束缚住

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②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③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9页。

⑤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坚决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摆脱‘论资排辈’的封建观念和‘人要完人’等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sup>①</sup>并要求领导干部“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实际”<sup>②</sup>。由于他年轻时长期在基层工作,先后在农村、军队、地方多个层级历练,对基层人才面临的实际问题非常清楚,能更清晰地认准人才工作的“高点”,准确把握人才的“痛点”。他特别欣赏那些在基层吃苦耐劳、真抓实干的优秀人才,认为用人的关键就在于各得其所、尽展其长,破除体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创新人才松绑。

三是实施开放的人才激励政策。人才创新的动力和效能来自利益激励和市场激励,主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激发人才的需求、动机和活力,使其保持高昂的积极情绪和持续的创新状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就是将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教育规律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为人才脱颖而出释放最大的牵引性动能。譬如对科研人员,“既要用品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重视必要的物质激励,使他们‘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sup>③</sup>。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促使人才激励逐步由过去的经济激励向权利保护转变,允许知识、技术、管理、技能、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肯定知识所具备的“有形价值”。在此基础上实施的人才激励机制,才能激发人才担当作为、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体系。

四是整饬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选人用人上的“拉帮结伙”,对领导干部的“带病提拔”,对人事工作的“关系网”“潜规则”“推拉门”,习近平同志一直深恶痛绝。1983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推荐和选拔优秀人才,不准搞不正之风,不准拉帮结伙,不准搞非组织活动。”<sup>④</sup>时隔30年,他在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sup>⑤</sup>针对多起由于动机不纯、考察不严、识人不准而出现的干部“带病提拔”问题,他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深刻反思、深入整改,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2018年11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严肃指出:“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sup>⑥</sup>这是党的一贯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 四、以“恕贤”为中心的容才观

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既要善用人才之长又要善避人才之短,给人才提供尽可能好的机会与平台,更要提供增强其素质与能量的思想引领和精神关怀,让各类人才的聪明才智得以释放。对

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②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④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20页。

⑥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于优秀人才,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故容才观包括宽容失败、包容怪才偏才、容许人才失误,实行人才流动、人才分类、人才开放、特殊人才特殊管理等,体现出习近平同志理解人才、包容人才、善待人才、解放人才的容才气度。

第一,要宽容人才、宽容失败。年轻人往往有一股闯劲,敢为前人所未敢为之事,难免有失误乃至失败。对此,要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的心态予以包容,在全社会营造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所谓“常格不破,人才难得”,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天地,就要在人才工作中消除固有偏见、打破僵化标准,对人才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特别是“宽容失败”的政策,有利于优化创新环境,推进人才的选拔与培养。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不能急功近利。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主权,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宽容干部和各类人才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营造一种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人才生态环境。其实,早在正定工作时他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使有些人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毛病,也不能求全责备,使其一技之长得不到发挥。”<sup>①</sup>可见,宽容人才的失误和失败,是习近平同志一贯具有的容才雅量。

第二,要宽容“偏才”、包容“怪才”。汉武帝刘彻曾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sup>②</sup>习近平同志认为,须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那些身怀绝技、术有专攻但个性孤傲的“奇才”“偏才”和“怪才”,因为这类人才往往会在奇思妙想、质疑问难中一鸣惊人,获得重大突破。他在2016年4月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说:“互联网领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们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sup>③</sup>如何使这些“怪才”在百舸争流、改革创新中一展所长?习近平提出:“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sup>④</sup>因为从本质上说,“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sup>⑤</sup>。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徽调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高度尊重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特点,主动征求并欢迎他们提出意见建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sup>⑥</sup>1983年,他在正定主持制定的招贤纳士的《九条措施》中,就以极大的胆略和气魄在第二条中规定:“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当作‘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工作遭受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sup>⑦</sup>同时在第四条中写道:“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sup>⑧</sup>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敢冒政治风险的胆略胸怀和“容才”举措,着实令人钦敬。

第三,要容许人才流动、实施人才分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必须顺畅流动,形成合理的人才竞争与分流、分布、分类机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才流动需要破除制

①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②班固:《汉书·武帝纪》,吴楚材、吴调侯编,殷夏祥注:《古文观止新注》,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③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④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⑥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⑦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⑧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度性障碍,畅通各类人才流动的渠道,完善人才交流与合作的常态化,重视国际人才流动,促进人才流动的价值提升。“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sup>①</sup>包括采取柔性流动方式,引进更多“候鸟型”人才。

在对人才分层培养、分别指导与分类管理方面,习近平同志认为,要认真研究各类人才不同的个性特点、成长规律和发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保证人才各得其所、各显其能。他要求建立规范的人才遴选和评价制度,对人才评价标准进行分类,对不同人才实施个性化考核,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以便更科学、更合理地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

## 五、以“引贤”为中心的聚才观

人才济济,是大国应有之气象。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一直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人才理念和人才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部署了“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的改革任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因此,聚才观包括吸引、容纳、集聚、团结人才,以及开发人才资源、优化人才结构、改善人才环境等方面,体现出习近平同志打破人才瓶颈、广开进贤之路、凝聚国内人才、汇聚海外人才的理念。

第一,开发人才资源,凝聚国内人才。针对我国世界级科技大师匮乏、创新型科技人才不足、领军人物和尖子人才缺少的严峻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招商引资、招人聚才并举,有时还要招人聚才优先”<sup>②</sup>。围绕“高、精、尖、缺”的导向实施人才工程,完善创新人才和高端人才开发的体制机制,通过多种有效渠道,吸引并集聚一批国内外学科带头人和各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一流人才供给,率先实现转型升级,真正营造出“请得来、干得好、留得住”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基础研究领域,聚集引领国际科技发展、具有全球号召力的科学家;在科学应用领域,聚集关键技术的领军人才;在产业升级领域,聚集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和通晓国际规则的投资家,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sup>③</sup>。

第二,解开人才心结,积聚回国人才。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庞大的海外留学生群体,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人才财富,要充分结交好、聚拢好、利用好。每次出国访问,他总要抽时间与留学生深入交谈。他要求为回国留学生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科研环境,并实施开放、宽松、灵活、自由的“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并行政策,他强调指出:“党和国家将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sup>④</sup>这种开放、开明兼具开拓性的人才观,肯定了“能进能出,来去自由”,解开了留学人员的心结,打破了人才制度的瓶颈,为我国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潮”。据教育部统计,1978—2018年底,我国各类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占总群体的84.46%。<sup>⑤</sup>特别是近年来,在政府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下,选择回国创业的归国人才逐年攀升,充分证明了我国正通过多种政策为留学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汇聚并留住世界一流水平的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5页。

④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⑤《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大军66.21万人,同比增长8.83%》,《中国教育报》2019年3月28日。

高端人才,才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第三,开放人才市场,汇聚海外人才。全球知识经济下,学习并应用世界先进技术,必须开放国门、广纳贤才,实施内源发展、对外开放与外向拓展相结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站在世界巅峰呼唤和吸引各路高贤,提高全球配置人才资源能力,加快构建具有全球持续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要有国际眼光,从全国范围、世界范围吸引人才。”<sup>①</sup>加快从全球视野引进掌握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促进新兴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在吸纳和融合中推进人才协同创新。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才的国际流动与市场化竞争势不可挡。为人才聚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和工作环境,破除制约人才聚集的政策瓶颈和体制障碍,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人才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筑巢引凤,拴心留人,为来华外国专家在出入境、文化融入以及工作平台等方面提供完善便利的政策和服务,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才给予表彰奖励,从而形成国外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良好局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才发展的重要战略。

综上所述,以“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为主体的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着眼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深刻阐述了人才与人才工作使命,敏锐洞察了当前人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了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这对于我们全面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构想,包括党管人才原则、人才服务理念、遵循人才发展规律要求、打破人才体制机制障碍、国际视野和全球开放的人才战略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才能百舸争流、释放出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和“红利”,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On Xi Jinping's Talent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Han Me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talent philosoph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ive dimensions: the talents-recognizing concept centralized on identifying the talents, the talents-respecting concept based on cherishing the talents, the talents utilization concept centered on merits-based appointment, the talents tolerance concept focused on forgiveness and the talents concentration concept emphasizing introducing talents. This philosophy provides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theoretical compliance for th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from a "great talent country" to a "powerful talent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hrough scientification of talents evaluation, systematization of talents selection, standardization of talents development, diversity of the means to stimulate talents, legalization of talents'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thering of talents.

**Key words:** Xi Jinping; talent philosophy; identifying talents; cherishing talents; appointing talents; forgiving talents; introducing talents

责任编辑:王盛辉

<sup>①</sup>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实质与应对<sup>\*①</sup>

布成良

(江苏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09)

**摘要:** 从现在世界范围来看,民粹主义思潮尤为活跃。这股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持续深化,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等领域都有所表现。以大众性和抗争性为特征的民粹主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突出表现为:打着民主的口号,构建“网络广场政治”;网络草根文化的建构以平民化和大众化为合法性来源;打着关心平民的旗号,主张不切实际的民生政策;出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耦合现象。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当前中国民粹主义的实质,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以消解民粹主义的社会危害,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国民族精神。

**关键词:** 民粹主义;网络广场政治;网络草根文化;民族主义;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90-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1

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非理性社会思潮和运动。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裹挟着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力量嵌入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中。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是网络与民粹主义思潮的融生物,有其自身的生发机制。网络民粹主义虽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也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消极作用。这就需要对民粹主义的来源及实质保持清醒认知,以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成背景与主要表现,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从而有效防控民粹主义社会风险,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国民族精神。

## 一、民粹主义的历史溯源与当代境遇

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学界还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准确定义。从原初意义上讲,民粹是指“以民意精粹”,而冠之以“主义”则倾向于将其推至极端化,使之具有二元对立的政治社会观。我们认为,要精理解其涵义,应从两个层面来把握。从广义层面来看,民粹主义是一种对现代化批判反思而形成的世界性社会思潮,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社会下层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愿望。从狭义层面来看,民粹主义是对某种社会事物内在联系和客观模式的阐释。19世纪后期的俄国和美国最早萌发民粹主义。当时在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俄国民粹派宣扬“人民是真理的支柱”,人民群众比社会精英卓越,主张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由俄国现存的农村公社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而同期的美国,在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人民党激进运动,宣称“平民才是共和国的创始者”<sup>②</sup>,他们控诉社会权利不公,批判社会精英的道德堕落。这种以农民为主

\* 收稿日期:2020-03-24

作者简介:布成良(1963—),男,山东梁山人,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发展研究”(19BKS104)、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17ZD004)的阶段性成果。

②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体的“民粹主义”具有“反精英政治的价值取向”<sup>①</sup>。马克思曾经对民粹主义思潮,特别是俄国民粹主义更是作了深刻的剖析。列宁对民粹主义更是作了系统的批判,指出民粹派的“社会计划”不过是“空洞而有害的思想”<sup>②</sup>,同时强调应该把民粹主义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区分开来<sup>③</sup>。

民粹主义并未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而消失,它成为一个游荡的幽灵,曾在20世纪欧美等地数次刮起旋风。从现在世界范围来看,民粹主义思潮尤为活跃。这股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持续深化,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众对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精英垄断和政党恶斗等现象的不满加剧,在一些政治势力借机利用下,持续活跃,不断抬头。这股思潮在经济、政治、文化、民生、外交等领域都有所表现。譬如,在经济领域,民粹主义与反经济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相互激荡相互利用。一些民粹主义者将国内经济发展的困难归咎于全球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抢走了他们的市场。在民粹主义鼓动下,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法国国民阵线政党坚持“法国优先”原则,提出“经济爱国主义”,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等;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无视世贸规则,大打贸易战。再如,在民生领域,民粹主义打着关心底层民众的旗号,主张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当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则可能酿成社会动乱。由燃油加税问题而引爆的“黄马甲运动”从法国蔓延至欧美各国,打砸抢烧事件不断上演。归根结底,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产物,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及其呼声。但从其主张来讲,其观点与举措呈现出模糊性、狭隘性和非理性。

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在现今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具有全域性的特点,在全国影响更大,甚至在全球也有反响。网络虚拟社会具有便捷、“去中心化”特点,网络民粹主义则是现实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借助网络空间而形成。<sup>④</sup>与传统社会的交往不同,网络交流或交往具有互动开放、自由表达的独特性,喜欢反对正统与专业观点,挑战权威、构造与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仇视精英(仇官、仇富、仇专家)的言论和情绪,赋予了各阶层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在无边界、分散式存在的互联网平台中,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发表意见,观点表达的权利不受限制,从而构建起一个个性解放、民情沟通便捷的公共舞台。

## 二、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

世界民粹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导致社会矛盾凸显与激化,使得民粹主义不断滋生并形成。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只是在某些领域有特定表现,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规模,更多地借助于网络媒体、文学艺术形式来表达不满,或者借助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进行情绪宣泄。<sup>⑤</sup>因此,我们对民粹主义既不能泛化、夸大,更不能忽视、淡化,要充分认清网络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形式和危害。

### (一)打着民主的口号,构建“网络广场政治”

①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②《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③《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2页。

④华东师范大学郝宇青教授认为,网络民粹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类型,网络只是民粹主义的载体之一而已。郝宇青:《社会情绪民粹化:形成机理及其消解》,《学术前沿》2019年第9期(上)。

⑤程同顺、杨倩:《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当今时代,互联网具有扁平性、匿名性和聚集性,这为普通民众宣泄情绪、表现自我提供了平台,网民狂欢有了最优场域。否定并仇视精英群体,对精英群体的固有权力与威望的抵制与瓦解,是其狂欢主旨及其话语核心。每当出现权富阶层有关事件时,网民尽情宣泄“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专家(砖家)无用”,表达对权力和精英的极端不满和对立情绪,并且汇集网络民意、运用道德审讯,从而构筑“网络广场政治”,引发集体行动。当前,我国民粹主义常常表现为线上线下的联动性。在有关住房拆迁、司法审判、环境保护等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几乎总给地方政府、官员贴上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等标签,以“侵害公共利益”之名加以声讨,而对“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却置之不理。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下,对“事件”习惯用一种非理性、非常规的视角去审视,(阶层)“身份”成了网民或支持或反对的重要考量。

网络世界中,所有人直接参与活动,都能相对平等自由。民粹主义凭借网络集体行为表达、汇集民意以审判精英的“集体狂欢”,尤为引人注目。这种由乱序的网络民意构建的网络广场政治产生过程是:涉及干群、劳资等矛盾纠纷的新闻事件,部分网络大V“公知”抢在官方声明发布前,便直接爆出精英的谣言、绯闻等猛料或刻意美化民众的言论,接着在微博、贴吧、微信朋友圈等被大量点赞、转发与评论,进而激起舆论狂潮。<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网络大V“公知”颂扬大众、污化精英的舆论导向,使预设的“人民”一出场便有强烈的动员效应,以此煽动、诱惑进而操控大众对精英群体进行道德绑架,并以“人民”的名义展开舆论审判。

## (二)网络草根文化的建构以平民化和大众化为文化活动合法性来源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部分文化生产指向基层的人民大众,加之后现代主义的不期而遇,于是网络空间充斥大量平面化、无深度的文化景观。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文化民粹主义萌生且形成一定规模。它们对待大众文化秉持特别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即使民众酷好另类的个性、性、绯闻、残暴等,甚至是人的恶俗品性、负面特质等,如果用有特性的语言和形式生动地表现出来,也往往被民粹主义给以合理化。民粹主义对以高雅为典型的“中心”文化进行反对、抵制,而把人民大众视为文化合法性的唯一正确来源。

消费主义的盛行助力当下文化民粹主义萌动和蔓延。消费主义主张应当即时满足大众需要的一切,大众需要与喜欢的一切倾向都是合理的。消费主义构造出大众文化繁华的假象,感性化的快感文化,容易激发受众文化消费的快感。文化民粹主义以平民化与娱乐化的旗号,制造出一种低质“垃圾文化”,包括恶俗、低俗与媚俗的网络视频、歌曲、舞蹈等,并体现出浅陋、出位或泛娱乐特质。传媒经营者是此类网络传媒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网民个体。尽管这类传媒内容极力推许和崇尚所谓“人民大众”的审美,但它的动机则是追逐商业利润最大化,而对高雅文化予以抵制,结果只能创制出低质循环、意义虚无或虚化的文化。

文化民粹主义的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山寨、恶搞和“三俗”文化。各类“山寨文化”通常冒充一些知名品牌、模仿权威电视节目,如(山寨)春晚,(山寨)新闻联播等品牌栏目。“恶搞文化”则通常是恶意篡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历史人物,以解构、反讽、模仿等手法表达对正统文化和经典的蔑视。“三俗文化”主要指纯粹为谋求收视率而粗制滥造的电视节目和网络小说等,大多单纯谋求感官刺激和娱乐,以恶俗、媚俗、低俗博人眼球,没有多少优质内涵和价值。

## (三)打着关心平民的旗号,主张不切实际的民生政策

福利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转型中,由于两极分化,广大民众

<sup>①</sup>袁婷婷:《民粹主义的中国境遇》,《探索》2018年第1期。

萌生对富人的不满和敌视情绪,加之一些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一些政治家打着为平民大众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福利待遇的旗号,挑起平民大众的“期望增长革命”,诱引他们对财富和生活产生不合实情的虚高追求。民粹主义者采取迎合策略,运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手法,以“民众至上”名义施行片面的高福利政策,从而使国家债台高筑、经济大跌、社会动荡不已,临深渊而不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拉美病”。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发展,众多深层次矛盾交织缠绕在一起,社会焦虑和躁动情绪也在增长。底层民众开始滋长仇富的心理倾向。有些人出现“恋旧”情结,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倡导平均分配社会财富;有些人与之相反,但要求的工资、福利、待遇不着边际,幻想所有的民众日常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是民粹主义与高福利主义相结合,即“福利民粹主义”。客观地看,之所以产生福利民粹主义的现象,这也与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经济改革超前于社会改革,而社会政策和保障体系相对滞后有关。普通民众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负担沉重,对社会产生较多的怨尤甚至憎恨。

#### (四)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耦合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耦合这一现象在 21 世纪愈发明显,世界广为关注。民粹主义含义宽泛,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一切民粹主义都具有民族情怀。一般来讲,民粹主义高度强调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受到外敌入侵和胁迫之时,人民利益迅速上升至国家共识,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本民族全体成员一致抗外。于是,民粹主义便极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走向合流,有一个生发过程:一些牵涉“外敌”的网络话语,先是被部分网民、网络公知挖出、“泄露”,引发很多网民关注,进而聚集围观,最后在“爱国”的言论包装下挑起网络“声讨”,掀起舆论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外敌”被丑化,网民被裹带参与,人民意愿与国家意志达成一致被视为最高原则。“民粹”转化为“族粹”,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走向联合。

互联网时代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往往是线上线下互动:网上造势,可能挑起一阵阵网络舆论狂潮;网下借势,可能致使网下抵抗国外力量的集体行动频发。网上网下彼此烘托。然而,这种做派却忽视“外敌”信息是否属实、立场是否客观。部分网民对外持有强硬态度,吁请党和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凡有损中国主权与利益之事都不退让、不妥协,凡与中国政见相左者,都予以坚决反对。这一群体线下操纵或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极易转化为以“爱国”为名、以“民粹”为实的野蛮行径,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破坏。一味对“国外势力”极尽怒斥、鞭笞,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大国心态。

### 三、认清民粹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针对民粹主义思潮,我们要加以辨析引导。要注意把民粹主义与我们党坚持的“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政治立场区别开来,把民粹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区别开来,引导人民认清其实质危害。

#### (一) 民粹主义不等于人民或平民立场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的阶层分化严重,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的鸿沟越来越明显。但是,民粹主义不等于人民或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这是世界民粹主义的共性。俄国的民粹主义就如此。它是非常尊崇农民的,列宁认为,民粹派鼓舞民众、唤起数十人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就是“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

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sup>①</sup>。民粹主义反对农奴制残余和沙皇专制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意义,但是,他们抱着俄国落后的村社经济不放,把村社和农民自治美化成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他们不把工人阶级作为创造幸福生活的主要力量,把单干的农民作为“危险的敌人”,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同政府的斗争上,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自己斗争的主要手段。因此,理论的错误导致民粹主义行动上的多次失败,他们不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从而招致反动当局更加疯狂的镇压,由此更加脱离人民,使无数热血青年死于屠刀之下,最终使革命归于失败。

无独有偶,民粹主义采取唯心主义平民史观的叙事结构和一些习惯用法,在当代中国也得以延续。首先,模糊概念,割裂“人民”。当代中国,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涵盖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拥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者等。而一些民粹主义却把我国的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等社会精英剔除出“人民”范畴,划入其对立面,进而把“反权力”“反权威”“反精英”意图包装为“人民”的立场和诉求。“人民”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元素,但实践中“人民”却不是决定民粹主义话语的因素。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的话语是建构出来的,不是由主体的阶级、文化和社会地位事先决定的。它是把多样诉求在人民话语中暂时性统合的政治逻辑。其次,虚张声势,夸大所谓“人民”的品性和作用。将人民和精英相对立是民粹主义的话语特点,并以此设计出一幅异样的社会心理图像。<sup>②</sup>“人民”不包括精英在内,拥有优良品性、独特审美品位、心系国家的情怀,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存在。最后,以假充真,蛊惑人民。民粹主义看似崇拜民主,但实际是反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追求更加纯粹的民主自由。他们所谓的“民主、公平、国家”利益诉求,实则是对部分人的利益替代全体人民利益,不顾及少数与多数,不考虑眼前与长远,其结果容易损坏和侵害部分人的基本权利,损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二)民粹主义假民主之名行“暴民”政治之实

民粹主义往往是富有激情和浪漫的。西方民粹主义有两种“反建制”运动:寻求变革的激进反建制和保守的诉求传统价值理念的反建制运动,或称之为左翼、右翼民粹主义。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恐惧竞争的保守力量。特别是当大众被某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掌控和操纵的时候,民粹运动通常成为强制众人意志、压制个人权利的专制手段。民粹主义者也视自己为真正的“民主斗士”。诉诸人民、动员草根大众参与政治,借助人民的观念、以直接民主的形式决定政治过程,宣扬“全民公决”、行使“人民的创制权”等,实质上就是以专制替代民主、以道德替代法治。

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以人民的名义来为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选择进行政治辩护,这对推动大众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监督政治权力和精英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罔顾事实真相,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政府、精英赞成的就坚决反对。在诸多公共事件中,凡是政府部门阐释或专家出面辨析的,都被贴上强权、精英的标签而大肆攻击。在话题讨论和舆论形成中,一味反对权威、反对精英、反对理性,实质上是对民主的误解和歪曲。

## (三)民粹主义营造强化阶层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加剧社会矛盾

网络民粹主义往往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归罪于社会发展的不公,将一些民众的弱势地位归咎于权力不当执行和腐败,将贫富分化归咎于富人阶层的贪婪和原罪,将社会不平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9页。

<sup>②</sup>[德]沃尔特·奥彻:《民粹主义与煽动》,金寿铁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

等归罪于精英阶层的冷漠和无良,将个别名人的行为失范归责于整个精英群体的品行低下,并以替底层代言的姿态表达不满和反抗。这种藉由敏感话题,“逢富必骂、逢官必唾、逢专家必讽”的怨怼情绪,使网络空间弥漫着仇视、愤恨和暴力。

从历史维度看,贫富分化是经济问题,阶层固化是社会问题,社会不平等是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土壤。网络民粹主义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占据最优地位的精英阶层,拥有制定政策和法律等大量资源,而在社会生产、分配领域处于弱势或劣等地位的普通民众,则没有多少资源。由于二者(精英与大众)的地位不平等,网络民粹主义把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看作精英人物的暗箱操作,宣扬政策创制是偏私的,将政策问题视为平民与精英之间的角逐,把政策制定过程上升为“正义与邪恶”斗争,抵抗一切政策协商和妥协。民粹主义者以所谓“人民”的诉求故意散布失实的、歪曲的消息,不惜利用并渲染“危机”意识,诉诸直接民主的方式引发人们共鸣,向政府施压来解决问题,从而影响、阻挠政府正常的决策。

#### 四、消解民粹主义的社会危害和影响

被组织起来的“人民”反对某社会精英及其统治,争取自身利益,进而由思潮发展为运动,是民粹主义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网络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产生许多干扰,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我们要正视民粹主义、重视民粹主义给现代化带来的纷扰和危害,防范和控制网络民粹主义由思潮演变为运动,依法治理网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一)建构具有感召力的话语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虚假意识形态的膨胀刺激网络舆论非理性表达,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恩格斯早在1893年就曾指出,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思想家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sup>①</sup>他们割裂了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纯粹的思维中想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sup>②</sup>。由于传统舆论表达环境和条件限制,底层民众不得不诉诸网络表达利益诉求和抗争。而权力行使者(公共政策、网络管理等部门)有时又采取删帖、训诫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堵塞不当言论,对民情浩荡的“网络事件”不予理睬、或言不由衷或口是心非地应对,这往往又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攻击的口实,引发新一波情绪旋涡,从而使网络舆论偏离了客观、公正、理性的轨道,而代之以情绪化、极端化、盲从化,成为“暴民政治”的发泄场。

因此,意识形态“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至关重要。当前,要通过设置议题、培育“国家队”等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大有作为,要创新表达方式、树立核心价值观、拒绝民粹主义。当前,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主流意识形态为民众真正理解、认同和掌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在网络平台使网民用理性意识表达言论,通过教育使广大网民自控与自律,不在网络空间做民粹主义言论的散布者和传播者,以形成治理网络民粹主义的合力。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7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二是创新宣传思路和话语体系。将严肃性内容作一种通俗化的演绎,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西装革履”的形象,及时捕捉、运用网民话语体系,以“休闲舒适”方式与网民沟通,让普通民众愉快地接受,缩短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与舆论宣传之间的差距,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力和凝聚力。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用艺术直观、真实反映反腐现实,以时代化、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艺术方式有效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达到了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而且还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因此,培养具有思想成熟、文明理性的现代网民,要通过多种宣传和教育手段,多方并进、多策并举,压缩网络民粹主义的生存空间,提高网民净化、捍卫精神家园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要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特点、新趋势,及时分析研判,牢牢掌握主动权。主流媒体肩负舆论引导的重要使命,在治理网络民粹主义时不能缺席。它能够发挥三项重要作用:一是客观报道事实,为公众提供权威的“事件”真相;二是提供权威的信息渠道,发表理性意见,以其信誉赢得民众信任,消除民众的“误会(误解)”,从而凝聚社会共识;三是宣传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取向。公信力是主流媒体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在陷入信息混杂、混淆视听的网络舆论事件中,每当民粹主义趁机“极化”舆论的关键时刻,主流媒体要满足公众知情权,及时发布信息以正视听。在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上,主流媒体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在网络媒介事件的舆论漩涡中成为中流砥柱,不让民粹主义绑架民意,不被极端分子蛊惑煽动。揭露谣言、澄清事实,让公众明白网络事件的是非曲直,防止陷入“塔西佗陷阱”。

## (二)全面深化改革,铲除民粹主义滋长的社会土壤

破除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治本之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前提下破除利益格局的固化,消除体制机制的僵化,坚持和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社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切蛋糕”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对当前分配结果的不满成为当下底层社会民众对利益的强烈诉求,而既得利益集团是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主要障碍。只有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才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解民众的民粹情绪,挖掉民粹主义滋长的社会土壤,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sup>①</sup>。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要在初次分配中不断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要完善再分配机制。政府着力通过法律手段和改革措施,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得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政策托底、保护弱势群体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群体。

当然,加大再分配力度和改善民生都不能脱离实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提出过高要求,更不能开空头支票。一些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过度承诺和高度福利化,反而导致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国家经济最终恶化,无法达到预期成果。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引以为训,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坚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持续、扎实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sup>①</sup>《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

### (三) 培养现代公民,拓展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路径

网络空间的山清水秀需要网民的参与,不断培养理性商讨的公民、营造理性表达的氛围,逐渐消除网络民粹主义的戾气,形成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

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从侧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利益诉求不畅。以封堵公民参与渠道的方式来压制民主进程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参与带来不稳定,但制度化参与却带来稳定。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因此,必须畅通民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主动引导网民在网络空间积极参与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调动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我们要让网民尽可能地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促使网民在一些公共事务的争论、商议中更加理性,用更多的公共讨论平衡非理性的激情和冲动,从而培养多元宽容、文明理性、向上向善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

为此,政府可以提供网络协商民主的经典案例蓝本,可以探索建立一些网络政治参与制度模式,如建立类似人大代表的网民代表制度,网民合理化的诉求通过选拔的网民代表及时反映给政府和社会;又如,举办一些专家研讨和公益性讲座等活动,引导网民在对社会热点的公共讨论中注重理性表达,避免用非理性的情绪化语言。网络管理部门有意识地开展互动参与的训练,能够使网民养成“兼听则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打破网络民粹主义话语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更能够让人民群众在讨论和互动中感知、感悟真理,逐渐摒弃非理性、极端化的民粹主义言论。

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决定着网络空间的整体思想状况,“80后”“90后”的青年具有很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信,应将该群体发动起来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新时代公民意识早已觉醒,并逐步强化,必须给予民情民意一个表达空间,下情适时上达,同时进行必要的疏导和认真解决反映的问题,才能避免民粹主义暗涨泛化和激化。

### (四) 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民主政治要从民粹主义诱惑中解放出来,需要借助法治。运转良好的法治制度对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首先,要加强网络立法,净化网络环境。民粹主义因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发酵,要消除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需对“众声喧哗”的网络进行规范与引导,需要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网民等网络行为主体确立行为边界,保障互联网空间的安全和秩序。其次,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真正落实。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等权利,有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有劳动与休息权、财产所有权与生活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权利。要切实保障、落实好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利,对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要严肃处理。同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要规范公民履行义务的行为。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要平和理性,言论、批评等权利行使要追求真实客观等。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从社会发展和互联网迭代更新的趋势来看,不存在“一直正确”的理论主张和“完美无缺”的实践模式。网络民粹主义在关注底层民众利益、监督精英和社会权威、预警社会矛盾与冲突、调动民众参与意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其极端、盲从、不理性的特点,极易催生网络甚至现实暴力,其消极的一面危害更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披着“公平、正义”的外衣、实际上却往往捍卫自己或群体利益,貌似具有目的合理性却没有手段合理性,标榜道德与民主却往往煽动仇恨、撕裂社会的思潮或运动。这种思潮或运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醒,并适时采取措施化解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推动互联网治理优化转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信息化保障。

(南京市委党校王兵对本文有较大贡献,特此致谢。)

## Expression, Essence and Response of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 Che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Nanjing Jiangsu, 210009)

**Abstract:** Currently, the trend of populist thought is flooding around the globe.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its influence has spread widely to the realms such as world economy, cul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escapably,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populist tid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ity and contentiousnes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raming "square politics" in cyberspace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legalizing cyber-grass-root cultural system based on popularization; advocating unrealistic welfare policies in the name of caring for citizens; the occurrence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observed by Chinese scholars. To prevent populism from harming the Chinese society, we must exactly take hold of the essence of the current China's populism and take specific measures while cultivat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s:** populism; network square politics; network grassroots culture; nationalism; social thoughts

责任编辑:王盛辉

# 城乡协调发展视域下的资源要素流动 问题研究:从微观机理到宏观效应<sup>\*①</sup>

乔翠霞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摘要:** 经济运行总是会表现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上,城乡资源配置失衡是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审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路径通畅性、资源流动性、城乡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关联度、制度变迁是影响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的基本因素。对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微观机理和宏观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呈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进过程,并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迁。构建合理的城乡资源配置秩序将是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影响因素;微观机理;宏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099-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2

## 引言

经济运行表现为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一旦资源的流动因为某种因素受到阻滞,经济发展效率自然会受到不利影响。<sup>②</sup>从这个角度审视,城镇化必然伴随资源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互流动。换言之,长期困扰我国的城乡差别问题,资金和资源要素的短缺并不是主要瓶颈,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才是关键因素。<sup>③</sup>关于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国内学者如任迎伟、徐祥临、刘维奇、林刚、李晓燕<sup>④</sup>等,还是国外学者如亚苏塞德·缪拉塔(Yasusada Murata)、阿耶莱·格兰(Ayele Gelan)、龙花楼(Hualou Long)<sup>⑤</sup>等,大多将其放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

\* 收稿日期:2020-04-01

作者简介:乔翠霞(1972—),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三权分置’背景下山东农村土地流转创新路径研究”(18CJJJ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断裂与重构:基于利益格局调整的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研究”(18YJC790213)的阶段性成果。

②孙伊然:《流动性链条的断裂及其制度背景——对“布罗代尔钟罩”的一个解释》,《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③郭树清:《促进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9日。

④任迎伟:《城乡统筹中产业互动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徐祥临:《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事关大局》,《学习时报》2010年11月22日;刘维奇、韩媛媛:《中国城乡资源流动与城乡互动关系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10期;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中国乡村研究》2007年总第5辑;李晓燕、张克俊:《城乡要素交换中市场与政府协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0期。

⑤Yasusada Murata,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24, No.6, 2002, pp.1-34; Ayele Gela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urban-rural linkages: a CGE analysis for Ethiopi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24, No.6, 2002, pp.707-738; Hualou Long, Jian Zou, Yansui Liu,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33, No.1, 2009, pp.454-462.

多数研究认为,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城镇化进程显著正相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经典的理论当属弗里德曼(Friedman J.R.)的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认为,区域间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总是呈现鲜明的趋利特征,持续从低回报率的欠发达地区向高回报率的发达地区流动。因此,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边缘区资源要素大量流入核心区,只有到工业化成熟阶段,随着核心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一趋势才会逆转,资源要素才会向边缘区回流。长期以来,这一理论成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研究的主流认识。<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在论及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时,理论界普遍认为,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在农业领域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实现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才有出路。对此,我国学者林刚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基于纵向的历史考察,林刚认为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所谓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进而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规律”是一个“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任何“非农”产业都不可能是在损害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得到真正发展。基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他主张只有加强工农业互动和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互动,才能在工农业一体化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全国的现代化。<sup>②</sup>而张宗斌等学者则指出:“城市和农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是极为不同的……一个特定的国家,如果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同,那么这个国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也是不同的。”<sup>③</sup>

从我国的实践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恰恰走了一条以城市为导向、片面强调资源要素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路径,这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性原因。在此背景下,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以期矫正由农村向城市单向聚集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其指导思想就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sup>④</sup>。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比较有影响的成果,如段娟(2006)、党国英(2013)、王颂吉(2013)、张克俊(2019)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问题进行了探讨。<sup>⑤</sup>但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当前我国城乡资源流动现状、影响和对策的研究方面,而对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微观运行机理和演进过程的阐释则相对较少。

当前,城镇化进程正在全球不断加速,我国同样深处这一进程之中。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不可能简单地表现为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的单向转移,其关键还在于农村的发展。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sup>⑥</sup>。2017年中央农

①T. Scarlett Epstein, David Jezeph, “Development—There is Another Way: A 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Paradigm”, *World Development*, Vol.29, No.8, 2001, pp.1443—1454.

②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中国乡村研究》2007年总第5辑。

③张宗斌、汤子玉、辛大楞:《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5月6日。

⑤段娟:《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述评》,《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4期;党国英:《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前线》2013年第12期;王颂吉、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7期;张克俊、唐新:《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再分析与统一建设取向》,《中州学刊》2019年第11期。

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2月2日。

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加快深化农村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sup>①</sup>,中央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改革设计的思路非常清晰,但到底该如何在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设计城乡资源有效互通的体制机制,通过城乡资源要素互动带动农村和城市的协同发展,似乎并没有破题。本文将从城乡要素流动的内涵、微观机理、演进过程、宏观效应等方面深入探讨,以期阐释我国推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理论依据和总体方向。

## 一、城乡协调发展视域下的资源要素流动:内涵和影响因素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协调发展体现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三个维度。<sup>②</sup> 时间维度强调的是单一系统内部或多个系统之间的发展在纵向上是平稳、可持续的;空间维度强调的是各个区域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在发展速度、水平、结构等方面的整体配合、合理布局;功能维度侧重从经济社会功能角度强调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以防止系统内各要素在功能上的内部耗散和抵消。城乡协调发展主要从空间和功能维度,强调城乡的协调互动。关于城乡协调发展,尽管理论界有诸多不同的提法,比如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合作发展(斯卡利特·爱泼斯坦 Scarlett Epstein),等等<sup>③</sup>,但重视将农村和城市纳入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让农村和城市建立伙伴关系,在发展空间和功能上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最终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共同繁荣,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其共同的目标。

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是指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土地、产权等资源要素在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跨界流通,以实现功能上的优势互补和收益的最大化。得益于较高的回报率,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部门首先成为组织、人才、资金、公共服务等各种资源的汇聚地,资源优势最终会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城市部门快速扩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城乡间资源要素的收益最终将趋于均衡,城乡发展水平逐步趋同。反之,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长期失衡,最终会制约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率。<sup>④</sup>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sup>⑤</sup>。这里的“平等”强调的是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处在平等的位置,自由、自主交换各自拥有的不同资源,最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事实上,城乡资源要素转移的路径、速度、效率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随着对城乡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学者也尝试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知识探讨城乡资源的流动规律,这大大拓展了城乡要素流动的研究视角。<sup>⑥</sup>

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1日。

②吴殿廷等在论文《我国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初步评价及预测》(《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10期)中提出了衡量城乡协调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本文认为,这种二维评价标准缺乏对各系统功能协调性的考量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加入功能维度,以期更为全面地考察协调发展的内涵。

③T. Scarlett Epstein 和 David Jezeph 在 2001 年使用“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一词阐述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城乡合作发展可以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共同受益。

④孙琳琳、佟娅:《城乡资源配置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纵横》2013年第1期。

⑤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⑥张占斌:《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Markus Jokela, “Flow of cognitive capital across rural and urban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Vol.46, No.5, 2014, pp.47-53.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对外部环境感应度较强,路径的通畅性、资源的流动性、城乡发展水平与产业关联度、制度变迁等等都会在不同维度上影响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

第一,路径的通畅性。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实现,也可以在企业内部完成。市场机制是城乡资源流动的基本手段。资源的跨城乡流动实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由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共同引导经济主体打破城乡市场之间的藩篱,突破区域限制,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高度整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若城乡市场相互封闭运行,市场机制沟通城乡的路径就会被阻断。也就是说,如果城乡统一的开放市场缺位,传统城镇化路径形成的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会不断被强化,城市不断膨胀,农村继续萎缩,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无法形成。从我国的现实看,要素在城乡间的不同回报率是城乡要素配置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天然具有逐利本性的要素仍然会持续向城市聚集。因此除了市场机制,城乡资源的流动还需要发挥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能。即通过各种外部政策和利益“补偿”,诱导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实现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改变原有资源流动路径,矫正单纯由市场机制诱导的城市导向的资源单向流动模式,带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回流。

第二,资源的流动性。城乡资源流动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扩大的重要原因。蔡洪斌在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时曾将失衡划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sup>①</sup>静态失衡状态下,失衡会被长期固化;动态失衡状态下,失衡会经历从大到小、从有到无的变迁。这两种状态的划分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同样适用。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下,所谓静态指的是资源要素流动处于停滞状态,因为资源失去从低利用率区域(或所有者)“转移”到高利用率区域(或所有者)的机会,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失衡很难得到矫正;相反,在资源可以突破区域和所有者进行自由配置的条件下,失衡改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资源自由流动的机会就是资源的流动性,它体现在资源“转移”的能力、可能性空间和速度三个维度。资源转移能力往往取决于资源自身的特点,而后两者则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制度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sup>②</sup>孙伊然通过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析发现,“政治上的专制集权是造成传统中国经济上流动性停滞的渊藪”<sup>③</sup>,以我国人口的流动为例,户籍制度就是人口在城乡间转移的根本制约因素。此外,城乡资源流动成本、资产专用性壁垒、教育壁垒、人力资本壁垒等都会影响城乡资源流动的速度和范围。

第三,城乡发展差异和产业关联度。城乡发展水平差距影响资源的协调性<sup>④</sup>,城乡产业关联度影响资源的互补性,而资源的协调性和互补性都直接决定城乡资源流动的活跃度。城乡发展水平差距与资源要素流动活跃程度之间密切相关,城乡发展水平落差愈大,资源要素的协调性愈低,进而其流动的活跃度也愈低,反之亦然。城乡产业关联度对资源流动活跃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城乡产业关联度愈高,城乡资源间的功能互补空间愈大。由市场主导的内生型城市,由于是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实现资源聚集,因此往往与当地资源禀赋高度关联,故当资源聚集效应穷尽时,城市资源向农村的回流就会相对通畅。相反,一些由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由于其扩张发展往往并非源于当地资源禀赋,一方面成长起来的部门缺乏当地资源的支持,其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和当地资源关联度低,城乡资源互

①蔡洪斌:《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企业观察家》2011年第3期。

②孔凡义:《社会流动、制度变迁与政府管理创新:以C市实证研究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③孙伊然:《流动性链条的断裂及其制度背景——对“布罗代尔钟罩”的一个解释》,《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这里,资源的协调性是指各种资源要素在技术水平、质量、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大小直接决定资源协调性大小。

动的通道亦严重缺乏。<sup>①</sup>

第四,制度变迁。诺思认为,制度会提供特定的激励,并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在城乡经济的互动发展中,制度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sup>②</sup>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是制约城乡资源互动的关键原因<sup>③</sup>,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通过体制改革消除城乡间的制度障碍,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这决定了我国城乡资源流动必然带有鲜明的“制度性流动”色彩<sup>④</sup>,换句话说,我国的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将具有突出的制度变迁粘性,城乡资源要素无论是在流量上还是流动方向上的改变都将伴随着城乡分割制度向城乡均衡制度的不断演进。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城乡发展规划、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完善的要素市场机制,这些制度的创新都是影响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关键因素,其调整的深度和速度直接影响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效率。当然,无论是新制度的形成还是旧制度的打破都既要依赖政府部门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制度变迁路径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激励。

第五,其他影响因素。理论界关注度比较高的有:组织因素,即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协会、企业、大学等等,它们与市场和政府一起构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新的资源配置秩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sup>⑤</sup>;贸易自由状况,无论是城乡相互封闭运行的贸易状态,还是过度倾向于保护城市居民和生产者的政策都会阻碍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sup>⑥</sup>;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发展的相互依赖越强,工业化进程越快,这已经为日本的经验充分证明。相反,若农业生产中工业投入品份额过低,同时伴着工业消费品份额的不足,经济发展就会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sup>⑦</sup>;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交通、通讯、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影响资源向农村回流的基本条件;社会文化背景,城乡居民在生活方式、理念、内容等方面差异性越大,资源要素在城乡间转移的阻力也就越大。

## 二、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微观机理和演进过程

从微观运行的角度分析,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就是经济主体在价格机制的诱导下,在供求机制的平衡下,由竞争机制和利益机制推动将资源在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之间优化配置,以达到收益最大的目的。这意味着,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由以下四个机制(见图1)诱导:(1)价格机制。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杠杆,资源的流向、速度、数量都与价格波动密切关联。要素价格的形成是要素回报率等经济因素和政府价格规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后者的作用力越强,要素价格的

<sup>①</sup>林刚在其《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中国乡村研究》2007年总第5辑)一文中曾经这样评论我国近代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新式工业发展是在外国列强垄断国际市场并横行中国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产生的。它自身缺乏独立发展壮大条件,在经济上不能产生拉动传统部门向现代化变革的强大力量。”林刚所提到的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是本文所说的外生型城市化,由于并非根植于当地经济,城市与农村的互动能力明显较弱。林刚所讲的不能产生拉动传统部门向现代化变革,究其根本就是无法实现城乡资源的互动。

<sup>②</sup>Anit Mukherje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35, No. 10, 2007, pp.1621-1634.

<sup>③</sup>陈锡文:《如何突破农村发展瓶颈?》,《农村·农业·农民(A版)》2007年第1期。

<sup>④</sup>孔凡义:《社会流动、制度变迁与政府管理创新:以C市实证研究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sup>⑤</sup>高丹桂:《论组织对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商业时代》2011年第3期。

<sup>⑥</sup>Ayele Gela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urban-rural linkages: a CGE analysis for Ethiopi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24, No.1, 2002, p.707.

<sup>⑦</sup>Robert B Potter, Tim Unwin, “Urban-rural interaction: 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 *Cities*, Vol.12, No.1, 1995, p.69.

扭曲程度就越严重。(2)供求机制。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前提条件。快速工业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等要素向城市的聚集,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对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的需求又形成了城市资源要素向乡村回流的内在动力。追随消费需求的指挥棒,资源要素在城乡间转移,直至供求平衡。(3)竞争机制。藉由竞争,城乡资源要素与相应的需求相互选择、匹配,最终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需要强调的是,资源要素能够自由竞争的前提是严格保护的产权,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保障,竞争激励下的资源流动活力难以完全“迸发”。(4)利益机制。市场机制下,生产中的任何投入品都是逐利的。资源要素能够打破城乡、所有者进行重新组合,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回报。因此,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

从资源要素配置路径的角度审视,城乡资源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有三种模式(见图1)。一是市场导向型,即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市场壁垒,激发经济主体在城乡间配置资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资源在城乡间的良性互动。二是政府主导或支配型,即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或者直接通过行政命令甚至是严格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推动资源要素下乡。三是组织内整合型,即资源要素在所有者(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人)的统一调度下实现跨城乡流动。在科斯看来,企业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组织内整合型资源流动通常包括纵向一体化配置和横向整合配置两种方式。资源要素既可以在企业等微观组织内部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在产业链条上的纵向流动,也可以根据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调动资源的横向整合。在现实社会中,三种方式往往相互交叉融合,通过功能互补,发现最优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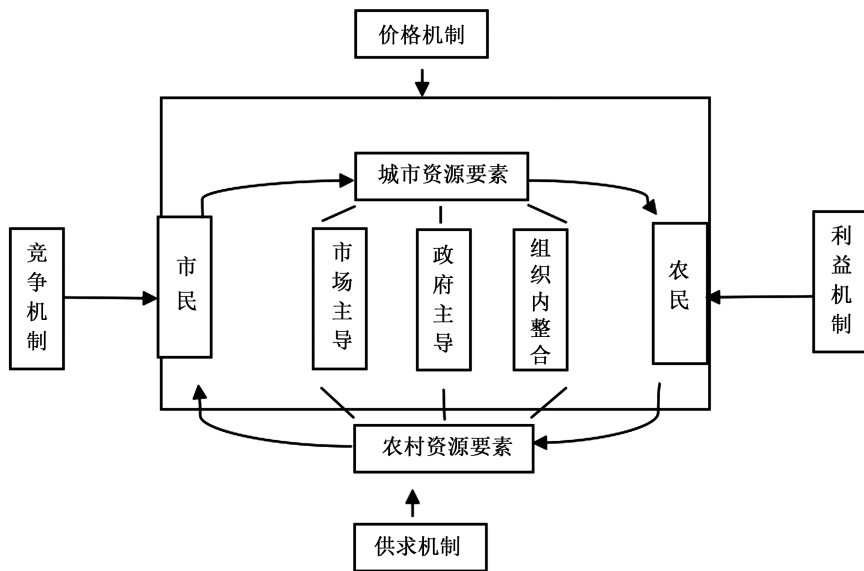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模式示意图

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即初级交互流动、城市导向式流动、高级交互流动阶段。第一阶段,初级交互流动阶段。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始于产业分工的出现和城市部门的发展。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和消费方面的依存度加强,

城乡生产部门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和城乡居民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产生了最简单的城乡资源要素交易。在这一阶段,城市经济发展较慢,城乡资源要素回报率基本平衡,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因此,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有限,方式也较为单一。第二阶段,城市导向式流动阶段。资源要素呈现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特点。在这一阶段,聚集效应和极化效应使城市成为资源要素的洼地,农村资源要素快速向城市聚集。若要素市场化进程不能与商品市场化进程同步推进,甚至出现城乡分治格局,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就会呈现“固化效应”<sup>①</sup>,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最终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并使之不断加剧。这一阶段将会一直持续到工业化成熟阶段(弗里德曼)。第三阶段,高级交互流动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初资源要素将快速向城市聚集,但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农村要素市场的逐步完善最终又会使这种要素流动速度放缓,直至出现流向的转变,即资源又反向回到农村。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拐点将在工业化成熟期出现。此外,这一阶段通常还会伴随着政府对农业和农村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城市资源要素回报率下降产生的推力和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产生的拉力大大提升了农村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城乡资源要素开始进入高级交互流动状态。所谓高级交互流动状态是相对于第一阶段的初级交互流动状态而言的,这种流动呈现大规模、全方位、多渠道、可持续的状态,是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

### 三、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宏观效应

要素流动可以推动城乡要素的边际回报率趋于均衡,这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sup>②</sup>从宏观角度审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带来的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诱发制度变迁。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资源、技术、劳动力是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核心要素,从宏观角度审视,要素流动可以激活闲置资源,提升资源配置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简言之,要素流动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基于此,国际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十分重视要素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国际经验也表明,工业化过程中,若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失衡,二元经济结构就会固化甚至恶化,最终阻碍整体经济的增长。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前30年城乡资源流动呈现向城市单向、快速聚集的特点,处在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第二个阶段。正是资源要素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支援了我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保持30年超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总是呈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再从新的不平衡到高一级的平衡的特点。资源要素向城市的单向聚集一方面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村、农民的发展。这使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形态不断被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开始由资源要素的短缺转变为结构的失衡。“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破二元结构还必须从资源要素配置的角度寻找出路。中央力推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其实质就是调整城乡资源配置的失衡状态,因为从长远看,新型城乡资源配置秩序的构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红利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影响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是要素结构的现实体现,资源要素的流向和流量决定要素结构,而一定的要素结构最终总是会通过经济结构表现出来。经济结构的调整

<sup>①</sup>吴华、武健:《要素流动规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中国财政》2014年第20期。

<sup>②</sup>张幼文、薛安伟:《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包括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高度化是指经济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合理化是指经济结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在技术经济联系、供给和需求、区域之间协调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从产业层面看,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主要体现为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其动力来自于产业间的不同投资回报率,随着资源要素交流渠道的畅通,产业间投资回报率逐渐趋同,产业结构也将逐步实现优化。在区域层面上同样如此,城乡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区域结构配置。从这一维度审视,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首先还须引导资源向农业和农村转移,只有推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高端资源要素向农村和农业流动,农村既有的资源和要素才会被激活,农业和农村才会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城乡才会逐步走上协调发展之路。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影响制度变迁。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客观上要求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之城乡统一的发展规划、城乡趋同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社会保障、金融、产权环境治理等一系列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又将进一步降低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成本,推动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体制机制层面的高度融合,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发展格局和分配格局,使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真正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轨道上来,推动经济要素在城乡间的统筹整合。

就我国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经济宏观效应看,前期城市导向型的长期失衡状态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了很多问题。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增长空间受到制约。经济长期增长依赖需求的支撑,资源要素长期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抑制了农村的消费,对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而言,农村消费乏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掣肘。经济增长更需要农业和农村的支撑。农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先行产业,一旦得不到相应发展,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其前向关联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因此,不断完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良性互动,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这是资源配置失衡的直接结果,无论是农业发展的滞后还是农村的停滞不前均源于此。因此,要实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换,推进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构建顺畅的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体制机制是根本出路。

### 结语

刘世锦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二是改变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sup>①</sup>正是要素流动和组合方式的改变大大释放了潜在的经济活力,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我国进入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又一项艰巨任务。从动力学角度看,我国要素配置还有着巨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尤其是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重构仍蕴含着巨大的动力,不仅能够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驱动,也将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sup>①</sup>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真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19日。

## Research on Urban-Rural Resource Factor Flow: From Micro-Mechanism to Macro-Effect

Qiao Cuixia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Abstract:** Resource factor flow and reallocation are expression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o China,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etwee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is the important cause which leads to the long-term problem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Considering the flow of urban-rural resource factors from the aspect of urban and rur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ome basic factors of rural-urban resource allocations should be attached much more importance to, such as the smoothness of the path, the flowing of resources, the difference of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levels and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Further research on micro-mechanism and macro-effect of rural-urban resource factor flow shows that the flow demonstrates a dynamic gradual progress cours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macro-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To construct a rational order of urban-rural resource allocation will be the intrinsic motive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rural-urb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 normal.

**Key words:** urban-rural resource factor flow; influencing factors; micro-mechanism; macro-effect

责任编辑:王盛辉

# 媒介品牌视野下近代新闻纸发展探索<sup>\*①</sup>

王天根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近代新闻纸探索涉及沟通中外与学习西方新知。相关命题关联标准化趋向下的新闻生产及传媒品牌的建构。近代新闻纸“达新知”涉及西学东渐语境,也关联传媒品牌盈利及其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由此探索近代新闻纸寻求富强的使命担当,以及经典传媒品牌在舆情向背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主体性发挥,从而在救亡或启蒙路径抉择中反省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救亡图存;近代新闻纸;媒介品牌;新知;富强

**中图分类号:** G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108-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3

作为近代新媒体,报刊在社会舆论乃至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报刊多被视作新闻纸或以新闻纸名义而登记注册。新闻纸的历史溯源,可追溯至鸦片战争前后的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sup>②</sup>,也关联驻英使节郭嵩焘接触新闻纸《申报》并就名誉诉讼案及解读<sup>③</sup>等。后苏精辑著《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据考释,《澳门新闻纸》的底本为The Canton Register(中文译为《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及《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从Register及Press可见,印刷品或纪事报多被视作新闻纸。而讨论近代新闻纸及其新闻生产乃至建构的新闻品牌等的著述鲜见,属研究薄弱环节。此涉及新闻乃至新闻纸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学者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一书中称,媒介学者哈特利强调,“要把新闻理解为一个‘文本系统’。这是界定新闻的一个路径——强调它的文本性,把它当作一种修辞形式或修辞形式的集合,一个话语结构,或一个再现的文化与文学类型”。舒德森称:“或者我们也可以强调,新闻是一个被制造的事物,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及其实践的产物。典型的社会学思维信赖经验性的可观察的事物,并能发现人类行为和目的缘起。”由此而论,“新闻的社会学分析采取这种经验性、技术性的路径,是一种策略”<sup>④</sup>。正是从新闻社会学层面考量,在近代新闻纸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强调“新闻生产”“生产过程”及其“标准化”等概念的使用,并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等。

\* 收稿日期:2020-04-05

作者简介:王天根(1971—),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15ZDB038)、“2018年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科研资助项目”(Z020144008)的阶段性成果。

② 陈胜彝:《〈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与林则徐走向“近代”的开端》,《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3期。

③ 梁骏:《被忽视的新闻先驱:郭嵩焘与近代新闻纸的进入》,《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2期。

④ [美]迈尔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 一、标准化与近代新闻纸生产及其品牌建构

近年新闻传播史研究越来越热,涉及新闻纸意义上的报刊与标准化的关系。何谓标准化?这个概念要有所把握。比如雨伞,类型繁多,但就标准化而言,其结构都差不多,都有伞把、伞盖,等等。再如吃的面包,外在的形式呈现也差不多。这些都属于标准化。标准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曾提出社会化大生产的两方面特征:一是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二是社会生产意义上的产品的标准化。应当说,标准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比如手机,虽然它有不同的品牌,但是它的标准化会导致操作系统、手机的外形基本一致,甚至手机壳、充电器可与其他手机品牌通用,因为通用可节省成本、可交换。所以,标准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标志。

报刊作为标准化新闻纸,与新闻产品是什么关系呢?其背后所涉价值取向与新闻品牌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涉及近代新闻传播史分析的社会视角。

近代中国新闻纸标准化历程分析,乃至相关传媒品牌建构的探索,须重文本分析,且应将文本、机构乃至受众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西学东渐语境下近代中国报刊的资讯内容有标准化趋势且涉及媒介的品牌建构。作为资讯新闻,其样态标准化和“五W”是有关系的。新闻报道乃至写作的衡量标准是“五W”: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五W是评判新闻标准化的重要元素。如果新闻报道中偶尔缺失一个或两个W,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只剩一个W,则大有问题。新闻报道呈现倒金字塔型,这也是结构的标准化。过去资讯往往采用发电报的方式跨空间传递,涉及电流“通断”“长短”而产生的电火花或没有电火花,由此记录点或线并代替文字乃至由此产生电报代码等,每个字符都值钱。且战争状态随时由于通电中断或无线电干扰,导致发电报或接收电报无法进行。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要把最重要的资讯内容交代清楚,塔尖一开始就要呈现“新闻”最核心的要素。最重要的信息在有限时间内为防止被切断,必须先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将有更多的细节,这也是新闻报道的标准化。简言之,新闻报道中,资讯的样态呈现有五W,是标准化的倒金字塔型。从最重要的事实走向细节的交代,亦是标准化。新闻纸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呈现也是标准化的产物。比如这是日报、周刊、双日刊或半月刊,而那是晨报或晚报,这些都是时间上标准化的结果。媒介标准化在空间上也呈现一张纸、一个或两个版面对开的形式,这种字数与版面限制等也是空间标准化的重要样态。从空间和时间界定新闻纸,界定媒介形态,对新闻纸非常重要。近代电报往往从发报计算每个字的花费等。同样,新闻纸中的广告属空间的标准化,报纸第一版还是最后(或曰“报屁股”)以及给予的版面、字数等等,都可用金钱衡量。

新闻纸的标准化涉及媒介品牌。标准化的把握、把关往往包括采写编评等多个方面和层次。采访时,有对五W情况在呈现及编评上对字数和版面控制,也涉及新闻纸的样态。诸如此类,都有把关尺度。新闻纸代表的媒介涉及标准化的样态,多以载体标准化呈现资讯或时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主观的,但标准化的样态大体一致。近代新闻纸版面及专栏、篇幅规划往往整齐划一,诸如新闻、评论、副刊、广告等,都是标准化产物。在新闻纸标准化的空间里,内容是什么?这张新闻纸如果是标准化的载体,新闻里面呈现“衣、食、住、行”还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讲媒介与社会关系时,往往涉及媒介的功能,即传媒往往能对国家乃至社会产生影响,有时能改造国家,有时又能适应社会。媒介改造社会,涉及媒介的主观动机和建构力量。比如,《时务报》《国闻报》对维新

舆论的建构,《民报》对三民主义等革命纲领的传播,多属引领,关联主观意图的倡导。舆论引领往往通过资讯或时评等连载方式从而达到片段连成整体的内容呈现。与此同时,诸多新闻纸在议程设置等样态上大体一致。一些新闻纸每天差不多有新闻及评论等,亦会创办星期天周刊,诸如《妇女周刊》,一周登一次。像这样时间上的连续性和议题的聚焦等,往往形成议程设置。相关议程大体建立在时间的标准化及议题的聚焦基础上。诸如对改良舆论的聚焦、对革命舆论的聚焦,或是《新民丛报》的意图,或是《民报》的意图,双方产生论战。要看到,资讯内容就那么一些,但作为媒介品牌,关键是内容的生产呈现的价值取向乃至风格等。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时评等又具有目的和动机的主观性,虽然它呈现的产品可能是标准化的,但是在内容生产中,可以揭示它的动机、立场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和媒介版式的标准化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品牌。媒介的品牌不局限于新闻报道标准化的五W,不局限于采写编评对五W的纠正,也不局限于字数多少及版面放在什么位置的新闻平台。它多指时评写作中主观的立场、动机,亦涉及时局把握和分析等。内容写作主观性,以及文本生产的标准化,在时事焦点评述结合上构成了媒介风格。资讯内容有限,但写法上的主观性、勾画场景目标和动机等,往往构成媒介品牌。应该说,媒介品牌有非常强的震撼力、影响力,但具体往往以字数、符合五W或是时事评论的体裁等客观呈现。同时,媒体品牌又有建构的力量,在写作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主观性。

第二,品牌媒介有其标准,类似雷达效应、强光效应。品牌媒介面对时代标志性事件,在内容上可预料呈现什么。而时评及价值取向等往往颇具特色,并以特色求生存及发展。此往往亦是新闻检查的重要内容,而检查制度涉及把稿件从一个品牌意义上的内容拼盘拿到宣传部门来检查。宣传部门检查指令若很震撼,必须接受。缘于应对新闻检查诸如间接反对接受这样的指令,第二天报纸在这部分内容的位置上就会开天窗。这个天窗实际就是内容标准化在版面字数上的缺失,变成了一种没有发声的沉默。没有书写的空白是惨烈的空白,成为变相的抗议。这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新闻检查中多次出现。新闻应当有与时刻乃至时序重要性相对应的标准化篇幅,包括字数等,且有标准化的实践和空间的展示。此时此刻没有,也算是媒介生态的一种抗议趋势。这种“开天窗”是对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重要看点,在西方新闻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闻标准化的生产有意缺席。

新闻及时评的写作或写法往往是另外一个主观性的努力,即面对相对客观的时间及版面上连续的议题,展示议程设置,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其写法往往和记者有关。同样一件事,比如面对劫匪抢银行、特种兵抢银行,如何评判新闻的优劣?好新闻,五W标准不能变。但写法上,价值和立场取向往往决定了新闻影响力的程度。“新闻”在标准化生产中的生命力多取决于写法,即媒介的品牌要借助内容及其加工等标准化生产。大多数资讯的聚焦是一致的,而在立场和动机上要有自己的取材,这往往构成媒介品牌的基础。《大公报》《申报》在近代中国的成功,大抵如此。

媒介品牌意味着节约受众挑选的时间成本等,也尽可能降低受众面对众多媒介的不确定性等。另外,媒介品牌还意味着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即通常相关媒介事件、政治事件,如果某家品牌媒介没有表态,没有报道,那么它就有可能无法成为重要的事件。品牌一旦形成,到达的影响力峰值越高,形成的雷达效应越强,就会有强大的探照灯效应,或产生名人效应。反之亦然,作为媒介品牌更加受关注和聚焦,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塑造力、改造力。这时,媒介不仅意味着适应社会,还涉及媒介担任消费向导等。以上为通则,具体到历史,则另有景观。

## 二、传媒品牌视野下近代报刊的求富求强

作为商品或政治资本的报刊媒介,其使命担当截然不同。作为商品的报刊媒介,往往将受众注意力当成商品二度“贩卖”给广告商,并且可以通过新的资讯提供新的生活变动或新的生活样态的可能性。报刊作为传播工具,其传播内容又往往涉及意识形态。媒介同时具有一种工具性,体现在技术上,即媒介是一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有2G、3G、4G、5G,手机是非常典型的移动媒介,资讯传播涉及流动的空间。而且手机和微信等资讯“流量”联系在一起,导致所谓“媒介化社会”。信息开始液化化进入社会生活,不是什么地方要不要进来,而是像一个低洼地带,信息流自然而然地渗透过来。由此而论,流动的媒介,“液化”的资讯,所以重要消息不可能不知道。

### (一)高度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国民财富来源分析

由历史比照现实,近代农耕向工业文明转向的经济升级中,第一要提问,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亚当·斯密等给出的解释较为完美,但并未关注媒介与财富生产的关联。而当下媒介化社会为讨论媒介与财富的关系提供了新情境。比照当下,将手机视作人工智能,无非就是一种科技。如果将电视看作媒介,它无外乎就是相对视觉意义上的报纸杂志、声觉意义上的广播,其图像声音合并的也就是视觉与声觉合并的衍生。媒介分析可能是比较古老的邸报及后来的民报、官报,也可能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电报;可能是广播、收音机,也可能是电视、电影。若从社会成本的构成部分等层面去考察报刊,新闻传播史学可能有新的路径。中国近代报刊往往由新闻、时评或社论、广告、副刊简约化处理的拼盘,之后是标准化版面折叠或书册形式。从消费者使用的便利性考察,大体可预见报刊将来的命运。就文本标准化而言,若说电影评价的尺度是现实在图像中诗意的处理,那么衡量报刊的标准无疑是现实在文字图像中选择性的浓缩处理。尤其要看到在媒介的功能乃至属性中,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它区别于报纸,也区别于电视。电影的产品恰恰可能介于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因为它是一种copy(拷贝)的方式,放电影依托一个拷贝,涉及摹本有限或无限制的复制。第一个拍摄并拼盘、剪辑的底本就跟报纸第一样板拼盘一样,成本较高,第二个胶卷就是拷贝。从理论上说,电影之所以能够无限制地复制下去,就是因为它可以拷贝。相比之下,近代《申报》等报纸杂志营利多靠广告。广播电视有广告,一般意义上的电影为什么没有广告?解答此问题时,需要能把电影特性界定清楚:它是介于报纸与音频之间的一种非常值得分析的媒介。它可以具有无限的复制性,具有媒介的特征。这些分析触及传媒盈利等,关联媒介化社会的国民财富分析。

当下媒介化社会若向前追溯,涉及近代意义上的新媒体——报刊及其功能乃至属性分析。在商战语境中,近代报刊发轫即具有商品特征。一方面,除了商品性以外,报刊常体现工具性。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报纸一定要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因为它具有组织性、战斗性等,可以捍卫人民利益并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报纸可以登广告,可盈利。就经营而言,报纸本身可能亏本,但是广告赚的钱足够多即可支撑。所以,报纸作为一种商品,其背后往往有广告商的赞助。政论性报纸往往涉及意识形态。近代报纸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可以评判社会,比如说这个是报刊社会,那个是广播社会,或者叫媒介化的社会。也就是说,报纸进入近代中国以后,它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关联,直接或间接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报纸盈利作为国民财富生产构成,需要新闻生产作为基础,诸如为国民提供资讯,并有时评等。总之,报刊舆论关联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资讯及时评往往涉及生活样态变动的可能性。

中国近代的报刊,包括传统邸报发展而来的官报,还有民间性质的《大公报》等。在西学东

渐影响下,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办报,后亦成气候,这样的路径发展形成了一种近代中国的报刊话语系统。像戈公振解释框架体现的进化论思想,即在历史阶段把控上,办报风潮存在一个阶梯比另一个阶梯更高的趋势。这种解释框架提出一些概念,然后进行历史分期,再论述报刊在历史分期中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系。总体来看,寻求富强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使命,如1927—1937年所谓中国“黄金十年”发展期,有短暂性经济繁荣,但仍处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之下。所以,这些报刊志趣及其风格大体上和救亡或启蒙的历史语境相联系。

近代中国涉及近代化的追求。1938年春夏之交,蒋廷黻所撰《中国近代史》对此已有涉及。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来看近代化的核心,涉及寻求富强的秘密或道路。什么是富强?求富求强的路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涉及近代化的史学语境。从以工业化为核心命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来看,国家富强显然有具体的目标。但从文化及其民族审美视角来看,富强更是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准提升等幸福指数在内的审美追求。文化审美层次上的富强涉及社会分层。这关系社会精英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民众代表的大众文化分野乃至论战。清季精英的中西文化观涉及中体西用等探讨,而大众文化则更多关注西方社会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影响。文化乃至社会出路的论争多有流变。总体而言,近代寻求富强道路涉及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 (二) 寻求富强语境下近代报刊发展路径探索

近代传媒与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密切关联。此涉及全球或区域传媒资源及传媒秩序问题,更涉及学术视野,所以值得探究。研究视野在传媒格局及其变动的相关分析中十分关键。一方面,全球传媒视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无论是中华传播体系,还是包括渤海湾多国关联的区域传播体系,还是东亚传播体系,还是所谓亚太关系调整或再平衡中的传播体系,皆涉及这方面内容。区域与区域、区域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传播系统的关联也十分复杂,近代列强以殖民主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关税意义上文化思想方面的抵制等等,都值得探讨。另一方面,传媒在区域文化中究竟是加强地方特色,还是在区域文化中打破封闭走向开通?这些命题涉及传媒在同一空间中的“此时此刻”与“彼时彼刻”的问题。应该看到,在近代全球化语境中,报刊走出孤立闭塞区域空间往往涉及商品与资本的开拓。相形之下,报刊为核心的传媒往往成为西方列强开拓疆土及攫取殖民利润的重要工具。

与上述对应的是,在学习西方及“达新知”语境下,近代中国的报刊作为新传媒如何呈现商贸资讯并展示西方列强全球范围内的商战?如《香港船头货价纸》作为中国第一份商业中文报纸,“船头货架纸”主要告知:货运船只什么时候开船,什么时候来,作为商人有无大米要运到船只,等等。这些资讯极重要,部分信息涉及商船给相关散客包装箱或吨位等。“货价纸”主要的目的和聚焦就是价位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商品市场及其交易网络,或者是这个市场和另一个有一定距离空间的市场某些商品有价格差。货价纸提供商业资讯,诸如香港船只的货价纸,往往提供香港、伦敦、上海等地大米、皮鞋等价格信息。英法殖民者视域下所谓商品甚至还包含唐人(并蔑称“猪仔”),也就是一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可以将其客运到美洲等地。从非洲、亚洲把人运到美洲修铁路,劳动力是一种商品。《香港船头货价纸》有专门经济方面的新闻栏目报道。<sup>①</sup>栏目报道涉及鸦片贸易。掠夺性鸦片贸易涉及工业文明在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意义上的垄断利润的取舍。英国对华鸦片输出,涉及殖民意义上的商战。两次鸦片战争进程及其结局显示出在富

<sup>①</sup>王天根:《近代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语境解读——以第一份商业性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

强的道路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距,但又带有殖民性或掠夺性。总体而言,《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经济新闻背后涉及鸦片贸易。鸦片战争涉及工业文明。由此可见,《香港船头货价纸》有关商品的叙事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化贸易的政治修辞。商品和资本如何在经济竞争乃至市场空间中有所取舍?两次鸦片战争背后涉及英国殖民事业在远东乃至全球扩张。研究《香港船头货价纸》经济新闻,可以看出商品乃至资本代表的工业文明的资讯在地理空间上的展开。与此同时,工业文明所推销的洋布洋油,往往代表新的生活方式变动的可能性。这种在华变动可能性在《香港船头货价纸》上有所呈现。面对工业文明代表性的国家迅速崛起但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打量东亚文明、儒家文明,《香港船头货价纸》这类报纸究竟是采取乐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呈现悲观主义的情景?报纸杂志背后有很明显的议程和价值立场及政治取向。

为什么要从《香港船头货价纸》揭示的政治—经济关联这一层面分析?报纸具有工具性。它可以传播商业资讯,同时也可传播文人情趣,尤其是和政党结合起来助力意识形态。由此反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的历史场景中,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具体而言,国家多以政府为代表,它和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近代无政府主义乃至乌托邦思想而言,有没有想过这个社会是由政府施政或治理这样一些场景组成?如果哪一天没有政府运转,又会如何?所以存在这样预见,涉及政治解读及学理阐释框架,特别是近代中国面临改良或革命,学理解读框架涉及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理论。时过境迁,一些学理黯然失色,但仍有学术史意义。应该说,无政府主义是近代重要的思潮。对于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军队而言,它是一种悲观主义色彩的表现,即对政府的彻底失望的一种价值取向。否则,怎么会有无政府主义?同样,报刊与政治思潮乃至政党关系极其复杂。总体看来,近代中国缘于政论性报刊具有强烈的建构意识形态的趋向,这涉及政统正当性的建立、合法性的建构,所以,近代政党大都有自己的党报、党刊。这些党报、党刊和政府被某个或某些政党主导或反向意义上控制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政党这时候不再视报刊为商品和资本,而是纯粹地作为一种工具,筹办往往不计成本。相比之下,过去是散发传单传播政治主张,直接或间接论证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报纸可以专门以广告方式卖商品,当然也可专门传播政治主张并设置立场,为政党预谋政治权力以及其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作舆论动员。近代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主张,从中国传统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就能找到它的脉络。比如说,老子和庄子有关篇章便涉及无政府主义。在政治道路选择的过程中,一些文化精英受这些思想乃至思潮影响,加上他们对依存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封建专制失望,对工业革命意义上西方列强标榜“科学、民主”但又打着自由贸易名义四处侵略扩张抱有恨意,在国内又受反动政府压迫等,所以创办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具体来讲,留法的学生及其部分舆论精英创办了《新世纪》,而留日的学生创办了《天义》等杂志。这些期刊杂志涉及无政府主义的一些立场。部分办刊者诸如有革命派姿态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为什么也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价值取向?<sup>①</sup>实际上,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所代表革命派部分精英要彻底颠覆满清政府,一度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很是失望,想回归消解政府的状态,所以辛亥革命有一阶段曾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等类似说法。这些主张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刊物及其国粹派刊物《国粹学报》及其思潮对政治变革的影响。

<sup>①</sup>王天根:《晚清域外报刊与无政府主义学理的媒介建构》,《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 三、救亡或启蒙:近代报刊的舆论场域抉择

追溯历史,可见近代中国的报刊不仅涉及思想启蒙,还涉及新生活的启蒙。因为“通中外”“达新知”是近代新媒体重要的功能,面对西学东渐的语境,往往会提供一些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指向市民,比如说《申报》面对的市井生活。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后期被誉为“史家办报”,涉及政治生活。作为服务市井性质的报刊,一旦和政治相结合,就有自己的姿态和立场,诸如《申报》立场转变等,这是要关注的。论及政党与报刊关系,尤其要关注资产阶级相关政治组织乃至政党所办报刊,比如研究《民报》历史。《民报》是宣传三民主义强有力的代表。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后也成为国民政府治国理政的指南。当然,面对政治变革的新陈代谢,三民主义也在不断的解释过程中,特别是在清政府被推翻及建立中华民国时期。如“驱除鞑虏”在面临清朝已不存在的新政治场景下,由推翻满清专制趋向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在这一进程中,报刊舆论等发挥了建构性作用,对照安德森思考“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形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sup>①</sup>,当有启发。由此而论,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过程中的重新解释。由此追溯历史,《民报》时期所倡导的重要政治主张实是孙中山乃至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涉及以颠覆性的框架解构皇权专制正当性。鉴于此,清政府势必要动员并照会日本当局查禁《民报》。《民报》舆论动员还涉及与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思想合拍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等战时的诸多政治修辞,因为这些笔杆子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思想论战,涉及获取政治革命合法性资源。为什么日本同意清政府要求并查禁《民报》?这就涉及世界意义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策略,特别是日本,可以查办《民报》,也可以不查办《民报》。在这种情况下,查禁《民报》反映了对华外交策略的一种变动。但对于孙中山及其政治活动,日本方面又予以资助。可见,其时日本对华呈现又打又拉多种策略上建立的一些外交关系。具体而言,《民报》尤能反映一些历史场景。<sup>②</sup>

救亡或启蒙涉及所谓新闻史场域中的“问题与主义”论争,涉及胡适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亦涉及李大钊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分歧一开始表现为思想交锋,实际上是以“问题与主义”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北京大学以胡适等为代表的部分教授持自由主义立场,以西方自由主义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改革,主张改良,以试验主义的姿态进行变革,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一个个的解决,无关政治革命;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李大钊等认为中国宜学习苏俄,并且和国情结合,彻底变革须从民众动员开始,重建社会结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动的学理阐释及与工业革命涉及工农阶层等学理参照。这一场论战在北大及《晨报》上都有所呈现,在《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也有所展示,而且在以媒介为核心的南北舆论的呼应中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动员的核心地带,就像磁场一样,形成了舆论场域,而且这些舆论场域往往通过私人书信勾连,主要议题辩论又在报刊杂志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

讨论近代媒介延续的政治立场须置于媒介场域乃至舆论场域,背后涉及自由主义的主张、社会

<sup>①</sup>[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sup>②</sup>王天根:《〈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的媒介镜像》,《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主义的主张,涉及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及舆论动员。与此对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文化中心与海派文化中心亦相联络并有人际上的勾连。所以,有必要在重地理空间乃至思想领域爬梳政治脉络,从而分析舆论精英表达的交融互释。近代“报”与“刊”颇有分殊。《大公报》和《独立评论》,当时即有所谓职业主义担当,办刊经费相对独立。如《独立评论》,其办刊经费从筹办者胡适、蒋廷黻等在高校任教工资中抽取。而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三驾马车”经营,吴鼎昌独立出资5万块钱,胡张出劳力,他们秉承原创办人英敛之倡导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即“大”“公”办报理念,主张“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具体来讲,这样一份报刊,至少表面上它要消除创办资金的政治背景。就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而言,《独立评论》《大公报》反映了“学人办刊”及“报人报国”的理念,且一度努力去除党派意图,体现学人论政。全面抗战前夕,《独立评论》学人论政的焦点涉及国家制度是采取民主还是开明专制意义上的独裁。民主派有胡适为代表,支持开明专制论的有蒋廷黻。实际上,胡、蒋都从美国接受了自由主义,而在《独立评论》上有不同政治价值取向,背后涉及现实的政治派系或军政利益集团。所谓民主派,是以汪精卫为首作为支撑;所谓独裁派,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问题是,汪精卫和蒋介石有时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甚至涉及中原大战,兵戎相见,而后汪蒋又通电合作。一旦合作,胡、蒋等如何处理《独立评论》所谓民主或独裁论争?本来是各为其主,面对汪、蒋合作如何处理?即使现实政治上汪、蒋双方合作,但还涉及理想主义及其学理支撑。诸如此类,《独立评论》都有精彩展示。

总的来说,著名品牌的媒介声誉到了一定的层次,是聚焦和引领社会,还是聚焦导向国家,抉择式偏向非常重要。因为它类似黑夜的探照灯,照到哪里就是光明,没照到的地方一片漆黑。所以,在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下,媒介自身的运转涉及品牌和标准化等。更多的广告商看中了媒介品牌,会支付更多的钱。媒介获益多少,主要取决于品牌的高下,不完全是由于资讯内容,而是由于资讯内容的价值取向及其背后的动机和追求,等等。由此而论,谈论近代历史语境中的《大公报》,其内容如何当与时俱进,而时论风格等背后形成的品牌,特别是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的价值追求,尤其值得深思。所以,在研究新闻纸时,如果能够从这些层面去思考、感知,当有更新锐的眼光,而不是把报纸和杂志简单看作内容的展示。在救亡图存情境中,标榜“不党”的《大公报》怎么面对政治事件,议题和细节如何呈现?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大公报》怎么发声?这种发声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大公报》区别于政党意义上的政治家办报,实际上是日本问题专家的专家办报、经济学家办报。在抗战语境中,为什么其他的报纸没有《大公报》特色鲜明,即使知名度很高也不能与《大公报》相比?这主要是因为《大公报》编辑部有很多有关日本问题的专家把关细节性的呈现乃至救国舆论的导向,所以能准确预测抗战形势,而其他报刊则做不到或难以相比。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会参考《大公报》。所以,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放在重要阅读位置的,往往是《大公报》,而不局限于政党的报纸。这和专家办报有密切关联。

在救亡与启蒙语境下,近代中国媒介品牌涉及学人论政,议题涉及国家、社会及其关系重构。近代沿海发达的城市呈现新的社会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如上海《申报》新闻报道乃至时评涉及市井社会新动向。而国家变动涉及国体、政体,涉及省、市、县之类的行政区划等,与 nation、state 对应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崛起。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论述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所说:“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

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sup>①</sup>同民族乃至民族主义一样,近代国家乃至国家主义,亦是抽象化且具有高度的建构性与实体性的名词,涉及代表性;寻求“富强”意义上的近代中国,涉及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中,媒介是改造国家,还是适应社会?是改造社会,还是适应国家?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政党多是以取得政权为目标,传媒发挥了组织性和战斗性。

#### 四、“通中外”与近代报刊“达新知”的求索

就学习西方意义上的“达新知”而言,媒介作为载体涉及其对各种“新”知的分类。这种分类涉及新知和旧识在舆论平台上的新陈代谢。面对经、史、子、集转向近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史哲,媒介本身作为容器承载着流动的概念、文本和知识框架。面对西学东渐语境下的知识框架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启蒙思想家严复总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丛林法则,即所谓生存斗争学说。他还赞赏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论移植于社会进化,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视作西方政体背后的道统。这种社会重构到国家重建,涉及媒介的“通中外,达新知”的整合。近代中国由此进入新的知识分类,并且和政体意义上的新陈代谢结合起来。对近代国人而言,所谓“达新知”涉及丛林法则指向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理论,这一切包含“西方学术中国化”及其学理论证。诸如严复所谓进化论与三民主义的辩手胡汉民、吴稚晖之间论辩,论辩场域在报刊上进行。探析这些,涉及穿梭性回顾历史,甚至回溯媒介场域。

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近代报刊所谓“通中外”,涉及西学东渐意义上的沟通,涉及国内与国外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凡此,“通中外”涉及“达新知”乃至“开民智”,由此而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往往涉及报刊与舆论支撑的关系,舆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等等。中国地理空间南北往往显著不同,媒介学意义上的舆论空间亦往往呈现地理特色。维新运动时期,以京津报刊为中心的北方舆论尤以《国闻报》的“通中外”为旨趣,以上海报刊为中心的南方舆论尤以《时务报》的“识时务”为倡导,南北联合,建立新的政治舆论的合法性。近代报刊在整合地域观念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如近代《天演论》涉及合群的思想,以此为学理参照,涉及报人利用报刊等对地域空间想象与整合。诸如有清一代,“安徽”得名涉及军事重镇安庆与文化重镇徽州。安徽在地理空间上皖南与皖北人的生活习俗有着巨大的差异。各自的报刊一度相互攻讦,后形成皖南与皖北两个行政中心。而从整体意义上说,《安徽俗话报》乃至《安徽白话报》对消除南北差异并进行地域空间人文精神上的整合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而论,传媒意义上合群与地域空间的整合、合群与地域形象整合等,关系密切。与新闻纸、报人乃至记者的合群思想有所关联的,诸如新闻纸、报人或记者的政治派系意识乃至政党意识与新闻传播关系,记者的民族观念与新闻传播关系,等等。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及其舆论动员中,名记者群体在建构国民精神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报刊、舆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关系密切。此涉及多个层面,包含书写线索,也涉及写作方式。在书写方式上,既注重《新青年》等报刊时空的纵向历史追溯,同时注意场域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并从舆论勾连报刊及其文化场域的角度加以横向勾连意义分析。

近代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进化观乃至合群思想,涉及科学及人文精神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演绎。近代中国新文化语境下,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经济利益、政治抉择、文化取向值得历史溯源。近代中华民族自我身份认同与国人向传统乃至西方学习密切相关。特别自甲午

<sup>①</sup>[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战后《天演论》开启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让国人充分意识到合群思想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近代国家在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下只有“寻求富强”这一条路可走,剩下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一条路的政体。所有的思想、制度及其理念当放在这一尺度下衡量。救亡图存语境下近代社群思想在国民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名记者乃至新闻纸的合群思想既作新闻框架也是国家富强的标准。

西学东渐下传媒面对救亡图存,如何提供新知识、新框架?政体变革意义上新陈代谢如何对待旧知识、旧框架的式微或离场?诸如此类,亦为学理质疑乃至反诘的过程。近代政治转向,涉及封建道统被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取代,涉及结构的变动。国家的重建,涉及民主、独裁及“开明专制”。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蒋廷黻等在《独立评论》上发起重要议题涉及印刷资本主义制造共识或分歧,大体属政治功利主义。

总的来讲,近代媒介报刊相关议题乃至议程设置,涉及救亡图存历史语境及自身的定位:改造世界,顺应世界,或介于二者之间。报纸杂志定位思想启蒙,有可能改变读者世界观,或导致思维方式的变化。近代报刊有工具性,所以人们往往“烧钱”而不计成本。这又涉及学人论政和政治家办报。学人论政、政治家办报,反映政治生活的变动,也就意味着设计未来的政治样态的可能性。这些都是近年学人研究题目并关联历史省思,希望后续研究有所推进。

## Media Brand and the Way of Modern Newspaper Exploration

Wang Tiang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Nowadays,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pays more attention on China and studying abroad,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content involving manufacturing consensus.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hich are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novativ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ew news production and even knowledge production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On the backdrop of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re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a brand itself. In the choice of saving the nation or enlightenment, the paper outlines the role of modern media brand in public sentiments, and reflect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ass media's 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changes and its success or fail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lassic media brand.

**Key words:** saving the nation;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media brand; new knowledge; prosperous and strong

责任编辑:张登德

#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概念、功能及其改进策略\*

马合成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影响因子是在引文分析的实践中产生的期刊评价创新成果,目前已成为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但是,其概念所涉及因素的模糊性与可变性决定了影响因子并非完美无缺。尽管相关指标的研制填补了一些不足与缺陷,影响因子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价方面的影响力已有超出其特定功能之嫌,需要科学地界定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地位 and 权重。

**关键词:**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指标;评价体系;改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118-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4

2020年2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科发监[2020]37号)、《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的通知,对建立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提出了指导意见。作为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诸多指标中的核心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影响因子尚有诸多不足与缺陷。因此,回顾影响因子概念的提出,分析其特征、功能,剖析影响因子的不足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对于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以及学术期刊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参考意义。

## 一、“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概念的再厘定

影响因子是当今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评价指标。时至今日,人们对影响因子的起源和发展持有不同观点。从影响因子定义所涉及的引文元素来看,其概念的产生可追溯至12世纪的引文索引Mafteah ha-Derashot<sup>①</sup>,现代意义上的引文索引可追溯到1860年Labatt's Table of Cases以及1872年的Wait's Table of Cases。<sup>②</sup>1872年,Gross夫妇以期刊的被引用数量来对期刊的学术档次进行排序,以此为学校、科研机构及图书馆等部门筛选、订阅、保存期刊提供参考依据。<sup>③</sup>这种以

\* 收稿日期:2020-04-16

作者简介:马合成(1963—),男,山东莱西人,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编审。

①Weinberg B H, "Predecessors of Scientific Indexing Structures in the Domain of Religion",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nd Herita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2004, pp.126-134.

②Shapiro F R, "Origins of Bibliometrics, Citation Indexing, and Citation Analysis: The Neglected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No.5, 1992, pp.337-339.

③Gross P L et al., "College Libraries and Chemical Educati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No. 1713, 1927, pp.385-389.

引文数量对期刊进行排队的方式是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方法的雏形,也是后来影响因子概念产生的实践基础。

### (一)影响因子概念的提出

关于影响因子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者认为影响因子产生于1955年<sup>①</sup>;从概念的提出以及使用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影响因子产生于1963年<sup>②</sup>;从概念规范定义及计算方法的系统形成来看,Marks等把1972年作为影响因子起源的时间<sup>③</sup>;从其作为正式的量化指标应用于期刊评价体系的时间节点来看,Mcveigh等<sup>④</sup>和Zietman<sup>⑤</sup>则认为影响因子起源于1975年。影响因子概念产生的主要贡献者是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他通过对期刊文献的引文进行大规模统计分析,得出了“大量被引用文献集中在少数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献又高度分散在大量期刊中”的结论。这被认为是国外期刊定量评价理论的起源。1955年,加菲尔德在Science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影响因子”一词,在文中至少2处明确使用“impact factor”<sup>⑥</sup>。但当时影响因子主要停留在以“引文”为元素的概念层面,其定义和计算方法尚无明确规范,甚至没有明确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期刊还是评价文献。之后,加菲尔德一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影响因子的实际应用,并于1956年推出一款信息产品Current Contents,并相继开发出《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3个数据库。在1963年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1961年度科学引文索引》中,加菲尔德正式提出并使用了影响因子概念。1972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的定义及计算方法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上发表。之后,在规范了影响因子的定义及其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自1975年开始,ISI依托“科学引文索引”数据,每年发布上一年度世界范围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可以说,影响因子的诞生是应用催生创新、创新服务实际的范例,其严格定义的概念产生于1972年,规范地使用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期刊始于1975年。

### (二)影响因子的基本涵义和特征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基本涵义是:期刊登载文献的篇均被引用的次数。根据普赖斯的“引文峰值”理论,加菲尔德选用两年作为期刊被评价文献的“时间窗口”,对影响因子的概念和计算公式作出了规范的定义。影响因子是指期刊前两年登载的文献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登载的可被引文献的总篇数。其计算公式表述为:

$$\text{影响因子} = \frac{\text{期刊前2年登载的文献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text{该期刊前2年登载的可被引文献的总篇数}}$$

由定义可以看出,影响因子的本质特征是以平均引文量来反映期刊2年登载文献的平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从其概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来看,影响因子的基本功能是对期刊2年登载文

①Mutz R et al.,“Skewed Citation Distributions and Bias Factors:Solutions to Two Core Problems with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Journal of Informetrics*,No.2,2012,pp.169-176.

②Grzybowski A,“Impact Factor—Benefits and Limitations”,*Acta Ophthalmologica*,No.3,2015,pp.201-202.

③Marks M S et al.,“Misuse of Journal Impact Factors in Scientific Assessment”,*Traffic*,No.6,2013,p.611.

④Mcveigh M E et al.,“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Denominator: Defining Citable(Counted) Items”,*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No.10,2009,p.1107.

⑤Zietman A L,“Too Much Impact?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the ‘Impact Fact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ics*,No.2,2014,pp.246-254.

⑥Garfield E,“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Science*,No.3159,1955,p.108.

献的平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提供一个相对量化的参数。

影响因子提出的初衷是为期刊定量评价制定一个基于引文分析的量化指标,其概念的涵义与其数值的计算方式显现了以下基本特征:其一,影响因子定义所涉及的元素是期刊文献、期刊文献量、期刊文献被引量和时间窗口。期刊文献是指被评价期刊登载的文献,期刊文献量是指期刊在统计当年前2年登载的可被引文献总篇数,期刊文献被引量是指期刊在统计当年前2年登载的文献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而时间窗口元素分为期刊文献量的统计时间窗口和期刊文献被引用的统计时间窗口,前者就是统计当年的前2年,后者则是统计当年。其二,影响因子是关于特定时间内期刊文献量和期刊文献被引量的计算数值,这个数值不是绝对的存量,而是相对的统计量。其三,影响因子的计算值与期刊的文献量是负相关的,与期刊文献的被引量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期刊的文献量如果增大,影响因子就会相应减少;期刊的文献量如果减少,影响因子就会相应增大。与此相反,期刊文献的被引量如果增大,影响因子就会相应增大;期刊文献的被引量如果减少,影响因子就会相应减少。其四,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是指期刊登载的可被引文献的数量。可被引文献一般指论文和综述<sup>①</sup>,其他许多类型的文献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但是,非可被引文献依然有可能被引用,而且其被引用的次数在文献被引量统计范围之内。其五,影响因子中“文献被引次数”的统计是受统计范围限定的,不同的统计源可以统计出不同的“文献被引次数”,因此,影响因子随统计源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其统计源越大,影响因子值越大。而期刊登载的文献篇数则不受统计范围的影响,是一个绝对量。

由影响因子的特征可以看出,可被引文献的确定、文献被引用的统计范围、文献被引用质量的界定,以及文献被引用时间窗口的选择,是关系到影响因子计算值的直接因素。这些因素的确定,决定着影响因子对于期刊评价所显现的合理程度。可被引文献一般是指论文和综述,学术期刊登载的文献几乎都是可被引文献,因此,这一因素对于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影响不大,目前许多评价体系对影响因子的定义中直接将“可被引文献”和“非可被引文献”的词语省略。文献被引用的统计范围一般称为统计源。目前,统计源大致指根据某一特定标准划定的期刊学术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集等,但每个评价体系又各有根据特定数据库而确定的相应统计源。如ISI的JCR、中国的CSSCI等都是在其收录的期刊范围内统计文献被引用的次数。《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的核心影响因子、扩展影响因子,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的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等,都是根据不同的统计范围而得出的不同名称的影响因子。因此,不同的统计源可以得出不同的被引量。

作为期刊评价的量化指标,影响因子的有效性受到了时间的限定。每个统计当年的影响因子只能反映期刊在统计当年前2年左右一个特定时期的质量和影响力,并不能代表期刊整个办刊历史的水平。因此,大多数期刊评价体系对基于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刊源会每隔二三年作出相应的调整。影响因子体现的不是期刊文献的数量,而是体现文献的质量和影响力;影响因子体现的也不是期刊某一篇文献的质量和影响力,而是体现特定时期内期刊所有文献的平均质量和影响力。

## 二、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功能、缺陷和不足

引文分析是期刊评价的传统方法,影响因子正是基于引文分析理论而创新的量化指标。因此,它在期刊定量评价中发挥了特有的评价功能。但同时应该看到,它在许多方面也存在一些不

<sup>①</sup>孟君、刘雪立、魏雅慧:《期刊影响因子重要时间节点的考证》,《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年第5期。

足和缺陷,有待更好的改进和完善。

### (一)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功能

#### 1. 影响因子为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量化指标

学术期刊的主要组成元素是其登载的文献,期刊文献的质量和影响力基本反映了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自1955年将引频次作为学术论文影响力大小的指标以来,被引频次至今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学术论文价值的指标。Egghe和Rousseau在其专著中提出:引用是代表一篇文献的重要性、质量和影响力的有效指标。<sup>①</sup>因此,“期刊文献被引程度”的量化评价便构成了期刊量化评价的主要内容。影响因子体现了期刊登载文献的平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是一个相对的量化指标,它被认为是最合理、最有说服力的学术期刊量化指标。

#### 2. 影响因子为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目前,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采用和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到的学术期刊量化指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体现期刊组成基本元素档次的指标;另一类是反映期刊自身传播能力的指标;再一类就是基于“期刊登载的文献被引程度”的指标。无论是哪一类指标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影响因子概念的思想。比如,基金论文比是指期刊中各类重要的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互引指数是指期刊的被引集中度与期刊所属学科的平均被引集中度之比,等等。可以说,有些定量指标直接是由影响因子扩展而成,如5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他引率、期刊百分位等级指标、核心影响因子,等等。

#### 3. 影响因子推动了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机构与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影响因子概念的提出使得期刊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得以形成,以定量评价为主导的学术期刊评价机构与体系也相应产生。如美国ISI旗下的SCI、SSCI、JCR,美国工程信息中心编辑出版的EI,以及我国的CSSCI、CSCD、“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武大版)”(RCCSE),等等。尽管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大多是基于影响因子的概念而制定形成。SCI的副产品JCR直接按影响因子的大小将各类期刊划分为四个区,尽管JCR近年来增加了5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等指标,但这些指标也都是对影响因子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影响因子为期刊的筛选分类提供了较好的量化依据,我国的多数评价体系也明确地将影响因子看作一个最重要的参数。

由其特征可以看出,影响因子只能作为期刊评价的一个参数,并不具备完全反映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功能。即便通过考虑相关因素影响而改进的影响因子,也只是从引文分析的角度而得出的一个维度的测度值,因此,影响因子并不具备单独评价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功能。而且,影响因子的特征也决定了它不具备评价期刊单篇文献的功能。

### (二)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局限性

尽管影响因子被认为是目前期刊定量评价较为公正的指标,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因子概念的形成与计算方式的确定并非由推理而严格证明的不变法则,而是按规定的统计计算方式获得的反映期刊文献被引程度的数值,其有效性受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定和影响。然而,影响因子并没有对时间窗口选择的变化规律进行严格的论证,对文献被引用的质量也没有作出分类予以区别对待,更没有对不同学科类型文献的传播特性作出精确的分析。同时,影响因子对数据的统计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范标准,对其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权重也没有作出

<sup>①</sup>Egghe L, Rousseau,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Library”,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0.

科学的分析和界定。

### 1.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概念本身的局限性

第一,影响因子没有考虑“时间窗口”选择的动态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以“引文峰值理论”为主要依据的时间窗口选择,必须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为此, $n$ 年影响因子( $n=1,2,3,\dots$ )概念便自然产生。 $n$ 年影响因子选择了 $n$ 年作为时间窗口,考虑了期刊前 $n$ 年登载的文献在统计当年被关注的程度。传统意义上的影响因子实际上就是 $n=2$ 时的2年影响因子。期刊评价的实践证明,随着出版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提高,学术期刊的被引高峰期也在相应地有所变化,另外,不同学科类别期刊的被引高峰期也各有差别。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5年影响因子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期刊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sup>①</sup>同时,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同学科类别的期刊评价中应根据学科引文峰值特征在2—5年中选择相应的 $n$ 值作为 $n$ 年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另一个时间窗口是“期刊文献被引用次数统计的时间窗口”。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区域作为期刊文献被引用次数统计的窗口,影响因子并没有对此作出严格的论证和分析。实际上,随着期刊出版周期的缩短和数字化传播技术的提高,大量的文献在发表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便被广泛引用。按照影响因子时间窗口的选择,期刊前 $n$ 年登载的文献在前 $n$ 年的被引用次数不在统计范围之内,这对文献被引速率高的期刊有失公允。对此,加菲尔德于1998年提出了累积影响因子指标概念。<sup>②</sup>累积影响因子的涵义是期刊前 $n$ 年登载的所有文献自发表之日起累积到统计当年底被引总量除以该期刊前 $n$ 年登载的可被引文献总篇数。虽然这一指标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纠正JCR中2年影响因子引证时间窗口过短这一缺陷,但累积影响因子与 $n$ 年影响因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n$ 年影响因子考虑的是期刊前 $n$ 年登载的文献在“统计当年”这一年的被引总量,而 $n$ 年累积影响因子则兼顾了期刊前 $n$ 年登载的全部文献“自发表之日起至统计当年”所有年份的被引总量,因此,累积影响因子与传统的影响因子的计算方式也完全不同。有关实证分析认为,3年累积影响因子和4年累积影响因子是较好的期刊评价指标。<sup>③</sup>

关于影响因子所涉及的时间因素,俞立平于2015年提出了历史影响因子指标,其概念的涵义是指截至到统计年度,期刊的累积总被引频次除以期刊载文总量再除以期刊办刊年限。<sup>④</sup>指标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期刊评价中总被引频次不考虑办刊历史和载文量的缺陷。如果不考虑办刊年限,它实际上就是累积影响因子。因此也可以说,一种期刊的历史影响因子就是该期刊累积影响因子除以其办刊年限。俞立平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历史影响因子兼有影响因子和 $h$ 指数的优点,阐明了历史影响因子是一个反映期刊长期以来综合水平的较好评价指标。侯湘等于2013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影响因子概念,可用以展现期刊的历史影响力。<sup>⑤</sup>如果不考虑期刊创刊年因素,那么,生命周期影响因子与 $n$ 年影响因子意义雷同。

第二,影响因子没有考虑文献引用的质量。影响因子的基本功能是对期刊的平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提供一个测评参数,这个参数值的计算涉及的主要元素是期刊文献的被引用次数。但是,不同质量的引用反映的期刊受重视程度肯定不同,尤其是那些无关的、虚假的引用,丝毫不能体现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而那些重要的引用比一般的引用更能体现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因

①盛丽娜:《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期刊影响因子的最适引证——时间窗口分析》,《情报杂志》2015年第11期。

②Garfield E, "Long-term vs. Short-term Impact: Part II", *Scientist*, No. 14, 1998, pp. 12-13.

③刘雪立:《期刊累积影响因子与年度影响因子的比较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年第7期。

④俞立平:《历史影响因子:一个新的学术期刊存量评价指标》,《图书情报工作》2015年第1期。

⑤侯湘、吕建斌:《加权生命周期影响因子对期刊评价的影响》,《情报学报》2013年第9期。

此,不考虑引用质量而单纯地计算文献被引用次数,对于影响因子值的准确性是一大欠缺。近年来,文献引用质量问题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美国华盛顿大学 Carl Bergstrom 于 2007 年提出了一个特征因子指标,该指标创新性地将“引文质量”纳入测评范围。<sup>①</sup> 特征因子的基本假设是:期刊越多地被高影响力的期刊所引用则其影响力也越高。特征因子的概念及算法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对其和传统的引文评价指标间的关系进行了多例实证研究,论证了特征因子对期刊影响力评价的可行性<sup>②</sup>,有关学者对特征因子的计量方法原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sup>③</sup> 基于引用质量的分析,李超等于 2012 年提出了“引用质量加权影响因子”概念,侯湘等<sup>④</sup>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加权影响因子”的概念。2009 年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也启用了考虑不同引用之间重要性区别的“权威因子”指标。特征因子及其相关指标改进了影响因子对“引用次数”计量的不足,但是,这种单一层面的改进方法并不十分理想。其实,被引用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引用方式不单单地有他引与自引之分,文献被引用期刊的层次也不能简单地以核心和非核心为区别。以类似于 Google 评价网页重要性并不能完全代表文献被引用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文献被引质量的影响因素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引用文献的期刊档次;第二个层面是文献被引用的方式。引用期刊的档次和文献被引用方式的类型划分得越细,越能充分体现文献被引质量的差异。总之,只有全面地考虑引用质量的影响因素,才能较好地解决影响因子关于“引用次数”计量的缺陷。

第三,影响因子没有考虑不同学科文献的传播特征。不同学科的文獻具有不同的引证特征。学科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学科类型期刊的半衰期和引文密度的差异。影响因子并没有对不同学科文献传播规律的差异作出相关的分析。对此,有关学者提出了学科影响因子<sup>⑤</sup>、标准化影响因子<sup>⑥</sup>等概念,以此来弥补影响因子对不同学科类型期刊评价的不足。但是,围绕学科影响因子的研究并没有提出按学科特点而分类的影响因子计算模式,尽管期刊评价体系对期刊评价按专业分类,但每一类的影响因子值的计算方式却是统一的。笔者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对不同专业类型的期刊赋予不同的影响因子计算方式。

第四,影响因子没有明确规范标准的统计范围。统计源也是关乎影响因子计算值的关键因素。对于同一种期刊,不同的统计源会统计出不同的被引次数,从而得到不同的影响因子计算值。影响因子概念没有对期刊文献被引用次数的统计范围作出统一的定性标准,因此,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值是随着统计源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区分不同统计源的影响因子,许多期刊评价体系在影响因子一词之前加以限定语,如核心影响因子、扩展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等。由于文献在统计源之外的被引用次数不能被用于其影响因子值的计算,所以,对于那些在特定统计源之外有大量高质量被引用的期刊,用影响因子来反映其影响力显然有失水准。笔者认为,按照学科专业分类,建立全球化、统一标准化的统计源,是规范影响因子计算值的有效措施。

## 2.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评价功能的局限性

影响因子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过度地夸大影响因子的功能,会引发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评价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

①刘艳华、华薇娜:《期刊评价新指标——特征因子》,《情报杂志》2010年第7期。

②窦曦骞、祁延莉:《特征因子与论文影响力指标初探》,《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6期。

③庄纪林:《特征因子算法与 SJR 算法的比较分析及实证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2期。

④侯湘、吕建斌:《加权生命周期影响因子对期刊评价的影响》,《情报学报》2013年第9期。

⑤党亚茹:《学科影响因子:我国各学科发展趋势评价》,《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4期。

⑥杜志波、汤先忻:《标准化影响因子在不同学科期刊比较中的应用》,《编辑学报》2007年第2期。

第一,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不能完全代表期刊的质量与影响力。众所周知,对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应该是多维度的测评,影响因子只是从“引用”这一个维度反映期刊文献受关注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主要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并不能完全体现文献的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所以,影响因子及其相关指标不能完全作为期刊分区排队的依据。和 SCI 的选刊标准相比,我国的 CSSCI、CSCD 以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等评价体系注重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结合,而且对影响因子的评价权重作出了适度的调整,其刊源的选出与确定相对来说较为客观、理性。但是,由于定性评价体制不健全,定量评价受到吹捧,无论是 SCI 还是国内的评价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夸大了影响因子的评价功能。合理地界定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权重,对于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不具备评价期刊单篇论文的功能。影响因子及其相关的定量评价指标,反映的是期刊文献受关注的情况,并不能对等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高被引文献更多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并不直接说明其创新贡献。同时,影响因子反映的是一定程度的期刊文献的平均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某一篇文章的实际水平。因此,以刊评文的方法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对学术论文以“SCI 论文”为标签的评价方式是科研和学术评价标准的一种错位,“SCI 至上”的现象更是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初心。甚至由于影响因子评价功能的过度夸大,引发了文献“滥引”和“假引”的不端行为。为了提高引用率,相关者甚至用造假的手段对文献进行无关引用,严重破坏了期刊评价的生态环境。值得肯定的是,国内的 CSSCI 来源期刊评价体系则规避了这种误区,强调量化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这对当前解决 SCI 期刊存在的问题应有借鉴意义。

### 三、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改进策略

从目前学术期刊评价的状况来看,定量评价占据了主导位置,而影响因子又被视为定量评价中权重极高的核心指标。但是,影响因子概念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其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改进影响因子概念本身的不足与缺陷,合理界定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权重,是关乎学术期刊评价科学性的重要课题。

#### (一)影响因子计算模型的改进策略

从期刊评价指标的组成来看,影响因子蕴含的评价理念是当今定量指标制定的理论基础,影响因子概念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期刊定量评价的科学性。近年来,大量的基于相关元素改进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指标概念,如累积影响因子、特征因子、权威因子、加权影响因子、历史影响因子、生命周期影响因子、自然影响因子<sup>①</sup>、论文计数影响因子<sup>②</sup>等。但是,指标体系的过度膨胀会造成评价测度过于重复、统计计算过于复杂的局面。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即年指标、特征因子、5 年影响因子等小数指标被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以弥补影响因子的不足,其他创新指标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层面。影响因子及其相关指标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如何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巧妙地将影响因子的相关指标融为一体,形成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综合指标,对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科学运转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在统计源的规范化方面,所有的评价体系均应建立全球化的引文数据库,界定标准统一

①俞立平、万晓云、据春华:《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过度自引的修正研究——自然影响因子》,《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1期。

②Markpin T, et al., "Article-Count Impact Factor of Materials Science Journals in SCI Database", *Scientometrics*, No.2, 2008, pp. 251-261.

的引文统计源。其二,在时间窗口的选择方面,可以采用累积影响因子的思想,考虑期刊在统计当年及其前  $M$  年登载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当年及其前  $N$  年的累积被引总次数 ( $M \geq N$ )。可以看出,传统的影响因子就是选择了  $M=2, N=0$ ; 5 年影响因子选择了  $M=5, N=0$ ; 即年指标选择了  $M=0, N=0$ 。其三,在文献被引用质量的界定方面,可以借鉴加权影响因子的思想,考虑将文献被引用的情况分为二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文献被引用方式;第二个侧面是引用文献的层次。文献被引用方式不同,反映的文献被利用效能也不同;文献被不同档次的引用者所引用,体现的文献受重视程度也不同。因此,合理的办法是对不同的引用方式和不同的引用档次赋予权值。假设某期刊在某一特定时段内登载的文献篇数为  $a$ ; 将  $a$  按引用方式分为  $m$  组:  $a_1, a_2, \dots, a_m, a_i$  对应的权值为  $\lambda_i (i=1, 2, \dots, m)$ , 那么, 该期刊基于引用方式的加权被引次数为  $\sum_{i=1}^m a_i \lambda_i$ 。同样, 将该期刊  $a$  篇文献中的任何文献的引用者层次分为  $n$  级, 每级的引用赋以权值  $\eta_j (j=1, 2, \dots, n)$ , 将  $a$  按引用层次分为  $n$  组:  $a_1, a_2, \dots, a_n, a_j$  对应权值为  $\eta_j$ , 那么该期刊基于引用层次的加权次数为  $\sum_{j=1}^n a_j \eta_j$ 。如此, 该期刊的加权被引次数可以用  $(\sum_{i=1}^m a_i \lambda_i + \sum_{j=1}^n a_j \eta_j) / 2$  表示。可以看出, 由考虑了被引用方式和引用文献者档次的加权次数而形成的加权影响因子涵盖了“他引”“自引”“特征因子”“权威因子”等指标概论, “核心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等概念只是其意义下的特例。那些无关的、造假的引用可以直接赋以 0 权值予以剔除。其四, 在学科类别区分方面, 可以吸纳学科影响因子的概念, 对于不同学科类别的学术期刊选择不同的时间窗口, 赋予相应的被引次数权值。

综合以上改进思路, 可以建立一个称之为广义 ( $M, N$ ) 影响因子的计算模型, 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text{广义}(M, N)\text{影响因子} = \frac{(\sum_{i=1}^m a_i \lambda_i + \sum_{j=1}^n a_j \eta_j) / 2}{a}$$

其中,  $a$  是期刊在统计当年和前  $M$  年登载的文献总篇数,  $a_i$  是期刊在统计当年和前  $N$  年基于第  $i$  种引用方式的累积被引次数,  $\lambda_i$  是第  $i$  种引用方式的权值,  $\sum_{i=1}^m a_i \lambda_i$  即是  $a$  篇文献在统计当年和前  $N$  年基本于引用方式加权的总累积被引次数。同样,  $\sum_{j=1}^n a_j \eta_j$  是  $a$  篇文献在统计当年和前  $N$  年基于引用者档次加权的总累积被引次数。该计算模型几乎兼顾了影响因子所有不足与缺陷之影响因素。因此, 关于影响因子的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基于该策略的计算模型的建立。因此, “时间窗口”  $M, N$  的选择、被引用方式种类  $m$  和引用者档次级数  $n$  的划分, 以及对各种被引用方式和引用者档次的权值赋予, 是值得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课题。

## (二) 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中评价权重的改进策略

当前影响因子的使用严重超出了其特有功能的范围。影响因子被赋予期刊评价权重的失衡, 导致科学评价机制产生了“SCI 崇拜”的扭曲现象, 出现了以刊评文的错误观念, 滋长了文献滥引等不端行为。针对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 SCI 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 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准确理解 SCI 论文及相关指标, 深刻认识“SCI 至上”的影响, 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 完善学术同行评价。这是从政策层面纠正影响因子及其相关指标在学术期刊评价中权重失衡现象的有力措施。从技术层面来说, 应该在改进影响因子概念本身不足与缺陷的基础上, 合理界定影响因子的评价权重。

从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本质来看,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不宜以定量指标作为主要测评依据,“这种‘量’的分析还要和‘质’的把握相结合”<sup>①</sup>。因此,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仍然是建立科学评价机制的基础。如果定量评价占综合评价50%权重的话,那么,作为定量评价体系中的一个较好的参数,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权重不宜超过30%。当然,准确地确立其“权重值”,还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界定。总之,既要合理发挥影响因子的评价效能,又不要过度夸大影响因子的功能。

### 结语

作为引文分析理论的影响因子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影响因子为学术期刊评价贡献了一个较好的量化指标。但是,由于概念本身的不足与缺陷,影响因子对于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尚存短板,同时,过度地夸大影响因子的评价功能,势必引发学术评价不良效应的产生。因此,改进和优化影响因子的计算模式与应用策略,合理评估影响因子在学术期刊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对破解当下唯SCI来源期刊马首是瞻的困局,尤为重要和迫切。总的来说,影响因子以及SCI来源期刊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客观的局限性,我们只有在规避其局限性的基础上,从中国学术实际出发,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而不是一味盲从西方学术评价体系,才能回归学术评价的本体,真正建立中国特色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 Study on the Concept, Func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Academic Journals

Ma Hech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impact factors are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periodical evaluation produced in the practice of citation analysis and at present, have becom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cademic journals. However, the ambiguity and variability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concept definitely cause imperfection of the impact factors.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mpact factor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exes has remedied some deficiencies.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is suspec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act factors in academic evaluation is beyond its specific function. There is a need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status and weight of the impact factors in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 impact factor; evaluatio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strategy

责任编辑:李宗刚

<sup>①</sup>孙昕光、李宗刚:《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7期。

# 当前高校美育工作的瓶颈及其问题辨析<sup>\*①</sup>

杨 杰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北京,100024)

**摘要:** 近年高校美育工作逐步得到教育界和社会的重视,美育理论研究与美育教学实践的探索都在不断逐步深化,值得予以肯定。同时,当前高校美育工作中存在的“名高位低”的客观情况不容乐观,其根源在于美育理念的偏差和美育实践环节的薄弱。高校美育工作依然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突出表现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一是“何谓美育”,二是“美育何为”。前者是对高校美育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阐释的偏差,诸如认为美育就是艺术教育的观点——学校只要开设绘画、舞蹈、歌唱等艺术门类课程就是完成美育,美育就是“人文素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教育,甚至出现对美育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研究边缘化倾向;后者是指高校美育存在形态问题,即美育与高校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厚专业教育而薄美育的状况。美育观念的偏差最终导致高校美育实践层面落实机制的不到位。因此,澄清当前美育理念的误区,突破美育工作薄弱的困境,强化美育实践落实机制的建设,就成为推进高校美育工作的必然路径。

**关键词:** 高校美育;审美教育;人文素养;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127-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5

当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sup>②</sup>的重任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历史现实对人才教育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国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同时,美育再次被确定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美育在培养和谐、健全的人格中所不可忽视的独特功效。2019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不仅重申美育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性,更为令人鼓舞的是进一步强化高校美育的落实机制建设,彰显了美育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作用,凸显了高校美育工作落实的紧迫性。

纵观美育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教育方针中即写入美育,之后又数次提及美育。美育在中国虽因社会历史原因而历经波折,但总体上说还是螺旋上升,逐步得以推进和深化。尤其是中国社会迈入新时代,伴随教育界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如火如荼展开,包括美育工作在内的教育战线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已有的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客观而冷静地审视、反思美育工作在高校教育中的实际情况——时至今日依然有着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

\* 收稿日期:2020-01-10

作者简介:杨杰(1966—),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19LLWX009)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资金资助“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项目”(CUC190M01005)的阶段性成果。

②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的方面,譬如在高等教育中处于名高位低、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这既包括尚需深化的理论层面的研究——诸如科学认识与准确界定美育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也包括亟待健全与强化的美育实践层面的落实机制的探讨。因此,澄清错误认识、走出各种观念误区是当前高校美育工作真正得以有效落实、推进的逻辑前提。

—

回顾美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拉开现代中国审美教育的大幕,引领了中国教育界的美育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伴随中国社会的起伏跌宕,虽经历次磨砺,美育工作还是逐渐得到教育界和社会的认可、重视。伴随新时期伟大历史篇章的开启,教育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展开,各行各业逐渐步入正轨;至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的到来,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可谓“异军突起”,显现出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作用。纵观近年高校美育研究,无论是对系列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颁布,还是对高校美育理论与美育实践的学理性探讨,以及对高校美育实施的具体方式、路径和措施等实践层面的探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关于教育方针政策层面的研究,揭示出对美育工作日趋重视的发展态势。毫无疑问,教育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指航灯,有关高校美育的纲领性、指导性教育方针的正确解读与准确执行是美育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已有的对高校美育教育方针嬗变历程的梳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我们理清教育理念的变迁,还可以进一步揭示美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以及表象下深层次的美育观念的不断深化的逻辑轨迹。王晓宁的《美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发展与演变》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期间我国美育方针嬗变的历史脉络,客观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砥砺前行的线路图。他将这一美育发展历程分作“提出与形成”“曲折与徘徊”“恢复与发展”三个阶段,从中折射出人们对美育认识逐步深化的演进态势。<sup>①</sup>当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美育的社会价值与作用日渐突出。在这渐变历程中,先后颁布的几个重要纲领性文件是美育嬗变脉络的关键性标志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得到学界关注。1999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sup>②</sup>;2006年又推出《全国普通高校改革艺术课程指导方案》,2010年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之后,2015年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提出:到2020年初步形成“大中小幼美育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sup>③</sup>。王登峰在《让高校美育“曲高而和众”》一文中指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①王晓宁:《美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发展与演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报》1999年6月17日。

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2015年9月2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28/content_10196.htm)。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重点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性特征,认为美育是对我国传统“乐教”所蕴含的丰富的美育思想的传承,事关整个社会和民族“文脉”的延续。<sup>①</sup>有学者认为,201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确立的新时代“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战略目标在教育领域的积极回应和落实之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②</sup>可见,以“美好生活”为核心范畴的对“美”的向往与追求,成为十九大报告的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亮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所不曾有过的,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为此目标而奋斗的坚定不移的决心。<sup>③</sup>在此历史语境下,“美的教育”——美育——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新时代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美育被纳入中国教育方针框架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选择。纵观新时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的变迁,系列关于强化与落实各级学校美育工作文件的推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美育工作的重视,以及美育在培养与塑造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美育观念正在教育界和社会上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肯定。

其次,高校美育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基本规律问题也是近年美育理论探讨的热点问题。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育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美育的价值和作用的探讨;二是关于艺术教育的论述。就第一个方面讲,有的研究立足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有关美育的功能、性质和价值、意义论述的引用、阐释的层面,也有对美育在中国的诞生及以蔡元培等人的有关美育的论述的史料性梳理、回顾与评价;还有对美育研究成果的综述,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美育著作涵盖了艺术教育、智育美育、德育美育、体育美育等类别。就第二个方面讲,相当多的论文在行文过程中,直接将“艺术教育”与“美育(审美教育)”等同而予以概念置换,有的虽然以“美育”作标题,但通篇却只谈“艺术教育”而不讲“美育”,实际以“艺术教育”概念取代了“美育”;有的则以“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内容”为过渡句,然后也止步于艺术教育而不及其他;有的虽然意识到“美育不仅仅是艺术教育”,但这个“仅仅”之外,究竟还包括什么却是避而不谈、无从知晓。上述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美育”内涵和外延认识的模糊不清甚至错误。<sup>④</sup>

再次,有关高校美育实施的语境、路径、方式以及课程体系构建等高校美育教育实践层面的研究,是对新形势下高校美育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关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兴盛的新的历史语境,为社会文化和高校校园文化带来了全新的局面。高校美育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积极依托和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提升高校美育水平等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积极探索、踊跃建言的研究关注点。<sup>⑤</sup>

针对互联网语境下的高校美育现状、问题与对策等,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大力推动“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都在飞速发展,美育应该充分调动大学生对网络感知能力较强的优势,因此,要将高校美育工作与互联网技术有效结合,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探索推动高

①王登峰:《让高校美育“曲高而和众”》,《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7期。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③郭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高校美育工作探析》,《北京教育》2018年第3期。

④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彭吉象:《完善美育体系,加强素质教育》,《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周星:《2017年中国艺术教育热点问题概述》,《艺术评论》2018年第5期。

⑤金昕:《当代高校美育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邱地、谢朝晖:《高校美育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探讨》,《教育探索》2015年第6期;张跃民:《试论我国高校美育的弱化与强化》,《当代教育科学》2009年第9期;朱哲、任慧宇:《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瓶颈及其破解》,《人民论坛》2019年7月下。

校美育教学科学化的方法与路径。这是历史发展趋势。然而,现实的高校美育状况仍存在一些欠缺,亟待改进和完善。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大学生审美意识培养的缺位。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弱化了审美能力的提升,这突出反映于低级趣味的负面影响——某些貌似“新潮的”审美观可能造成大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扭曲;二是忽视“互联网+美育教学”融合的教育创新应用。当前高校美育教学活动方式陈旧、单一,致使教学过程缺乏趣味性、生动性和吸引力,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美育学习的热情;三是作为高校美育实施的重要载体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滞后以及与美育之间的脱节问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理念与投入力度还有待加强,这就制约了高校校园文化打造的立体化结构。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可以有效提升美育课堂教学的直观化、演示化、趣味化效果,为美育教学提供广阔的美育实践天地。当然,与上述对互联网负面作用的担忧、焦虑不同,有学者则持积极态度,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高校美育难得的发展契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改革与创新将应用于教育的改革,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的高校美育将迎来自身发展的春天”<sup>①</sup>。如此乐观结论形成的依据是,互联网契合当代大学生追求个性自由的特点,能够明显提升学生对美育接受的兴趣和热情。同时,高校美育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有效地将生动而丰富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影视、戏剧,以及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物馆、音乐厅、剧场等资源“为我所用”,融合线上与线下、课堂内与课堂外、校园内与校园外的平台,打破时间、空间限制,造就更加贴合美育教学自身特性的内容和方式。

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大众文化的蜂拥而至也是影响当下高校美育实施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兴盛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传播便捷性与广泛性特点不可割裂,需要辩证审视。<sup>②</sup> 大众文化之所以值得我们肯定,其合理性一面在于它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其中所包含的“过度娱乐化”的不良倾向也对高校美育工作提出了挑战,如何顺势利导地发挥大众文化的优势推动美育独特功能的实施,以防范、化解大众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学者们积极探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诸如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综艺、网络剧、网络综艺、游戏、广告、时装等样态大众文化的蔓延、渗透与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各个角落,对当代大学生构成“饱和式轰炸”的文化冲击波,不仅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更对其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潜移默化中施加着影响作用。从有益的角度讲,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逐渐加快的生活节奏,现代大学生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增强,而大众文化以其通俗、活泼、轻松、休闲以及形式的多元化和平易近人的特点舒缓日常生活节奏,放松身心,达到精神愉悦的目的,这些都吻合了大众社会心理的需求,同时,又以其强大的市场占有率演化为现代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打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对过去以启蒙为目标的社会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地位的颠覆和重构,由此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格局。我们在肯定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消解深度性、虚化历史感、走向图像化,呈现为过度娱乐化和狂欢化的特点,甚至出现低俗化、庸俗化——充斥暴力、色情等感官刺激,这种负面效应降低大学生的审美品位,继而逃避高雅艺术。因此,面对互联网时代和大众文化勃兴带来的负面影响问题,高校美育任重而道远。

①冯婷:《“互联网+”时代的高校美育实践研究》,《学术探索》2018年第9期。

②张卉:《当代高校美育工作现状探究及相关的几点看法》,《内蒙古教育》2019年第4期;陈丹:《新时期高等院校美育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5期;何骏:《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深化的维度与思考》,《大学教育》2019年第12期。

高校美育教学实践是不容忽视的环节,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自然也成为美育研究的重要问题。针对当下高校美育实施的现状进行剖析,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以期改进、完善,这也是积极推进高校美育工作切实落地的有效途径。客观说,近年来,高校对于美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在明显提升,但是在具体落实机制方面还存在不足。有学者将高校美育实践环节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美育实施内容科学性的缺失。美育内容仅仅局限于艺术教育狭小的范围内,严重造成美育内涵的单一化和美育功能的虚弱化;同时,也势必间接带来艺术教育教师承受过重的教学负担。二是高校美育师资匮乏与经费投入的不足。由于美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滞后,已有师资又仅仅局限于艺术教育学科,由此难免造成师资紧张。究其原因,不外乎受编制、资金的掣肘:与此相比较而言,高校的德育实施就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政策明文予以规定,无论是教师、辅导员等岗位人员设置,还是资金投入,都有切实可行的落实机制。可是,高校美育尽管在现行的国家教育方针层面上得到积极肯定,并且大力倡导美育的实施,但这种导向与高校美育的实际贯彻、落实的现实局面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缺少行之有效的措施。三是高校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的欠缺。这与师资不足、投入资金不到位的现状密切相关。美育基本被置于当下高校教学培养方案体系的通识教育类,而且是处于选修课程的模块之中,通常也未必列入规定的选修学分之一列,更不用说跻身于必修学分的框架之中。这就造成高校美育实际状况的“名高位低”的尴尬境遇——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装饰品”。

## 二

纵观近年来已有的美育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学理性层面的理论探讨,还是教育实践环节的落实推进,美育都较之前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要冷静而客观地正视当下高校美育工作所面临的困惑——依然还处于发展的瓶颈境地,这不仅表现在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误区,更反映到美育实际工作的严重边缘化局面。我们时常发现,在美育有关基本概念范畴、观念方面仍存在着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甚至包括教育权威部门发布的文件也时有概念模糊甚至混淆等现象发生,还有主张放弃对美育理论基本范畴的学理性探讨的观点。有的学者在逻辑上将美育与艺术教育等量观之,甚至互相置换。这实质是以艺术教育取代美育——这些观念偏差难免会进一步影响高校美育教学实践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一方面,对美育基本认识的谬误必然引发行动的盲目性和工作方向的偏差,最终导致背离美育实施的初衷。另一方面,存在较多制约当前高校美育实践环节发展的因素,其中,落实机制的不健全、不到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无论是理论探讨方面,还是具体教学的实施方面,美育工作都有待于我们积极改进。因此,高校美育工作若要突破现有瓶颈的束缚,步入健康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其前提必然是澄清认识、走出各种误区。

综上所述,当下高校美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表象复杂多样,但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何谓美育”;二是“美育何为”。当然,从内在逻辑关系讲,两者之间又是密切相连,共同构成完整的高校美育的结构。前者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地位,后者则是前者的延展。前者是美育学理探讨,后者是美育实践环节。若是第一个问题不能明晰,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无从谈及,即使勉强为之,也可能只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何谓美育”,在美育界似乎是一个不言自喻、不证自明的“公理”问题。然而,恰恰是这个最具逻辑起点的基础性与前提性的基本范畴,或者重复已有论述无创新,或者沿用错误观点而少纠偏。譬如,现有研究多围绕美育功能和社会价值展开,多是以席勒和蔡元培的阐述为逻辑依据,

认为美育的目的就是激发人们的活泼、敏锐的性灵,培养高尚纯洁的人格。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感情,但未必一定同时具备伟大而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举止,其原因或许就在于缺乏深厚的美好感情的动力,若要强化这一内在驱动力,必定依赖于“陶冶”,即以“美”的对象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即“美育”。至于美育内涵问题,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有观点认为,美育是艺术教育,将美育局限于艺术教育、艺术技能的范围和存在样式,认为学校开设绘画、舞蹈、歌唱等艺术门类课程就是完成审美教育;有观点认为,美育是素质教育,实施美育就是推行素质教育;还有观点认为美育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都明确将美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等等。这些观点都认识到美育具有的某方面的内涵和功能,揭示了美育不同方面的特征。但是,若将美育的局部内涵或某种特征视作美育的全部属性,难免以偏概全而产生诸多观念偏差,进而误导高校美育的贯彻实施。

因此,我们再次强调对“美育”范畴认识的科学性与定位的准确性问题,其重要意义在于,这不仅是美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更是诸如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目标等美育实施环节推进的依据与指导,“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和目标的手段或工具,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sup>①</sup>,这就如同发起一场军事战役,如果对这次作战的目的、目标都不明确,或者即使确定了目标,但目标制定得不够科学,甚至是不正确,恐怕也很难谈及胜利;更何况,若是行动目标不明确,怎么能制定战斗的下一步具体方案呢?遑论执行环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了。

“美育何为”的问题与前者“何谓美育”之问密切相关,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美育何为”即美育的功能问题,也就是说“美育是做什么用的”。在这个问题上,美育研究同样也存在着诸多误区:有观点认为,美育就是培养人的情感;有观点认为,美育是培养人的艺术修养;也有观点认为,美育就是培养人的审美情趣;有的观点将“美育理论课”“美育鉴赏课”与“美育实践课”割裂,甚至视作非此即彼的对立性存在;还有观点认为,美育是为德育和智育服务的,是从属于德育和智育的,是工具和附庸;等等,不一而论。概括地说,这些美育观念与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真理性”成分,都从一定角度或者某个层面上揭示了美育的功能和作用。然而,这些论断又具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因为这仅仅从单一的局部着眼审视美育,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教育大系统组成部分的子系统的教育,既有与教育大系统的功能和作用相吻合、相一致的基本功能,也有区别于教育其他子系统的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性和教育功能;同时,它又脱离了美育作为独立存在所具有的复合关系结构对其功能与作用的支撑和制约。因此,上述的不同观点虽各有正确性的方面,但都是难以全面而系统地阐释美育的内涵、功能和作用。

若是进一步探究到美育的具体实施环节,与“美育何为”逻辑紧密相连的则是“美育如何为”的命题。这里所说的“美育如何为”即是如何将美育的功能和作用予以实施、发挥出来的路径和方法,既包括美育课程在高校的存在形态——诸如美育课程自身的教学目标、教学目的、课程设置、实施的路径和方法,也涵盖美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美育在高校各个专业教育培养计划中的地位以及教学课程设置中如何体现、贯彻、执行和落实美育理念。具体说来,就是美育与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之间的辩证互补关系问题,即在高校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美育存在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明晰。其中,美育自身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直接决定了美育教学实践的 implementation 理念:“理论派”青睐于对美学、美育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

<sup>①</sup>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本命题的形而上的抽象理论的传授;“实践派”则更为偏好于对艺术实践活动的倡导。二者虽说各有正确性的一面,但是,这种或者排斥美育理论素养的提升,或者否定美育实践意义的观念与做法,在实质上同样显现出其片面性的局限——他们都将美育丰富的内涵狭窄化和单一化。对于后者——美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无论在教育理念方面还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将专业教育与美育割裂、甚至将二者对立的现象,厚专业教育而薄美育的状况更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至于美育的具体实施方式、路径问题,有学者认为,面对新世纪高标准的人才需求,应放眼于构建高校大美育体系——美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美育化,推动美育的协调创新,形成全社会更加支持美育发展和青年学生全面成长的氛围;有观点认为,高校美育实施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辅助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有学者提出“四位一体”的美育理念——家庭、学校、社会、个人构成的多元化立体结构;有人倡议加强美育与地方文化活动相联合;也有学者提出了高校校内专业的优化组合、校本课程的开发问题。这些学术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为我们进一步深化高校美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多停留于方向性的表层,与高校美育的真正切实有效的实施还存在差距,而且,有的观点是立足于对美育概念不太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可见,若是对美育的基本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不够正确、全面,那么,其具体实践过程必然是指导思想迷茫或混乱,美育最终指向的结局可能会南辕北辙,背离初衷应有的轨道。<sup>①</sup>

### 三

作为基本范畴的“美育”,对其进行学理界定和理论阐发的历程由来已久。自席勒的《审美书简》提出“审美教育”概念,到蔡元培高举“美育代宗教”大旗,关于美育的功能、价值、意义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也取得一定进展。但对“何谓美育”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随着奔流不息的时代潮流而与时俱进地提出各个时期不同的具体目标和前进方向,不断自我丰富,赋予新的内涵;另一方面,美育范畴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质的稳定性。因此,尽管时代在不断变迁,但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又是清晰和明确的,这将其自身与教育大家庭的其他教育门类、教育形式予以区分。那么,美育的基本规定性又是什么呢?

美育是“审美教育”的简称,质言之,就是关于“审美”的教育。因此,对这个概念厘定的核心则是“审美”。对于什么是“审美”及其基本特征、规律的界定和研究成为美育范畴厘定的逻辑前提。那么,再进一步讲,什么是“美”?其内涵界定成为解读“审美”的关键。然而,对范畴“美”的阐释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美”的问题成为“千古之谜”。尽管古希腊圣贤慨叹“美是难的”,但仍将“美”(本身)与“美的”(事物)加以区别,由此揭开了充满艰辛探索的形而上的“美”的问题的研究历程之帷幕。有的试图从客体角度揭示“美”的属性,有的则是从主体的维度研究“美”之心理机制,有的求助于“神灵”,认为“美”是神灵光辉的“溢出”,是上帝神韵的“分享”与“附体”;狄德罗尝试从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新路径推进“美”的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这些探索的精神都值得肯定,其研究成果也为后人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可资借鉴的基础。但是,真正找到“美的问题”研究的科学路径而卓有见解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从人的存在方式这一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

<sup>①</sup>王敏、曾繁仁:《高校大美育体系的现代化建构》,《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1期。

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sup>①</sup>,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存在的状态,能为人的生命体存在提供最基本物质条件和维持保障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方式之一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借鉴以往人类历史已有的美学研究的成果,又在不断克服矫正已有理论成果的不足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揭示人的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现实的存在方式——社会实践——的研究路径,由此剖析人与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形成与不断完善的历程。这种对象性关系生成的前提条件包含两个方面:既取决于客体对象的属性,也取决于主体的本质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的本质力量”是与客体对象的属性相对应,由此二者形成了特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这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不断交互影响、促进,共同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而分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基本特征,将“美”的问题研究纳入审美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实践特殊方式的框架内予以探索,从而正确地揭示了“美”的本质规定性,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审美和美育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人的生命体的存在是我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若生存,首先要解决的是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命体存活的物质前提条件,这就决定人类生命体存活的物质生产——即狭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现实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即主体的人与客体对象之间形成的物质实践关系。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认识、遵循客观规律以实现改造客观世界,获取物质财富,在此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的人所面对的是客体世界的自然规律,与此相对应则是主体方面得到不断提升的认识、运用自然规律的科学意识,这种主体的科学意识与客体自身规律之间所形成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就是科学认知关系,追寻“真”的原则。人类获取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有意识、有目的、自觉的实践主体,不是盲目、消极、被动地适应外界客观世界,而是不断地、积极地发挥着主观能动性,按照趋利避害的主观意愿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于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就与客体之间形成了价值关系,这时主体的伦理意识就与客体的价值属性之间形成了伦理道德关系,反映到主体方面则是不断提升的伦理道德意识,追寻“善”的原则。在认识关系中,主体必须遵循客体的客观规律,于是,主体的主动性就受制于客体的客观规律性,主动性受制于受动性,受动性居于主导地位;在伦理道德关系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试图支配客体,使客体的服从、服务于主体的意志,于是,客体的受动性就受制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性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认识关系中的受动性主导与伦理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主导二者之间就存在矛盾性对立——这是理性与感性的矛盾,那么,如何克服“理性王国”与“感性王国”对人的束缚以及二者的对立?这就需要取消二者各自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审美关系则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和中介。

审美关系中的客体是真与善相统一的美,与此对应的是主体的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相统一的审美意识。科学意识追求客体对象的客观规律的“真”,伦理意识追求的是主体趋利避害的“善”,审美意识包含科学意识,但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科学意识;审美意识包含伦理意识,但也不等同于纯粹的伦理意识。一方面,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审美关系是处于科学关系、伦理关系之间的中介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审美意识是科学意识与伦理意识的相互渗透、融通的拥有独特本质规定性的意识领域,具有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功能,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伦理意识共同构建起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形成完整的意识体系,若是缺少任何一个维度,都会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科学意识偏于客观性、受动性,凸显主体对客体规律的遵从;伦理意识偏于主观性、主动性,要求客体为主体支配、服务,如此形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识体系与结构的分裂、对立关系,这种矛盾又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是感性与理性、受动与主动的集结体,能够跨越二者之间沟壑的桥梁则是审美意识,它可以消除理智与意志之间的对立,使之摒弃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而融合到一个全新的意识体系结构之中:审美意识可以克服纯粹理性的片面性,并使枯燥的理性注入感性的斑斓色彩,这时我们获取的科学认识不是被客观规律盲目支配的受动性,而是化作主体意志驾驭的“人化自然”;同时,审美意识也可以避免单一的感性的局限性,使得主体意志欲望的主动性也不是一味的贪婪攫取,而是遵循客观规律下的主观意志自由的发挥。因此,具有这种和谐的意识体系的主体就可以实现既遵从“任何种的尺寸”所蕴含的客观自然规律,又遵从自身意志的主体“内在尺度”的主观欲望需求,按照主体的“合目的性”去遵循、驾驭、运用大自然的“合规律性”——从而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和谐统一,这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美的规律”。对“美的规律”进行的培养教育就是美育,“美的规律”是对受教育主体进行美育的基本内涵。

#### 四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手段,理应纳入美育的视野。因此,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就提出,美育要在开设以艺术鉴赏为主的限定性选修课程基础上,开设艺术实践类、艺术史论类、艺术批评类等方面的任意性选修课程。由此可见,尽管艺术教育不是美育的全部,却是高校美育的重要构成部分。艺术既不同于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美,也与社会美相异,是美存在的典型形态。自然美的形成与存在是自在的、原生态的——例如山水之美以及伴随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而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变幻多彩的景象之美;社会美也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带有较为明显的人之主体实践印记的美的形态,同样也是呈现为社会常态。可见,无论是自然美还是社会美,一般说是比较零散的、自在的,需要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才能展现出来。但艺术美则不同,它超越了自发的、原生态的美的存在样式,是更凝练、更集中、更鲜明、更典型的美的存在形式。艺术是艺术家依据自身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理想,遵循“美的规律”并通过审美心理创造的个性化的“第二自然”世界。譬如,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展现于郑板桥艺术作品创作中的“竹子”却是别有一番风采:“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sup>①</sup>这里,通过绘画艺术中的“竹子”,苏轼以审美方式诠释了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虽然源于大自然中的现实的竹子这一客观对象,这是艺术反映的基点,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艺术反映是以审美——即“实践—精神”——的方式进行的主体建构式的审美反映,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单纯的审美关系的自然美,也超越了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社会美,而进入了一个人类独有的艺术的纯精神创造的世界。这时的主体若是仅仅依靠与生俱来的“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仅仅是出于自发的、近乎本能的“无目的”的美的天性,难以与人类精神文化重镇——艺术——搭建起特殊的对象化的审美关系。艺术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美的内涵,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艺术所蕴含的美是独特的精神之美,不仅能够给人提供赏心悦目的感性愉悦,更能通过艺术这一探视世界的“窗口”使人了解自然,洞悉社会,认识历史,体悟人

<sup>①</sup>《郑板桥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99页。

生真谛,进而促进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辩证统一的融合,丰富个人综合素养和提升人生境界。<sup>①</sup>上述观点准确地揭示了艺术活动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艺术成为美育实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毋庸置疑。若将艺术教育排除在美育之外,那么美育则是残缺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艺术的审美特征,以及通过艺术教育实施美育的典型性和有效性。然而,把艺术与美育简单地划等号,甚至认为艺术教育就是美育全部的观点,也有其片面性与局限性。审美是一个包含艺术但远远大于艺术的概念,若是将审美教育仅仅局限为艺术教育,甚至认为增加几节唱歌、跳舞、绘画之类的艺术技能课就是贯彻实施美育,这种观点无论是在美育理念还是美育实践层面都将大大缩小美育的范围,将本应丰富多彩的美育变成单一化、平面化、简单化和技术化。

除了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的观点外,还存在对美育范畴认识的其他误区。有观点认为,美育就是素质教育。这种“美育=素质教育”的观点,认识到美育有利于促进培养高素质人才,在实施与推进对人的全面教育中具有积极作用,二者在目的性方面是吻合一致的。但是,这个论断只是揭示了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特征和功效,美育与素质教育二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概念的内涵方面讲,素质教育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是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有机融合的全面发展的培养教育,可见,美育只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成分、实施路径或方式;从功能方面讲,素质教育所彰显的“素质”,同样也是“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是人之“发展”的应有之义——保持作为个体的人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平衡、提高、完善,而美育侧重的是审美意识的建构,虽涉及人的科学意识和伦理道德意识,却无法替代以培养人的科学意识为职责的智育,也无法置换以培养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为己任的德育;从概念外延方面讲,美育是以美启真、以美向善,“审美”是实施美育的基点和中介,美育的对象和途径是美的存在的客体,通过审美认知、审美体验、审美感悟并内化为审美素养,完善审美心理,继而提升审美情趣、审美观念,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以审美创造实现对审美理想的追求;而素质教育的外延更为广泛,不仅包括美育的“辖区”,还延展到凡是有利于培养人的诸如德智体美劳并举的综合素质教育等方面。

也有观点认为美育就是培养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美育可以有效地提升人文素养,对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塑造与提高也具有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还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学主义至上的重理轻文偏颇的教育观念——这些都显示了美育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固然,美育在培养人文素养、人文素质方面具有明显的功效,可以增强受教育者的人文情怀,促进形成人文精神;但是,美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人文领域——既不能局限于人文学科的人文素养,也不能囿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而是包含科学美范畴与科学精神在内的自然科学教育在内的领域,更进一步说,美育视野中的人文素质、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科学素养、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相融通的辩证统一体,而不是彼此割裂的“单向度”。况且,今天的中国,科学素养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亟待“补课”。众所周知,我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历史发展的轨迹有着较大差异性,是以“美”与“善”的紧密融合为特征,而非西方那样“美”与“真”的结合,美学观念与伦理学思想融为一体,科学观念的树立相对薄弱。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关注的核心并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层面,这使得科学精神远远没有像人文精神那样深入人心,也没有浸透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中,对科学、科学精神的尊重乃至敬畏感不足。然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是不可分割的。失

<sup>①</sup>马龙潜:《什么是文艺美学》,《文艺美学研究》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去科学精神制约与规范的人文精神是狂野不羁的;同样,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是缺少人文情怀温度的。因此,当我们谈论美育时,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教育是不可拆分的,二者相辅相成,彼此支撑、互相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可见,美育是培养人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的教育。核心范畴是“审美意识”,审美意识包含科学意识的“真”与伦理道德意识的“善”,是沟通“真”与“善”的中介。审美教育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科学意识与伦理道德意识的教育,即科学素养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

以上列举的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美育观点,都认识到美育具有的某方面的内涵和功能,揭示了美育相关方面的特征。然而,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以偏概全的局限——将局部特征放大到美育全部属性,进而误导了我们的美育实践活动。今天的中国,科学意识与科学素质的培养依然任重而道远。没有科学精神规范和制约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是片面的。美育的实施既要包含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还要涵盖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高校美育要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健全而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由此可见,若将美育局限于艺术教育或人文素养教育而缺少了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教育,实质是否定了科学美的存在和科学美教育的价值、作用,就可能导致高校美育失于狭隘化、片面化。这有悖于美育的应有内涵。

## 五

由于对“美育”范畴内涵理解的狭隘化和片面化,导致“美育为何”以及“如何为”走向误区,高校美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呈现为目标不清晰、路径与方法的科学性缺失等问题,这又集中表现为“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存在形态”的问题,即美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如何处理融合、互补的辩证关系。

客观说,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实际状态是“名高位低”“名不副实”。长期以来,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还是考核评价体系,高校美育常常是“边缘化”的“配角”,多限于选修课,或者纳入课外活动的范围,始终被排除在正规的教学培养方案和日常教学之外。某种意义上说,美育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装饰品。尽管教育界对美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的问题探讨和认识都已经非常充分,并无异议,但“美育在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和不同专业的教育中的位置、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又是什么”等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依然存在模糊的认识。究其原因在于没有从学理层面解决美育与高等院校的文理工农林医等诸多门类的专业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美育在不同专业培养中的存在形态和具体的实施路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这必然导致高校美育与专业教育的脱节和游离,造成高校美育的边缘化。同时,将广大专业教师排除到美育的责任之外,美育成为极少数艺术专业教师的职责,成为高校某些艺术团体或者艺术特长生的“小众”活动,自然脱离高校美育的大众化基础,这与实施美育的初衷可谓南辕北辙。如此的观念必然“窄化”美育的内涵和功能。

美育是高等教育培养体系中的“必修学分”。高校美育功能,既有现实的工具性作用,也有未来性价值,是现实工具性与未来价值性的统一,因此,任何将美育的工具性与未来价值性分裂甚至对立的观念与做法都是片面的。现实工具性表现为美育能够促进德育与智育有效实施的功能。德育是培养学生正确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品质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尚德风俗,以德育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圣人”既要有超人的智慧,还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准和人格魅力,若说“圣人”难以企及,那么,“君子”则是对具有高尚人

格“凡人”的称谓。因此,“立德树人”一直被视作我国教育方针的首要任务。德育作用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主流社会价值的意识和素质,美育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此观念、意识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内化于受教育者的行为准则中,这是美育服务于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工具性功能。智育是以概念、逻辑为特征,对受教育者知识体系和智力进行培养的教育。所谓“智力”,“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思维能力”<sup>①</sup>。智育可以促进智力结构优化和智慧品质的提升,其中以思维力的发展为核心,即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授获得客观规律的认知,从而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系列稳定智力因素。智力活动体现在心理活动方面就是意向活动,并在意向活动中逐渐形成具有稳定性的心理特征,构成非智力因素。狭义的非智力因素主要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等,这些因素可以有效地指引、主导智力活动的有序进行,使其能够积极而主动地克服困难,向着目标努力。虽然说,非智力因素不能直接参与智力活动对各种知识的加工处理,但是,可以促进智力活动的有效性和顺利完成。譬如,“学习热情”有利于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美育有助于这种作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非智力因素的形成,从而助推智育的有效实施和发挥良好效果。美育的未来性价值,是指美育可以使受教育者把接受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质,从而全面提升个体的素质,使之向着人生的更高境界跨越,实现人自身的主体性价值的功能,即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老庄哲学的“无为而为”,美育的目的指向人的终生发展与不断完善。<sup>②</sup>

从健全受教育者知识结构的视角讲,美育可以弥补和完善专业教育的欠缺性,既有利于形成科学的知识谱系,也有助于受教育者构建和谐的意识体系。学界倡导高校美育的“三进”原则——“进培养方案”“进教学计划”“进日常教学课堂”,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否定专业教育的重要性,更不是以美育取代专业教育,而是有效地发挥美育补充和弥补专业教育范围之外教育的作用。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的分门别类也相应出现趋向“高精尖”的发展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挖掘越来越小的知识点”,形成知识深度上的纵深性与广度上的狭窄化并存的矛盾性夹角分明的局面,无怪乎有人慨叹今天再也难以造就以往的拥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的学者。这种片面化的知识结构有可能出现木桶的短板效应,并进而制约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性思维的施展。当然,我们这里所倡导的美育绝没有取代专业教育的意思,而是指以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为主导,以综合知识、综合素质为辅助的辩证统一的知识谱系和综合素质。针对当代对大学生追求人文关怀、积极乐观、独立自由、开朗热情、自我创新等特质,有观点认为,美育目标大致包括:一是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二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判断,协调受教育者人格中的感性、理性等因素共同发展,并形成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三是引导学生形成稳定化、普遍化的理想人格结构,逐步促使其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人格品质的形成与确立。<sup>③</sup>这种美育目标设置,就较为全面地着眼于当代大学生的长远而全面发展,体现了美育的未来性价值,值得肯定。

美育的实施是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或配合的“有机体”。高校美育设置与实施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将美育与专业课程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二是针对性地弥补专业课程布局的空白点。其宗旨是正确树立科学发展观,有意识地兼顾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和人文

①《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665页。

②马龙潜等:《知识与审美教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5-119页。

③苏金萍:《高校美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甘肃高师学报》2015年第1期。

素养并重,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通。人文学科与美育相结合比较简单易行。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美育有益于培育人们热爱科学事业的情感和深刻体悟感知科学美的内涵,进而转化为其致力于科学事业和创造科学美的不竭动力。

“科学美”的概念,学界认为是由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较早提出。<sup>①</sup>对此,爱因斯坦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sup>②</sup>科学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诸如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定律等科学成果的表现形式,都可以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科学美育的目的是有益于科学工作者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超越狭隘的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因此,科学美育是高校美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理工科院校的美育实施找到了美育与专业教育的契合点。正如自然科学界公认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不但表达了丰富的科学规律,而且形式和谐,展现了科学美的简洁性特征。再如,数学专业的几何学中就蕴含丰富的美的因素,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美育在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具体存在方式。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学与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著名的“黄金分割”命题就吻合了美学原理。之后,许多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明确提出数学美的范畴。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sup>③</sup>,并对数学美进行了深入研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儿也曾提出寻找一种能整合代数和几何学科优点的方法——这是暗含“美的规律”的方法,指导笛卡尔构建解析几何学原理,探寻新的数学研究方法的初衷和依据恰恰是他对自然科学方法美的坚信。事实上,当一种有效的符号把深刻而丰富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给人以美的震撼力。

毫无疑问,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专业还是自然科学专业的高等教育,都需要美育。高校美育工作的推进与深化离不开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维度,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学理层面研究的关键是对“美育”应有内涵的科学界定,以及美育功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存在形态和促进教育在以德树人、全面发展方面的动力机制问题的探讨;美育实践层面重在切实可行的落实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其中,核心问题是将美育纳入“必修框架”的规定项目,成为大学生人生成长的“必修课程”和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①[法]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②[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4页。

③[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3页。

##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Yang Jie

(Institute of Ar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ivilization Research Base,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by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the society. What is worthy of affirmation is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e are gradually deepe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of “high brand but low status” in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not optimistic, which is rooted in the devi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weakn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is still facing the bottleneck of further development, which is prominently shown in the two closely related core issues: “what i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how to do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interpretation devi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category and proposition of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example, it is believed that “aesthetic education” means “art education” as long as schools offer art courses such as painting, dancing and singing; or aesthetic education means the educ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humanistic attainments” and “humanistic spirit”, and even there is a tendency to marginalize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problems and principl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problem of the form of existence for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shows that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an to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devi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finally leads to the lack of the effective aesthetic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an inevitable path to promote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by clarify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humanistic quality; humanistic spirit

责任编辑:孙昕光

# 诗史与命名:刘克庄“诗祖”论及其他<sup>\*①</sup>

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刘克庄是晚宋诗坛杰出的诗人和富有创见的诗论家。他运用诗作、诗话、诗选及序跋题记等形式,提出“诗祖”“派家”“家数”等一系列典范命名和诗学范畴,为宋诗的演进、宋代诗人的经典化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形成自成体系的宋诗史观。与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扬唐抑宋的诗学倾向相比,刘克庄排除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和“影响的焦虑”,提出宋代文学全面超越唐人的论断,对两宋诗坛主要诗人、不同风格和派别给予全面而客观的品鉴、阐释、评价,表现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自觉的“本朝”文学史观,凸显了当代视野。

**关键词:** 刘克庄;诗祖;派家;本朝;诗史观;南宋诗学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3-0141-16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3.016

南宋诗学理论日趋成熟发达,诗人作家们往往出入经史,融通诗禅,具有较前人远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在日常交游和写作中,他们热衷于品鉴艺文,传阅文集诗卷,谈论文统诗道等话题,在其所撰著的诗话、文话、诗歌以及序跋题记等诗学文献中,逐渐衍生出一些具有原生性的诗学命题和范畴,形成自觉的诗史观。刘克庄是晚宋诗坛出色的诗人和著名的诗论家,他以“本色论”为艺术标尺,在诗史演进的视域下,提出“诗祖”“派家”等宋代诗人、诗派的典范命名和理论范畴,初步构建了宋代诗史的叙述框架和话语体系,显现出鲜明的“本朝”史观和当代视野。

## 一、谁是“诗祖”

“祖”者,祖师、始祖、宗祖、鼻祖之谓。以“诗祖”命名诗人,最早见于唐人。据载:“李洞目贾阆仙为诗祖。”<sup>②</sup>李洞为晚唐诗人,痴迷贾岛诗,以至铸像礼拜,奉为宗祖。<sup>③</sup>然贾岛仅为晚唐众多“小家数”之一,“诗祖”的桂冠实在大而无当。唐代诗人中真正堪称“诗祖”者当属杜甫,而这一命名则始于宋人。曾几称“老杜诗家初祖”<sup>④</sup>,刘克庄亦称“杜公为诗家宗祖”<sup>⑤</sup>,元代方回将杜甫作为江西诗派之“一祖”,也渊源于宋人话语。最早命名宋代“诗祖”的是吕本中,他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称“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sup>⑥</sup>。在江西诗风的笼罩下,“诗祖”之说在南

\* 收稿日期:2020-02-05

作者简介:陈元锋(1955—),男,山东招远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15BZW098)的阶段性成果。

② 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72页。

④ 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81页。

⑤ 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⑥ 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宋也日趋流行,并具有了新的特色。其一,“诗祖”论与“宗派”相联系,带有鲜明的禅宗祖庭文化和传灯语录的印迹;其次,以“诗祖”命名在诗坛开宗立派、首创风气的诗人,具有了诗史的意义。

晚宋诗论名家刘克庄即是“诗祖”的权威命名者。从最高的意义上理解,“诗祖”应该具有唯一性。然而,刘克庄所命名的宋代“诗祖”却不止一位,计有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四人。他将梅尧臣称为“本朝诗开山祖师”,称欧阳修、王安石二人为“吾宋诗祖”,推举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那么,谁是宋代诗坛最有资格的真正的“诗祖”?一代“诗祖”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本朝“开山祖师”“诗家宗祖”与“吾宋诗祖”诸命名之间有无位序高低之分?“诗祖”与“宗派”“集大成”“大宗师”“大家数”等命名有什么联系?本文拟逐一梳理刘克庄的相关论说,并参酌南宋诗论中相关的热点话题,探讨其“诗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体现的诗史观念。

### (一)“本朝诗开山祖师”梅尧臣

刘克庄将梅尧臣与其唱和之友欧阳修置于宋初诗坛进程中分析其艺术贡献:“余尝评本朝诗,昆体过于雕琢,去情性浸远,至欧、梅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澹易纤巧。”<sup>①</sup>但比较而言,“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sup>②</sup>将梅尧臣命名为“开山祖师”,“开山”二字表明其居时代之首,开风气之先。其对宋诗的贡献,是变昆体的过于雕琢纤巧为平淡质朴,重性情而复风雅;又以“始”字强调了其在宋初诗坛“开山者”的地位。梅尧臣在当时与苏舜钦并称,欧阳修与“苏、梅”有师友之谊,二人因欧公的揄扬而名重当世。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对梅尧臣诗风的演变有精当的概括:“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但自觉追求“平淡”则是其主要倾向,梅尧臣自称“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sup>③</sup>欧阳修以“苏、梅”比较:“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sup>④</sup>《后村诗话》引述张嶮对梅尧臣诗的评语:“圣俞以诗鸣本朝,欧阳公尤推尊之。余读之数过,不敢妄肆讥评。至反复味之,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澹有余。然其澹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致。至于五言律诗特精,其句法真有大历诸公之风。”在肯定梅尧臣“长于叙事”、诗风“雅澹”与五律句法精严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够雄健与缺少余味的缺点。张嶮是刘克庄推许甚高的南渡诗人,刘克庄赞同其观点为“不易之论”<sup>⑤</sup>,为其“开山祖师”说作了重要补充。

作为诗坛开山的先驱者,梅尧臣以及欧阳修等“新变派”对宋诗风的试验和探索还有不够成熟和稳定之处,这本身即体现了北宋诗歌的曲折发展轨迹。要而言之,梅尧臣对宋诗的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平淡诗风,“这种创造对于宋诗审美规范的确立起了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sup>⑥</sup>,经过欧阳修的揄扬和苏轼等诗人的发展,成为宋代诗人的普遍追求。称其为“开山祖师”,则是刘克庄的理论识见。曾季狸曾指出:“东莱(吕本中)《江西宗派序》所论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长,成于欧阳公,此论诚当。但论诗不及梅圣俞,似可恨也。诗之有圣俞,犹文有穆伯长也。”<sup>⑦</sup>刘克庄从宋诗

①刘克庄:《跋刁通判诗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②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③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45页。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⑤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⑥莫砺锋:《论梅尧臣诗的平淡风格》,《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⑦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6页。

史的实际出发,弥补了这一缺憾。

## (二)“吾宋诗祖”欧阳修、王安石

欧阳修作为“百科全书”型的北宋文坛领袖,宋人对他的评价常出现几个并称,即“韩欧”“欧梅”“欧苏”,分别指向不同的文学领域。刘克庄则将欧阳修与王安石并称为“诗祖”：“昔庐陵、半山二公愈贵愈显,其诗愈肆,岿然为吾宋诗祖。”<sup>①</sup>但这一“诗祖”合称缺少必要的条件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刘克庄以欧、王两人作为“诗穷而后工”的反例,强调达而有权位者可以同时而在政治、学术与诗歌领域取得成功。不过巧合的是,“诗穷而后工”恰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命题,“穷而后工”的梅尧臣获称“诗祖”,欧阳修却以“达而能工”获得此称,这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一命题强调了诗人的际遇、命运等外部因素对创作的影响,然而诗人的穷通并非决定诗“工”与否的唯一条件。在宋人的批评话语里,本来就有“山林草野”与“朝廷台阁”两类文章,对应的作者类型分别是“道不得行”的“穷者”与“得位于时”的“达者”<sup>②</sup>。刘克庄则列举了这两种类型的经典例证:“禹之训、皋陶之歌、周公之诗”等是“达而在上者之作”,“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可见,不论穷通,皆可达到“工”的高度,而“工拙”与否则包含了对文学艺术的价值判断。由此再看刘克庄对欧、王二公作为“诗祖”的命名,显然过多地强调了政治身份(“愈贵愈显”)而忽略了艺术性(“其诗愈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刘克庄对欧阳修、王安石的具体评价。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欧梅”并称,却并未将欧阳修与梅尧臣并称为“诗祖”,而是认为其与韩愈一样非“本色诗人”,故“不当以诗论”,这就使他失去了成为“诗祖”的前提(详见下文论述)。其次,刘克庄对王安石诗的评价不甚系统。一是评价其善于取法唐人,如其论杜甫诗:“余谓善评杜诗,无出半山‘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之篇,万世不易之论。”<sup>③</sup>其所引王安石《杜甫画像》诗句,重在宣扬杜诗儒者精神:“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刘克庄赞其为“万世不易之论”,侧重其诗论意义。二是评价其拟寒山诗:“半山大手笔,拟二十篇殆过之。”三是评价其集句诗:“集句诗自半山后,他人为之,戛戛其难。”<sup>④</sup>均带有师法前人性质的。

综合而言,欧、王二人均为北宋文坛大家,各有所擅,但其实都不符合“诗祖”的特性。他们通常是作为诗歌、古文、四六兼擅以及学术、政事相兼的人物为世人盛称,刘克庄并没有指出他们像梅尧臣、黄庭坚那样具有艺术风格的创变性和范式意义,反而谈到王安石对欧阳修诗歌的态度:“半山崛强,于欧、苏无所置喙。”<sup>⑤</sup>因此,将两位年辈地位、诗学思想、诗歌特色都存在明显差异的诗人合称“诗祖”,颇显勉强,不妨看作是刘克庄为王埜(字子文)诗集作序时的比附应酬之语。

## (三)“本朝诗家宗祖”黄庭坚

吕本中首称黄庭坚为“宗派之祖”,刘克庄继吕本中之后,从理论上对江西诗派作了更全面

①刘克庄:《王子文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②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

④刘克庄:《跋陈秘书集句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⑤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

的总结。他将黄庭坚定名为“本朝诗家宗祖”，比之于禅宗开山祖师达摩。他同样在“本朝”诗史的演变进程中论述山谷诗的贡献，在“国初诗人”潘阆、魏野的“晚唐格调”与杨、刘“昆体”之后，“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至欧、苏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于是，“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sup>①</sup>。刘克庄再次在诗论中用“不易之论”肯定其“诗祖”之说。他具体分析说：“山谷为诗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木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之语而出。”<sup>②</sup>所举诗句出自其父黄庶《怪石》诗，意在揭示其“句律”自有家法。评价黄庭坚，绕不开苏、黄异同的话题，刘克庄对二人有概要精当的互文式比较：“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sup>③</sup>

从刘克庄所论可以看出，作为“本朝诗家宗祖”，黄庭坚讲究“句律”之锻炼，追求“体制之变”，搜奇猎异的诗材与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语言，以“自成一家”的诗法规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江西“宗派”。江西诗派的法席盛行，进一步强化了黄庭坚的“诗祖”地位。此外，宋末谢枋得称黄庭坚、陈师道“此二家乃本朝诗祖”<sup>④</sup>。然而后山乃瓣香山谷，黄、陈并称而地位等级实有差别，但其说可为方回“一祖三宗”说张本。

#### (四)“集大成者”陆游

陆游未明确获“诗祖”命名，但综合刘克庄对陆游的评价，确有“诗祖”之实。首先，将其作为唐宋诗史“集大成”式的典范人物：“本朝诗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sup>⑤</sup>将陆游与李、杜、梅尧臣相提并论，其中两位(杜、梅)被称为“诗祖”，可见其地位之尊崇。“集大成”是宋人文学经典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常用以标举在某一领域奄有古今而又独树一帜的一流人物，如杜诗、韩文。从时序上说，开山者在前，祖述与集大成者在后。陆游活动于南宋前期诗坛，他广泛师法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梅尧臣、苏轼等诗人，堪称唐宋诗歌艺术之集大成者。其次，刘克庄将陆游与杨万里并称为南渡中兴大家：“老去仅名小家数，向来曾识大宗师。……诚叟放翁几曾死，著鞭万一诗肩随。”<sup>⑥</sup>并以李、杜比拟杨、陆：“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sup>⑦</sup>尊称二人为“大宗师”“大家数”，确乎声名相埒，有些难分伯仲。

但事实上，在杨、陆二人之中，刘克庄更偏重陆游。《题放翁像二首》其二：“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sup>⑧</sup>以“初祖”比喻其为“过江后一人”，地位显然

①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页。

②刘克庄：《跋给事徐侍郎先集》，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④谢枋得：《与刘秀岩论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⑤刘克庄：《跋李贾县尉诗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⑥刘克庄：《病起十首》其九，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588页。

⑦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⑧刘克庄：《题放翁像二首》，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03页。

高出众人。他还从作品数量上比较二人,更钦佩后者的创作才华:“诚翁仅有四千首,惟放翁几满万篇。老子胸中有残锦,问天乞与放翁年。”<sup>①</sup>对于陆诗的艺术风格,他分析说:“近世陆放翁、朱晦庵笔意,言语不掉书袋而自粲然成文。”<sup>②</sup>强调其自然平易的诗风。又说:“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末年云:‘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学,俗人犹爱未为诗。’则皮毛落尽矣。”<sup>③</sup>从记问、力量、才思、气魄四个方面概括其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后村论诗,尤重“力量气魄”。他认为:“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诸人以为善。然融液众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气魄;陵暴万象而无一物不为吾用,必有大力量。……余谓诗亦然。”<sup>④</sup>“大率有意于工者率不能工,惟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求工不能工者滔滔皆是,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有大气魄、大力量不能。”<sup>⑤</sup>更称古今诗人自李、杜、欧、苏至杨、陆等“此诸老先生耳目口鼻与人同,而气魄力量与人异,以其大足以容之也”,而讥嘲“岂若晚唐蛩吟蝉噪者之为哉”<sup>⑥</sup>?总之,刘克庄在“近世”诗坛的背景下,赞许陆游为“融液众长”的“集大成者”,喻为“宗门中初祖”,称为“过江后一人”“南渡后一大宗”,由此看来,将其置于宋代“诗祖”之列似不为过。但他特别标明“过江后”与“南渡后”的时段,正是未能命名其为“诗祖”的原因。

## 二、“诗祖”之外

刘克庄所命名的这份“诗祖”名单是否全面和具有权威性,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比如,堪称宋代诗坛一代宗师的苏轼为何没有入选?这并非刘克庄疏忽或缺乏辨别力,而自有其理论考量。“诗祖”之外,两宋诗坛还有众多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个体或群体、流派。对此,他用另一组诗学范畴给予命名和定位,最重要的是“家数”论和“派家”论。

### (一)“家数”

“家数”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范畴。汪涌豪指出,“‘家数’之进入文学批评也在宋代”,并举南宋诗论家严羽、刘克庄为例展开论述,认为其含义均指风格而言,严羽所称“家数”“是指独特的体法传承及在此传承基础上形成的诗的风格”;刘克庄习称“大小家数”,“无非指创作成就突出、卓越自成一家的技艺风格或与之相反的庸陋风格”。<sup>⑦</sup>刘克庄广泛运用“家数”范畴论诗、词、文各种文体,含有体制、风格之义。如:“律体切近帖妥,唐家数中名作也。”<sup>⑧</sup>“林君少嘉示余

①刘克庄:《八十吟十绝》其八,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25页。

②刘克庄:《跋黄龙南禅师真迹》,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④刘克庄:《跋陈秘书集句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⑤刘克庄:《回信庵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⑥刘克庄:《黄有容字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⑦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5-226页。

⑧刘克庄:《吴归父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诗,篇篇幽远,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数诗中。”<sup>①</sup>其次,他以“大小家数”标识品级名位,是其典范论之重要范畴。“大家数”为一流诗人之通称,如“古今诗人如麻粟,惟唐李、杜,本朝欧、梅、半山、玉局,南渡放翁、诚斋为大家数”<sup>②</sup>,概括了唐宋两代6位诗坛大家。“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汪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真,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sup>③</sup>所列15人,皆称为“大家数”,突出了“南渡中兴诗坛”的典范地位。

以上所述“大家数”中,除黄庭坚外,包含了刘克庄所命名的“诗祖”及“集大成”者,更有众多不同时期的诗坛大家、名家,北宋集中于庆历至元祐诗坛,南宋则集中于南宋前期“中兴”诗坛。刘克庄常以“大家数”与“小家数”对举,从中可以了解其论诗旨趣与取向。与“大家数”同名异称的概念还有“大宗师”“大作者”“大诗人”“大秀才”等,如称“李、杜、韩、柳、欧、苏、黄、陈大宗师”<sup>④</sup>,称戴复古“式之名为大诗人”<sup>⑤</sup>可见“大家数”实是第一等大诗人。他又屡屡指出“小家数”的特征:“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sup>⑥</sup>“世间小家数,不瘦失之寒。”<sup>⑦</sup>“肯为唐季小家数,须做僧中大辨材。”<sup>⑧</sup>明确指向“江湖诗人”所取法的“晚唐体”,批评其点缀景物,风格寒瘦,境界狭小,反映了刘克庄整体上鄙薄“晚唐”诗风的审美倾向。

## (二)“派家”与“宗派”

“宗派”是“宗祖”与“派别”的合称,“派家”“诗派”亦是由“宗派”衍生出来的概念。在宋人诗学话语中,“宗派”一词仅指“江西诗派”,经吕本中命名后,南宋诗人与诗论家进一步传扬之。贺允中:“闻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为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于陈后山,派而为十二家,皆铮铮有名,自号江西诗派。”<sup>⑨</sup>李光云:“知君欲嗣江西派,净几明窗付后生。”自注:“近日吕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鲁直为宗主也。”<sup>⑩</sup>王庭珪:“忽逢雷子谈诗派,传法传衣共一途。”<sup>⑪</sup>王十

①刘克庄:《跋林灏翁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7页。

②刘克庄:《黄有容字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③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④刘克庄:《跋陈秘书集句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⑤刘克庄:《跋二戴诗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⑥刘克庄:《听蛙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⑦刘克庄:《题近稿二首》其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466页。

⑧刘克庄:《黄宽夫示诗不已自和前二首答之》其一,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19页。

⑨贺允中:《江东天籟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⑩李光:《与善借示鲁直集雕刻虽精而非老眼所便戏成小诗还之》,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454页。

⑪王庭珪:《雷秀才尝学诗于吕居仁能谈江西宗派中事辄次居仁韵二绝赠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858页。

朋:“近来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韩子苍。”<sup>①</sup>楼钥云:“涪翁又分江西派,作图序次由本中。”<sup>②</sup>均可证江西“宗派”“诗派”命名之本义。刘克庄在此基础上提出“派家”的概念:“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牵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则又驰鹜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sup>③</sup>刘克庄的友人林希逸亦使用“派家”的概念:“今言诗于江西,大抵以山谷为的。高安刘兄,以《山居前后稿》见寄。思清而兴远,词赡而律严,求之派家,神情风格皆具。”<sup>④</sup>刘克庄把入《江西诗社宗派图》者称为“派中”人,诗则为“派诗”。他指出,曾几与吕本中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又曾见“派诗旧本,以东莱居后山上,非也”,故仍以吕本中列在最后以“继宗派”。评韩驹:“吕公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江端本:“子我弟也,子我诗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晓。岂子我自为家,不肯入派,如韩子苍耶?”<sup>⑤</sup>按,曾几是事实上的江西诗派传人,谢枋得即言:“诗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sup>⑥</sup>曾几也有明确的“宗派”意识,并反复以杜甫与黄庭坚并提:“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sup>⑦</sup>“诗章出咳唾,流派考宗祖。”<sup>⑧</sup>“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sup>⑨</sup>“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sup>⑩</sup>从诗法传承上叙述了山谷与杜甫的“宗祖”与“渊源”关系,可见曾几与江西诗派渊源甚深,应入《宗派图》而被吕本中排除在外,故刘克庄对其意图表示不解。刘克庄还明确把杨万里与吕本中、曾几一起划入江西“派诗”之列。《茶山诚斋诗选序》:“余既以吕紫微诗附宗派之后,或曰:‘派诗止此乎?’余曰:非也。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sup>⑪</sup>按照禅宗祖庭的命名规范,有“宗祖”与“派祖”,也称“正祖”与“支祖”。黄庭坚为“初祖”,吕、曾为“派祖”,杨万里则可称为传承法脉的“支祖”。《题诚斋像二首》又称:“欧阳公屋畔人,吕东莱派外诗。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sup>⑫</sup>称为“派外诗”和“江西别枝”,也近“支祖”之意。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黄庭坚的宗祖地位,整合了元祐以来诗坛“派系”。自

①王十朋:《陈郎中赠韩子苍集》,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95页。

②楼钥:《吴少由惠诗百篇久未及谢又以委贶勉次来韵》,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③刘克庄:《刘圻父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9页。另外如方岳《跋陈平仲诗》云:“本朝诗自杨、刘为一节,崑体也,四瑚八璜,烂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盘自然高古。后山诸人为一节,派家也,深山云卧,松风自寒,飘飘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极其挚者黄山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④林希逸:《刘元高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0-331页。

⑤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486页。“不肯入派”句之“派”字,原作“社”,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据清翁同书校本作“派”,意较胜。见《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30页。

⑥谢枋得:《萧冰厓诗卷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⑦曾几:《次陈少卿见赠韵》,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00页。

⑧曾几:《陈卿又和三首而伸通……》,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01页。

⑨曾几:《东轩小室即事五首》之四,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12页。

⑩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之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81页。

⑪刘克庄:《茶山诚斋诗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⑫刘克庄:《题诚斋像二首》,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03页。

有江西“宗派”及“派诗”,一般诗人群体亦可借由某种诗学思想与风格的共性而具备成为“诗派”的条件,促进了南宋诗人更为自觉的流派意识。如:“派里人人有集开,竞师山谷友诚斋。只饶白下骑驴叟,不敢勾牵入社来。”<sup>①</sup>此处所言“派里”指效仿“江西派”者,“白下骑驴叟”是后村自指,谦称自己不敢入其诗社。又言:“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谁编宗派应添谱,要续传灯不记名。放子一头嗟我老,避君三舍与之平。由来作者皆攻苦,莫信人言七步成。”<sup>②</sup>“四人”指“四灵”,“宗派”仍借用吕本中所编《江西诗社宗派图》,泛言其可传承诗法,结为诗派,同样以“放子一头”谦称。“谱”指谱牒,“芹泮佩衿尊郑老,桐江谱牒派玄英”<sup>③</sup>,借以指诗派人物图谱。再如:“诗派相邀容入社,酒泉虽远愿移封。”<sup>④</sup>也是以“诗派”泛称诗社之友,而非事实上形成的某某诗派。

由“宗派”“派家”“诗派”等诗学范畴在南宋诗坛的流行,可以了解“江西宗派”之形成流衍、宋人“流派”观念之初步形态。只是在“江西宗派”的笼罩下,再未产生足以与江西诗派分庭抗礼的新诗派,其关键是缺少如黄庭坚那样卓越的诗人作为“宗祖”开坛树帜。

### (三)“江湖诗人”

晚宋“江湖诗人”是近年来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争议的焦点是南宋诗论家有没有提出“江湖诗派”的概念。学界的讨论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关于“江湖体”“江湖诗人”“江湖诗派”等命名问题也基本得到厘清。<sup>⑤</sup>这里略作补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们不论从晚宋诗学材料中还是从号称“江湖诗人”领袖的刘克庄诗论中都没有发现“江湖诗派”的用法。刘克庄受知于叶适,叶公称其诗“可建大将旗鼓”<sup>⑥</sup>,其为“在场者”,与江湖诗人有广泛的交游唱和,那么他是如何称述这一诗人群体的生活与创作的?

首先,刘克庄使用的概念有“四灵”与“四灵体”,它们与“江湖诗人”的关系值得注意。“四灵”因叶适命名而广为流传,刘克庄也屡屡论及“四灵”。他选编南宋五七言绝句,“至于江湖诸人,约而在下,如姜夔、刘翰、赵蕃、师秀、徐照之流,自当别选”<sup>⑦</sup>。“南渡诗尤盛于东都。……内放翁自有万诗。稍后如项平父、李秀章诸贤,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灵,占毕于灯窗,鸣号于江湖。”<sup>⑧</sup>将“四灵”纳入“江湖诸人”之列,而区别于南渡诗坛之“江西一派”。又称:“玉融林君子彬示诗七十篇,……律体若造语尖新,然视晚唐、四灵犹恨欠追琢,而君自谓可以见古人矣。”<sup>⑨</sup>将“晚唐”与“四灵”并置一处,因“四灵”直接取法晚唐姚、贾。他又将“四灵”诗风称为“四灵体”:

①刘克庄:《湖南江西道中》其九,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226页。

②刘克庄:《题蔡旌主簿诗卷》,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356页。

③刘克庄:《送方汝楫客授严陵》,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99页。

④刘克庄:《四和二首》其一,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578页。

⑤侯体健:《“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日本]内山精也:《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朱刚、张洵、刘静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8-234页。

⑥刘克庄:《杂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⑦刘克庄:《中兴五七言绝句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⑧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⑨刘克庄:《跋林子彬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今江湖诸人竞为四灵体,君卷中时有三数句似四灵。”<sup>①</sup>“四灵体”与“晚唐体”在诗学旨趣上一脉相承。刘克庄早期亦浸染“晚唐诗风”,后来则转而指摘“晚唐体”弊病,即指向晚宋以“四灵体”为代表的江湖诗风:“蛩鸣竞起为唐体,牛耳谁堪主夏盟。”<sup>②</sup>所谓“蛩鸣”,即“晚唐蛩吟蝉噪者”。“昔韩、欧二公病六朝五季文体卑弱,于是各为一家之言以变之,不独一时学者从风而靡,向使徐、庾、杨、刘诸人及与二公同时,亦必北面竖降矣。今举世病晚唐诗,犹欧阳之遗意也。”<sup>③</sup>其诗学思想上承韩愈、欧阳修对齐梁、晚唐诗的批评,从“举世病晚唐诗”可见“晚唐体”之卑弱衰变诗风在晚宋诗坛的弥漫,江湖诗风已引起一些诗人的不满和批评的反弹。

“永嘉四灵”为“江湖诗人”之嚆矢,“江湖诗人”因陈起刊行《江湖》诸集进一步扩大了声势,正如刘克庄所说“江湖间新诗人甚多”<sup>④</sup>。但在刘克庄惯常的称呼中,既无“江湖体”,更无“江湖派”,他们的身份是“江湖社友”“江湖士友”“江湖酬倡者”“江湖吟者”“江湖旅人”“江湖游客”,等等。他们的活动特点是“浪走于江湖”“足迹满江湖”“身久落于江湖”“就江湖之空旷”,从中可以窥见这一诗人群体游吟江湖、结社唱和的主要特征。

在重视“辨家数”、别“体”“派”的理论风气中,刘克庄并没有将“江湖诗”命名为“江湖派”或“江湖体”,显然,在他的心目中,“江湖诗歌”并不足以成为“派家”,原因盖在于“江湖诗人”一味追随“四灵”与“晚唐”,而缺少自家面目,造成“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五言,苦吟过于郊、岛”的现象<sup>⑤</sup>,只能成为吟风弄月的“小家数”,是他所不满的。

### 三、典范观:“本色诗人”与“诗人之诗”

怎样选择文学典范?如何安排文坛前辈时贤的位置,给以恰当的命名?这取决于刘克庄的诗学取向和典范观。

对于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刘克庄特别重视其在诗史上的首创意义。如咏梅诗在宋代蔚为大宗,“自昔咏梅者少,六朝惟何逊扬州、陆凯庾岭之作传于世,至本朝孤山处士,‘暗香疏影’之句擅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丽足以誉梅,或人物高胜足以重梅。又首为诗家破天荒,如优钵昙花,旷劫一见,所以可贵”<sup>⑥</sup>。南朝何逊、陆凯、宋初林逋都算不上诗坛一流人物,但凭借其咏梅诗独擅诗名,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即在于其为后来者开拓和垂范。在各类文学的经典作品之林中,这样的“破天荒”之作不在少数。再如评价杨亿:“杨文公《谈苑》云:‘近世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得其格者蔚为佳咏。’……余按首变诗格者,文公也。自欧阳公诸老,皆谓昆体自杨、刘始,今文公乃巽与二人,若己无与者,前辈谦厚不争名如此。”并引杨亿与钱、刘同题《咏汉武帝》《明皇》诗,认为“比之钱、刘,尤为老健”<sup>⑦</sup>。杨亿的贡献是开创了“西昆体”,矫正五代以来诗坛

①刘克庄:《跋蒲领卫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②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292页。

③刘克庄:《跋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诗评》,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④刘克庄:《跋李敏肤行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⑤刘克庄:《林子显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⑥刘克庄:《跋陈迈高梅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⑦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的鄙陋浅俗之气,但自身带有过于雕琢华丽之弊,未能成为宋诗发展主流,也难入“宗师”级人物谱系。而梅尧臣之“开山之功”恰在于矫正昆体雕琢习气,“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澹易纤巧”。

被刘克庄称为“诗祖”“宗师”者,除了能够开创风气之先、具有范式意义外,还有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即“本色论”。以“本色”论诗,是宋代“尊体”派传统观念。严羽强调:“须是本色,须是当行。”<sup>①</sup>刘克庄《晚意》云:“末年慕用寒山子,不是行家本色诗。”<sup>②</sup>他的“本色”论指向诗人身份与诗歌品质两个方面形成的“诗”与“非诗”之辨、“破体”与“尊体”之辨、“诗人”与“文人”之辨,而分歧几乎都导源于韩愈以降诗歌转型过程中衍生的理论问题。

首先,从“诗人”身份判断,有大儒与诗人之分。前者在文坛具有崇高的地位,比如欧阳修与叶适,刘克庄对二人的定位是:“欧、叶皆大宗师。”<sup>③</sup>他从选诗的角度论及唐宋诗人典范问题:“余尝谓选古今诗,先正推韩、欧、曾、范大儒,惟周、程、张、邵及近世朱、张、吕、叶不可以诗论。”<sup>④</sup>认为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叶适等“不可以诗论”,将古文大家韩、欧、曾、范称为“大儒”,但诸人既以古文与儒学称,也并非纯粹“诗人”。他曾评叶适《中塘梅林》两篇五言古诗云:“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矣。”比于陶、柳,是相当高的评价,但前提却是:“水心,大儒,不可以诗人论。”<sup>⑤</sup>既然不能以诗人论,自然也就不具备成为“诗祖”的资格。

其次,从诗歌品格入手,有“文人”与“诗人”之诗。刘克庄把诗歌区分为两种审美类型:“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是以《诗经》风诗作为“诗人之诗”的源头,其特性是抒写情性礼义,并从自然中采撷诗料。“文人”之诗即“学人之诗”,则是以书本知识为本源。刘克庄论诗重性情,因此,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风人之诗”即是“行家本色诗”:“古今诗不同,……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sup>⑥</sup>他赞同时人对“江西”诗风的批评:“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认为“切中时人之病。”<sup>⑦</sup>在江西诗风影响下,不免造成“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的局面。刘克庄从诗美品性分析唐宋诗人大家,以判断其是否“本色”。如韩、柳之别:“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sup>⑧</sup>“韩、柳齐名,然柳乃本色诗人,自渊明没,雅道几熄,当一世竞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sup>⑨</sup>柳宗元之“本色”源于其学陶。陶渊明是刘克庄极为推尊的前代诗人典范,称“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而渊明尤其“人物高胜,其诗遂独步千古”。后继者中,“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得其遗意”<sup>⑩</sup>,

①严羽:《沧浪诗话·诗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

②刘克庄:《晚意》,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729页。

③刘克庄:《平湖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④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2页。

⑤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⑥刘克庄:《跋何谦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5页。

⑦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引游九言评张晋彦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

⑧刘克庄:《竹溪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⑨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6页。

⑩刘克庄:《赵寺丞和陶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情深”<sup>①</sup>。评林巢《读陶诗》“虽甚清绝,然太轻快,……要须更槩括以韦、柳乃善”<sup>②</sup>;“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唐人惟韦、柳,本朝惟崔德符、陈简斋能之”<sup>③</sup>。均以“韦、柳”并称,上接渊明,乃诗风自然平淡而重抒写情性一派,故称柳宗元为“本色诗人”。论苏、黄异同着眼点又有不同:“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sup>④</sup>对黄庭坚“锻炼精而性情远”的评价似乎与重性情的“本色论”相悖,但事实上,黄庭坚论诗亦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sup>⑤</sup>刘克庄还认为,陈师道“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sup>⑥</sup>。“黄、陈”并称,二人皆属“本色诗人”。

再次,从体制法度讨论,有“尊体”与“破体”之辨。黄、陈二人也持“文体本色”论。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进一步认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sup>⑦</sup>曾季狸也说:“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sup>⑧</sup>韩愈开“以文为诗”风气之先。苏轼则“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sup>⑨</sup>,而且将范围几乎扩大至所有文体。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谈论本朝欧、苏诗歌,惯于以韩愈为参照。最早对韩、欧诗歌的争议发生在治平间馆阁论诗时,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吕惠卿等人认为“诗正当如是”,“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沈括等人则认为韩、欧之诗虽“健美富赡”,但韩诗乃“押韵之文”,欧诗“恨其少余味”。<sup>⑩</sup>刘克庄从“本色”角度论韩、欧诗:“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评苏轼诗:“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他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sup>⑪</sup>从论者对韩、欧、苏三位宗师级人物的争议比较,可见“尊体”论与“本色”论在宋代主流话语中的流行和份量。

刘克庄坚守了纯粹的文学审美标准,以其“本色论”为标尺,将元和至元祐唐宋两代诗坛大家韩、柳、梅、欧、苏、黄分别划归“文人”与“诗人”两个谱系,在“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间划分了疆界。尽管韩、欧、苏在南宋以来的经典地位日益确立,其在文学、学术乃至政事领域的杰出成就与宗师地位亦非梅尧臣、黄庭坚可望其项背,但因其诗人“本色”不纯,宋代“诗祖”的名号遂不得不让梅尧臣、黄庭坚及陆游所专有。林希逸的说法恰恰与刘克庄不谋而合:“若欧、曾、苏之名以文,梅、黄、陈之名以诗”<sup>⑫</sup>,刘克庄所命名的北宋两位“诗祖”即在其“以诗”而名之列。将梅

①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②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页。

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

⑤黄庭坚:《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⑥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页。

⑦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309页。

⑧曾季狸:《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3页。

⑨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6页。

⑩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页。

⑪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⑫林希逸:《后村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尧臣、黄庭坚称为“诗祖”,其实质是肯定其为宋代诗风演变进程中之关键人物。北宋诗风之“变”,梅、黄二人是重要转捩点。元代袁桷《书梅圣俞诗后》论曰:“昆体之变,至公而大成,变于江西,律吕失而浑厚乖。驯致后宋,弊有不胜言者。”<sup>①</sup>清代翁方纲则从“宋调”确立的角度阐发了黄庭坚兼为江西宗派之祖与“本朝诗家宗祖”的诗学史意义:“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因而,刘克庄在苏、黄比较基础上提出的黄庭坚为本朝“诗祖”说,“此论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贤三昧。不然而山谷自为‘江西派’之祖,何得谓宋人皆祖之?且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sup>②</sup>?因此,就诗论诗,截断众流,以梅、黄为宋诗演进主流,建构诗史经典人物谱系,这便是刘克庄“诗祖”说宗旨之所在。

#### 四、“本朝”史观与当代视野

刘克庄的“诗祖”论、“派家”论等体现了他自觉的诗史观。他所命名的宋朝“诗祖”,名义上可包含欧、梅、王、黄、陆游五人,严格而确定无疑地则是梅尧臣与黄庭坚二人。五席之中,北宋占据四席,凸显了“诗祖”说的历史脉络;“诗祖”说之外,刘克庄给予南宋诗坛更多的篇幅,显示了鲜明的“本朝”诗史观。

宋人在政治、学术与文学领域,均表现出自觉的“本朝”史观。<sup>③</sup>从对王朝名称的使用上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意识。首先,“国朝”是通行的泛称,如韩愈称陈子昂:“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宋人也习用“国朝”之称,如王称编《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称:“盖文章至唐而盛,至国朝而尤盛也。”<sup>④</sup>张戒多以“国朝”论诗,如“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五言律诗,若无甚难者,然国朝以来,惟东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等等。<sup>⑤</sup>“国朝”之称偏重朝廷、王权的客观立场。其次,在国号、朝代前加冠词的尊称“圣宋”“我宋”“皇朝”等,如吕祖谦所编宋文选《皇朝文鉴》,魏齐贤、叶棻所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楼钥说:“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sup>⑥</sup>杨万里说:“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sup>⑦</sup>钱时《舟中卧听守之读皇宋诗》:“略无梦到华胥国,枕上听歌圣宋诗。”<sup>⑧</sup>既称“皇宋诗”,又称“圣宋诗”,均带有颂扬尊崇的主观色彩。“本朝”之称在宋代也非常普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严羽《沧浪诗话》用“本朝体”“本朝诗”“本朝诸公”“本朝诸贤”等论诗,且多与唐人相对而称,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sup>⑨</sup>如果说,宋人的“本朝史

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7页。

②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③邓小南在宋史研究中率先提出宋人具有自觉的“本朝”史观。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29页。

④王称:《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⑤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1、462、465页。

⑥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楼钥集》卷四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08页。

⑦杨万里:《杉溪集后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⑧钱时:《舟中卧听守之读皇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328页。

⑨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44页。

观”是围绕“祖宗观”而对政治文化所作的阐释的话,那么,宋人的“本朝”文学史观则致力于对宋代“人文之盛”的建构,是在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宏观视域和立足点上,对北宋以来文学进程的通观叙事。

刘克庄使用“本朝”一词尤为密集,论文治如“本朝文治过唐远甚”<sup>①</sup>，“元祐间最为本朝文章盛时”<sup>②</sup>，论人物如“本朝惟晏元献、杨文公岿然为名臣”<sup>③</sup>。他对“本朝”史的题咏,透过特定的时间视角,表现了自觉的史家意识。《题林梦馨本朝杂咏》：“二百新题字四千,庚申已后甲寅前。继周可以知百世,续汉谁曾到八年?江左重修《泰陵录》,水心绝重《建隆编》。”<sup>④</sup>“庚申”至“甲寅”当为建隆元年(960)至高宗绍兴四年(1134),凡175年。林梦馨的《本朝杂咏》不存,从后村诗句可知,这是一部包含200首五言绝句的大型组诗,杂咏从北宋建国到南宋高宗绍兴初史事,可视为一部“本朝”简史。《泰陵录》指徽宗朝所修《哲宗实录》,高宗绍兴三年诏重修。《建隆编》系陈傅良节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一朝史事而成,又名《开基事要》,编于庆元中经筵任上。<sup>⑤</sup>刘克庄特别提到这两部当朝史籍,意在追述元祐、绍圣史事,上溯“祖宗之法”,体现了一种史鉴精神。对高宗、孝宗两朝的“中兴”叙事则寄托了他的文治理想,他认为“隆兴、乾道之盛比于庆历、元祐”<sup>⑥</sup>。“隆、乾”“乾淳”成为南宋人追攀的典范时代:“生后至和嘉祐时,老身犹及见淳熙。”<sup>⑦</sup>“诸老破荒倡唐宋,三千接武辅乾淳。”<sup>⑧</sup>加上他所亲历的端平、嘉熙、淳祐、景定、咸淳,构成其“本朝”叙事的完整脉络。

作为“本朝史”的组成部分,刘克庄的诗史观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和优越感。《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以“五星聚奎”象征宋代文运之盛,成为南宋以来士大夫的共识。<sup>⑨</sup>宋诗在发展进程中一直以唐诗为典范,唐诗对宋人造成不小的“影响的焦虑”,最为典型的是严羽的“宋不如唐”论。但刘克庄却作出了最自信的断言:“本朝”诗不愧于唐。《本朝绝句续选序》云:“本朝诗尤盛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sup>⑩</sup>“野处公”指洪迈,他于淳熙年间编《万首唐人绝句》,但宋诗却成为阙典。于是,刘克庄编辑了两部宋代绝句选本,《本朝五七言绝句》所选为南渡前即北宋绝句,序中说:“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sup>⑪</sup>另选南渡后诸家

①刘克庄:《送谢昨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②刘克庄:《跋徐总管诗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③刘克庄:《送叶童子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④刘克庄:《题林梦馨本朝杂咏》,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373页。

⑤陈傅良:《嘉邸进读艺祖通鉴节略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⑥刘克庄:《跋陈丞相家所藏御书二》,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4页。

⑦刘克庄:《立春七首》其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27页。

⑧刘克庄:《次韵丰守燕新进士》,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5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633页。

⑨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文史哲》2005年第4期。“倡唐”二字据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卷三八,第204页。

⑩刘克庄:《本朝绝句续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⑪刘克庄:《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五七言绝句为《本朝绝句续选》,序言称“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乾淳间“一二十公皆大家数”,再加江西一派与永嘉四灵<sup>①</sup>,可谓一时彬彬之盛。“本朝”诗过于唐,南渡诗盛于北宋,表现了自觉的诗史进化观。

刘克庄的“本朝”诗史观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他所命名的“诗祖”,梅尧臣为“本朝诗开山祖师”,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梅、陆则为“本朝集大成者”。其次,他经常以“近岁”“近世”“近时”等为出发点,将批评视野更多投向南宋诗坛。

所谓“近世”,可以“南渡中兴诗坛”为起点。“中兴大家数”是刘克庄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三位“近岁诗人”,除了前引“杨、陆”并称外,其他如称徐似道“此公曾见石湖、放翁、诚斋一辈人”而有材气人品<sup>②</sup>,高似孙诗“有石湖、放翁、诚斋之风”<sup>③</sup>。刘克庄对张嶷的评价也值得注意。张嶷系陈与义表侄,《后村诗话》评其《夷陵》《初夏》《与简斋》等五言诗云:“词语高简,意味幽远,此类不可殚举,真南渡巨擘。”评其五、七言绝句云“精丽宛转有思致”,其咏史绝句《读楚世家》“忠愤切于戊午谏议矣,但微婉而成章耳”;并称“世好巨山诗者绝少,惟余与汤伯纪(汉)耳”<sup>④</sup>。刘克庄不仅详引张嶷评析梅尧臣与黄庭坚诗歌艺术的观点,赞同其为“不易之论”;引述其《陈简斋墓志》对后山诗与书法的评价,而且广引张嶷诗篇,誉为“南渡巨擘”,挖掘其艺术价值,反映了其独到的艺术眼光。

“近世诗人”的另一重点是四灵及江湖诗人。作为“在场者”,刘克庄多次出入朝堂,又因奉祠久居乡里,在朝野诗坛中建立了广泛的师友交游网络,其地位与成就堪称“盟主”,却并不以“盟主”自诩。他既是当时江湖诗友交游唱和的中心,也是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他自述说:“近世诗人莫盛于温、台,水心叶公倡于温,四灵辈和之;竹隐徐公倡于台,和者尤众,德求其一也。余长德求三岁,自卯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款接。”<sup>⑤</sup>唱和之余,接受、阅读、评鹭江湖诗友的行卷投赠作品成为日常活动,“辇路二年,阅士友贻卷多矣”<sup>⑥</sup>,在京城已如此,乡居时尤甚:“虽屏居田里,载贻而来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阅。”<sup>⑦</sup>“某自少壮好交游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闲居无事时,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还贻和韵,未尝敢失礼于互乡童子,人所共知。”<sup>⑧</sup>有时甚至“合江湖士友贻卷数十家并观”<sup>⑨</sup>，“余阅近人所作数十百家”<sup>⑩</sup>,可见其阅读量之多。他对于江湖诗人的点评往往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兹举其要者:“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不离

①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②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

④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69页。

⑤刘克庄:《虞德求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⑥刘克庄:《跋欧良司户文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⑦刘克庄:《送谢昨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⑧刘克庄:《答刘少文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⑨刘克庄:《与郑丞相论史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4-415页。

⑩刘克庄:《宋希仁四六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唐律。”<sup>①</sup>“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sup>②</sup>这些点评均指出江湖诗人所效仿的姚、贾“晚唐体”苦吟过甚、意象窄狭等弊病,视为“小家数”<sup>③</sup>。除此之外,刘克庄对“近世”的评价还包括理学诗的空洞说理:“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公学力足以畜之,笔力足以洩之。分康节之庭而升明道之堂,非今诗人之诗也。”<sup>④</sup>他还批评了陆游、辛弃疾词的用典过多:“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sup>⑤</sup>这些意见与他重视抒写性情和“诗人之诗”的“本色论”诗学取向一以贯之。

“本朝”史观构成刘克庄诗史叙事的理论视域。他将梅尧臣、黄庭坚、陆游等诗人置于“本朝”视野下给予“诗祖”“宗师”等系列命名,体现了建构典范理论、重视首创、探索源流的诗史意识。伽达默尔强调,“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sup>⑥</sup>。刘克庄能够在南宋诗坛开放而有竞争性的理论环境中独树一帜,其见识高出众多诗论家,就在于具有敏锐的“本朝”史观和当代视野。

诚然,刘克庄“诗祖”说也存在不公正性和矛盾抵牾之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位年逾八旬的高寿诗人(1187—1269),生活时代长,存世作品丰富,其现存作品最早始于嘉定时期30余岁时。另据刘克庄自称,其所著《后村诗话》前、后、续、新四集系60岁至80岁时不同时期所作。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内,其诗风自有演进变化,其诗学观点也应有所修正调整,但在整体上仍然系统地反映了刘克庄的诗歌史观。与南宋另外两部有影响的诗话即张戒(?—1157?)《岁寒堂诗话》、严羽(1192?—1245?)《沧浪诗话》相比,刘克庄排除了两人厚古薄今、扬唐抑宋的门户之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宋诗史的多元面貌,公允地评价诸家得失,并作出宋文、宋诗(重在绝句)、宋词三大文体全面比肩唐人的判断。张戒与严羽拉开了唐宋优劣论的序幕,他们对宋诗的贬抑集矢于北宋欧、王、苏、黄四大家。比如张戒批评“苏轼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介甫、东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词气视太白一何远也”;“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等等。<sup>⑦</sup>严羽则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sup>⑧</sup>。值得注意的是,严羽对“诗体”的命名。如论诗体,有“以时而论”,宋代有本朝体、元祐体;“以人而论”,宋代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等,显示了严羽诗论重“体制”和“家数”的

①刘克庄:《晚觉闲稿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②刘克庄:《听蛙诗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③刘克庄对“四灵”及江湖诗人的评价,可参看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250—252页。

④刘克庄:《跋吴帅卿杂著·恕斋诗存稿》,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⑤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⑥[德]伽达默尔:《诠释学I、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1、428页。

⑦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2—465页。

⑧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

理论色彩。但除了贬抑北宋诗人之外,他对南宋诗歌也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张戒早逝,他仅提及南渡初吕本中、陈与义、张嶠几位诗人论诗之语。严羽除了提出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外,仅对江湖诗风作了简要评述,谓“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sup>①</sup>。刘克庄超越张戒、严羽的地方,则是正面提出宋诗的典范理论,他以“格”论宋诗,概括为“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以“派家”论江西诗人,以大小“家数”论唐宋诗人,最有创造性的还是提出“诗祖”“祖师”等典范命名,深化了“派家”“家数”等诗学范畴。他创作了丰富的诗作、诗序、诗话、诗选,阐发了系统的诗学理论命题,构建了自成体系的诗歌史观,这对于宋诗的经典化、宋诗的诗史地位,起到重要的理论总结作用。公正地说,刘克庄堪称宋代最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之一。

## Poetry History and Naming: Liu Kezhuang's “Poetry Ancestry” Theory and Others

Chen Yuanf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Liu Kezhuang was an outstanding poet and a creative specialist in poetics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poetic circles. He used poems, poetic dialogues, poetry selections and prologues, proposed a series of paradigm names and poetic categories, such as “poetry ancestry”, “faction” and “family”, and made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of Song poetry, the classicalization of the poet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formed a self-contained systematic view of Song poetry history. Compared with Zhang Jie's *Poetic Theory of Suihantang* and Yan Yu's *Poetic Theory of Canglang* which showed the tendency of exalting Tang poems and criticizing Song poems, Liu Kezhuang got rid of his narrow factional view and the “anxiety about influence”, put forward the thesis that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surpassed comprehensively the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offered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ppreci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ajor poets with different styles and fac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poetry, and showed his strong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conscious view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present dynasty” and highlighted the contemporary field of vision.

**Key words:** Liu kezhuang; poetry ancestry; faction; present dynasty; view of poetichistory; poetic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孙昕光

<sup>①</sup>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7页。





飞翔 许德奇 画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5卷 第3期(总第290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 办 山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3(Serial No.290)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 Jinan 250014,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v.edu.cn

刊号: ISSN 1001-5973  
CN 37-1066/C

定价: 15.00元